

經齊的道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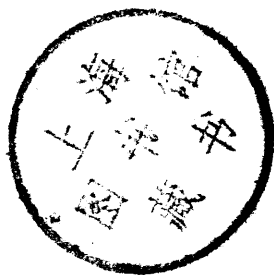
馬寅初等著

匯叢刊

5



法文匯報館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9337B

文匯報附刊的新思潮，新社會、新經濟、新教育、新文藝、新科學六個周刊和星期談座，自刊行以後，因內容充實，觀念正確，頗受讀者歡迎寶愛。不過。因為文匯報未能普遍發行到達廣大的讀者手里，並且因為報紙的形式所限，此項附刊的保存披閱、諸感困難，所以特地把這些附刊分類彙印成冊，以最低廉的價格發售，以適應廣大讀者的便利與需要，俾使不能定閱文匯報的讀者可以購閱，已經定閱文匯報的讀者更便於保存披閱；並且以後隨各附刊的繼續刊行，陸續彙印發行。但為爭取時間，使讀者先睹為快，在編排技術上亦許有不週到的地方，仍希愛護文匯報的讀者隨時給以批評指正！

目次

新經濟的道路	編者(一)
此後吾國經濟學者工作的對象	馬寅初(二)
英國經濟大勢	陶大鏞(四)
內戰財政的真面目	龍成志(七)
評「現代中國經濟教程」	紀明(九)
捷克斯拉夫經濟的復興	洗文譯(一一)
當前的財政與法幣	楊培新(一三)
戰後物價的演變過程	壽進文(一六)
替日內瓦的貿易會議推流年	婁立齋(一八)
誰應得日本賠償品	龍成志(二〇)
論美金庫券公債之發行	千家駒(二二)
劉大中教授的「妙策」	紀明(二四)
新政府的經濟方針	紀明(二五)
獨佔資本與美帝國主義	王士章(二六)
論貨幣恐慌	王師復(二八)
美國對華貸款的透視	紀明(三三)
多惱河流域的勞工和工業	田圃譯(三五)
內戰經濟的面貌	李作周(三八)
被動的經濟政策	姚大均(三九)

中國官僚資本之理論的分析……………王亞南（四一）

新經濟的道路

編者

新經濟的道路，是民主經濟的道路，也就是民生主義的經濟道路。

政治上有民主，而經濟上沒有民主，這是假民主，不是真民主。儘管在法律上的地位人人平等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人人都有了，但要是經濟大權仍操在少數官僚，買辦，豪門，顯要以及大地主手裏，而大多數生產的工農民衆，却終歲勞動，不獲一飽；這是民窮主義，而不是民生主義的道路。

美國前總統羅斯福說得對：「如果沒有經濟的安全與獨立，個人自由夾雜存在。貧窮的人決不是自由人，饑寒失業的民衆，是獨裁制度所產生的惡藉。」他同時又將「不虞匱乏的自由」，列爲人類四大自由之一。這就是說，人類要獲得真正的自由，必先讓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有工作做；必先在經濟上得到「安全與獨立」。餓着肚子，吹着西北風，那只有奄奄待斃，還談得到什麼自由？談得到什麼民主？真正的民主就是要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有工作做，就是要經濟上有民主。

美國前商務部長華萊士在這次大戰還沒有結束以前也說過：「我們要在一切人類的民主政治與少數人的民主之間加以取捨。究竟要普遍地給予一切人類以社會保險和經濟機會，抑或容忍我們的富饒資源集中於自私者和貪婪者的手裏？」所謂少數人的民主，就是「把富饒資源集中於自私者和貪婪者的手裏」的民主，就是「少數人富有多數人貧乏」的民主，就是沒有「經濟民主」的民主。

此次大戰之後，「少數人富有多數人貧乏」的時代應該過去了。從反法西斯戰爭中獲得勝利的各個人民，他們知道如何建立新的爲多數人謀幸福的民主政府，他們也知道如何完成新的爲多數人安全與獨立的經濟體制。例如在東歐各國，已經徹底執行了土地改革

，消滅了自中世紀以來一直保存到現在的封建農奴制度的殘餘，根絕了反動勢力最堅固最重要的柱石，而爲各國的真正民主化，現代化，掃清了一條大路，使新的民主的經濟邁步前進。

羅斯福和華萊士他們所理想的世界，在美國不能出現的（不能出現，而且和他們所理想的正好背道而馳），在別的土地上却已經成爲現實了。

這一條新經濟的道路，也正是我們中國所要走的民生主義的道路。中山先生解釋民生兩字時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民生主義顯然是以大多數「人民」「國民」或「羣衆」爲對象，要使大多數人在經濟上得到「安全與獨立」而「不虞匱乏」。民生主義決不容許「把富饒資源集中於自私者和貪婪者手裏」而造成「少數人富有多數人貧乏」的社會。

然而我們看看現實的中國經濟情況怎樣？

近百年來，中國在列強的環伺之下，從古老的封建經濟，墮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的深淵，農村不斷破產，手工業不斷沒落，新式工業又在列強資本與官僚資本夾縫中無法順暢發展，使中國的廣大人民，以及生產的工農羣衆，在失業，飢餓，逃荒，疾病和死亡中掙扎。中國經濟就這樣長期的窒息而無法順暢發展。

經過了八年的民族抗戰，勝利後應該是中國民族經濟獲得翻身機會；可是由於勝利根本依靠人家得到，勝利後又不能走上獨立民主的道路，沒有翻身又復加上了重重的壓迫。一方面，美國獨佔資本代替了日本控制着整個中國，另一方面，中國官僚資本竊取了勝利之果，壟斷着國民經濟。前者用租借物資，剩餘物資，財政借款，直接投資以及商品傾銷等方式，配合着海陸空軍的援助，助長

了中國的內戰，控制了中國的一切，欲使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而後已。勝利後到今為止，美國從中國所攫取的權益，事實上已超過戰時日本在中國淪陷區裏所得的一切，這不難從中美商約中窺見一斑。後者更與前者狼狽為奸，壓迫中國民族經濟的發展。它們復通過接收敵偽資產，擴大內戰，增發通貨，加強統制，貪污腐化等等方式，使少數特權集團的財產，空前集中，使整個民族工商業以至中小銀行，都瀕於破產崩潰，使中國的國民經濟面臨嚴重的危機。

中國目前的經濟，剛剛是「把富饒資源集中於自私者和貪婪者手裏」所形成的「少數人富有多數人貧乏」的局面，在通貨不斷膨脹，稅捐無限增加，徵糧，徵兵等種種措施之下，且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是連民生主義的一點氣味都嗅不到的局面，這是迫使人民走上死亡的局面。

此後吾國經濟學者工作的對象

馬寅初

中國今日所行之經濟制度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故中國所研究之經濟學亦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吾人檢討今日中國政府所施行之種種經濟政策，若僅按資本主義經濟學的原理來檢討，不難指出其種種不合原理的地方。若按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原理來講，其相去更不可以道里計了。

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一切生產行為均以私人營利為目的。這種行為的指標，受價格制度的支配，物品價格的內容是價值，物品價值以貨幣表示者是為價格。吾人之種種經濟行為，必假手於價格制度，方能盡其職能。例如企業家開始生產，必以生產成品（如消費品）之價格與生產工具（如機器原料等）之價格相互比較，方能着手。倘生產成品之價格高於生產工具之價格，則企業家獲利，反之則虧本。故企業家對於生產，須冒一種風險。以其肯冒險，所以必須酬報之，他的酬報就是利潤。生產之方向，即為二種價格比較之結果。有利可獲，其生產必擴充；無利可獲，甚至虧本，其

但是這樣黑暗的局面必然要過去的，新的光明的前途必然要到的。因為這不但是全中國人民的要求，也是世界經濟潮流發展中不可抗拒的趨勢，誰要阻止它，誰就會遭到沒頂的危險。

而且以土地改革為出發的新經濟的萌芽，已在滋長着；人民的生活，已開始了新生的希望。這告訴我們：中國經濟不只有黑暗的

一面，也有光明的一面。這使我們對中國經濟的前途，增加了信心。中國的廣大人民，只要堅強的團結起來，為愛國民主運動奮鬥到底，最後必能將發展中國民族經濟的障礙——美國獨占資本和中國官僚資本——掃除乾淨，走上新的民主經濟，亦即真正的民生主義的經濟大道。但這是一個長期的，艱苦的奮鬥過程。必須付出一定的代價；光明的經濟前途，是不會從天而降的。

生產必收縮。故生產之擴充與收縮，必決定於此二種價格，因此價格制度遂成為生產之指導者。

經濟學之目的在利用科學與自然爭鬥減少人類之痛苦

以上已說過，物品價格的內容是價值，物品價值以貨幣表示者是為價格。但價值何從來乎？價值如何產生乎？曰，由於貨品稀少所致。假使世上所有物品都像空氣日光一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則這些物品就很少價值甚或全無價值。這些物品，既然稀少，而人類又必須憑藉這些物品才能生存，故人類就必須努力克服障礙。因此，人類必須與自然界奮鬥，與野獸搏鬥，甚至人與人戰鬥。其中尤以自然界為最大的敵人，人類雖竭盡心力，有時亦不易克服。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即因此產生。他認為人口的增加遠大於食物的增加。人口增加的結果，產生瘟疫，疾病，戰亂等殘酷現象，使人

口減少，以符合食物之產量。故欲求人口與食量之平衡，祇有二種方法，任取其一：（一）克服障礙，增加生產，以符合人口；或（二）以瘟疫疾病戰爭的殘酷行為，減少人口，以符合食量。馬爾薩斯因未見到科學進步之神速，足以增加生產減少人類許多痛苦，所以他的看法，以為瘟疫戰爭等摧殘現象是無可避免的，因而推出很悲觀的結論。可是近來科學的進步真是日千里，食物生產之增加遠在人口之上，致有生產過剩之嫌。今日的美國，禦寒的棉，充飢的麥都有過剩之嫌，因而有獎勵減產之舉，甚至不惜付之一炬。環觀我國則啼飢號寒者所在多有。以穀物而論每一個中國農民每年僅可產一，四〇〇公斤，而美國一個農民每年可產二〇，〇〇〇公斤，比較中國多產十四倍。據中華民國統計提要，每戶農田面積在五畝以下者為農田總面積的百分之三八·五，幾占十分之四。農場如此細小，且多是佃租的，而從所得之收穫，尚須扣去地租，加以技術落後，智識低下，倘不幸而遇歉收，飢饉難免，故農民無日不在恐怖中過生活。這種犧牲可謂為不必要的犧牲。如他國人民不在優裕的生活，沒有理由要使中國的老百姓在寒餓水平線上掙扎。中國人口固多，所以當局以為死了若干人，不足為奇。近來飛機失事之多，更足以證明性命之不被重視。况犧牲者多是國內優秀分子，智識水準極高，祇要當局稍加注意，這種損失，極易避免。現代美國所用飛機之飛速，和高度均有驚人的進步，飛行高度可達三萬五千尺。飛機之最大敵人為氣候，但自「雷達」Radar發明以後，使飛機在飛行時許多困難均可因此克服。他可以預告駕駛員高山之障礙氣候之變化，與敵機之襲擊。有了這種設備，飛行益加安全，這不能不說是科學之賜。次如英國在英海峽敷設之海底油管，英文稱之為Pipe Line Under the Ocean，縮寫為P.L.O.亦為科學上之一大進步。為節省交通工具之運輸力，石油可以由其產地以海底油管運輸至歐陸，這樣不但增加了運輸量，且節省了許多人力和物力。其他類此之例證甚多，足徵科學進步，克服自然界的困難而減少了人類的痛苦。

中國人研討經濟學尚須與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奮鬥

中國至今才從殖民地經濟中解放出來，領事裁判權撤銷不久，

租界亦甫經收回，懼外媚外的心理尚未從多數人腦海中泯除，所以戰後研究經濟的最高目標端在建立獨立自主的經濟迅速地使國民經濟不再成為外國經濟的附庸，長此蹉跎於被動的地位。為達到這個目的，第一應當迅速工業化，第二應當徹底改革中國農村。這兩種工作應同時着手以收相得益彰之效。工業化有了基礎，農村中一部份過剩人口才有出路，重新分配耕地亦容易辦到，農民生活水準，亦有提高之希望。在另一方面，農民生活向上之後，工業出品才有廣大的市場，農工相互依存，社會安全才能奠定基礎，從此繼續努力，由小而大，由近及遠，先完成局部或能奠定的自足經濟，而後再積極的參加繁榮世界經濟的工作，其途直·其勢順。

但今日的情形則如何？試問今日之中國是誰家天下？港口停泊着美國軍艦，陸上駐着美國陸軍，天空飛翔美國空軍。依中美航空協定，美國航空勢力可囊括中國，而自營之大華航空公司反被政府解散，遍中國全境幾無一片淨土，都染了腥臭，中美商約名為互惠，實則偏惠，而美貨充滿街頭，廉價傾銷，民族工業幾為之摧殘殆盡，而美軍之驕橫尤令人髮指，其賤視中國人為奴才的心理，表現於殘殺和奸淫的行為。如我們不顧眼見中華民族一線生機，被美帝國主義通過過地的奴才任意蹂躪，我們自當繼續我們傳統的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勢力的神聖工作！革命，挽救民族工業的危機樹立獨立自給的經濟。

我們還要和官僚資本奮鬥

中國人的財富，通過各式各樣的剝奪方法逐漸集中在四大家族手中，這是鐵一般的事實。例證甚多，不勝枚舉。中紡公司之盈利，依法應悉數繳入於國庫，因為中紡是國營事業，則所有盈餘當然應歸納於國庫以減輕人民的負擔，不料全部盈餘竟由行政當局自做人情，悉數交於某巨公，作為私人酬勞。倘此項消息不幸而為事實，無異賄賂公行。從此上行下效，貪污之風更無法遏止，私營事業更無法抬頭矣。若吾人急不起而遏止官僚資本的猖獗，民族工業何從談起？

健全的經濟建設必以停止內戰為先決條件

政府為進行內戰，一面搜刮民間物資，一面換取美國的殺人武

器，弄得草木皆兵，鷄犬不留，老百姓何罪，遭此塗炭！中央信託局在東三省收購大豆，無非為換取外匯，收購民營紗廠的棉花，也無非為換取外匯，而換取外匯的目的則在購運軍火。一旦砲彈爆發，不僅其本身化為烏有，而且還燬滅了許多旁的物資，殺了許多同胞。換言之，內戰浪費了我們已出口的物資，破壞了未出口的物資，殺死了很多具有生產能力的壯丁，阻礙了一切生產事業的推進，這樣下去，中國怎麼不會窮呢？倘我們反其道而行，把內戰停止，把外匯換取外國的生產工具如機器，鋼軌，電氣器材等等則整個局面就不同了。轉貧為富，轉危為安，此其上策。

英國經濟大勢

陶大鏞

結 論

由以上所述，我們可以推出三個結論：
一，欲求中國經濟的繁榮，非與自然搏鬥不可。如吾人不能克服自然而受制於自然，則自然之苛酷算慰，今猶如昔生產之不能增加是意中事。

二，吾人須努力破壞一切帝國主義之陰謀不惜與之戰鬥到底。
三，吾人當摧毀一切封建勢力，解除種種束縛，並毀滅其所依賴的官僚資本。

最近（一月廿一日），英國政府就當前的經濟情勢，發表了一份白皮書，它的結論是：「危機極端嚴重」。該書發表後，羣議紛紜，盛觀相告，就變成了全英報章時論和日常談話的中心。

其實，英國的經濟危機，也不自今日始，然而，由於工黨政府在外交政策和經濟政策上的優柔寡斷，終於釀成了今天的嚴重局面。現在，我從各方面略予分析：

（一）工資。利潤。勞資糾紛

英國的罷工風潮，就像後浪推前浪，一天比一天洶湧了！根據英國勞動部的報告，去年從一月到十一月，罷工的糾紛，共達二千零九十九件；參加罷工的工人，共有五十一萬一千人。也就是說，每天發生的罷工風潮，平均有六件；每天實際罷工的工人，平均有一千六百人！這三個月來，報上天天都有罷工的消息，規模愈來愈大，地區也愈來愈廣。像今年年初的貨車工人罷工，使倫敦全市的

糧食分配，竟也大起恐慌。各大城市紛紛響應，參加罷工的，合計不下十萬。目前正在罷工的，還有造船工人和一部分鋼鐵工人。這幾天，建築工人，又要發動大規模的罷工了。

那末，罷工風潮為什麼這樣普遍呢？不用說，英國工人的基本要求，還是增加工資。根據英國勞動部最近的統計，從一九三九年九月到去年十一月，全英工人的每週工資，平均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工資既增加很多，為什麼還要罷工呢？

在這裏，我要提醒兩件活生生的事實：

第一，名義工資或貨幣工資的增加，不一定就是實際工資的增加。一九三九年與一九四六年間，名義工資即使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可是，物價平均上漲了百分之八十三。工資仍舊落在物價後面。也就是說，實際工資反而減少了百分之十八。

第二，工資與利潤的增加，是不平衡的。在同一時期內，工資即使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而利潤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六（這是曾

方統計，實際一定更多！）也就是說，利潤比工資多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

在這樣一個尖銳的對比下，英國工人的罷工運動，還不是一個必然的現象嗎？何況，從今年元旦以來，物價上漲更猛，甚至定量配給的食品，從本月起，也要平均上漲百分之二了，工人和薪水階級的生活，當然更形艱困。

然而，在這次發表的白皮書上，工黨政府竟特別強調工資增加太多了，好像挽救整個工業甚至經濟危機的第一個步驟，先要把工資「凍結」起來。這完全是倒果為因。事實擺在眼前，如果工人待遇再不切實調整，勞資糾紛更將層出不窮，空前的罷工風潮，是一定不能避免的。同時，英國的社會經濟，也永遠沒有安甯的一天！

(二) 工業與貿易的危機

根據英國商務部的報告，一九四六年的英國貿易，似是非常繁榮的一年。它的出口總值，從一九三八年的四億七千萬英鎊增加到九億一千萬英鎊，進口總值也從一九三八年的九億二千萬英鎊增加到十二億九千萬英鎊，也就是說，出口較戰前增加了百分之九十四，如進口祇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英國國際貿易的前途，不是大可樂觀嗎？

但事實上，並不盡然。因為，英鎊的價值，約較戰前貶低了一半，儘管從貨幣數值 (Value) 上看，去年的貿易情況，勝過戰前；可是從商品的貿易數量 (Volume) 來看，去年並未增加。如以一九三八年的貿易量為基數 (即 100)，那去年第一季的貿易量為八十四，第二季為九十，第三季為一〇四，第四季為一一二，全年平均，祇有九九·五，尚較戰前稍低。加以一九三八年並不是真正繁榮的一年，它比一九三七年出口數量，尚少百分之十七。所以，去年英國的國際貿易，還沒有達到戰前的水準。

那末，今年的情形，有無改善的希望呢？當然，我們不能說沒有發展的餘地，但從各方面觀測，總覺得不容樂觀。

首先，發展國際貿易的物質基礎，是工業生產。在戰前，英國的全部工業生產中，有百分之十五，是用來輸出的。而英國倘要恢復到一九三七年的貿易水準，還得比去年的貿易數值增加百分之七

十五，也就是說，要使工業生產量增加百分之十二，這是不是可能呢？

我們必須知道，今天的英國工業，真可說危機四伏。不但勞動匱乏和原料恐慌，獲至機器也嫌陳舊了，尤其是勞動問題，最為嚴重。從白皮書上看，目前英國勞動祇缺少六十六萬人，但實際約缺一百二十萬人。如，從今年四月一日起，強迫教育學齡，從十四歲提高到十五歲，明年又要減少三十七萬童工 (即十五歲的男女)。

它使勞動供給，愈形困難了。

為了解決勞動恐慌，政府主張僱用外國工人，尤其是當局鑒養已久的波蘭「流亡」軍人，但各業工會堅決反對。(按全部波人約十四萬二千人，已有二千一百人安插了工作) 因為，各方抨擊政府「拖延復員」，戰後應該解甲歸田的海外駐軍，至少也有一百二十萬人。所以，這一個勞動問題，在實質上，祇是一個復員問題。如果員文放棄了他的帝國外交政策，這個問題當可迎刃而解。否則，勞動始終恐慌，工業危機始終無法克服，要發展對外貿易，那簡直是緣木求魚了。同時，由於男女工資不能平等，戰後已有四十萬女工，離開了工廠。如果政府接受了她們的「同樣工作，男女工資平等」的合理要求，這批戰時從事生產的女工，又可回到工廠裏來，勞動就更不成問題了。

至於工業原料和機器，倒是真正恐慌的。就原料說，橡皮，羊毛，和棉花，尚能源源供給，而其他工業原料，則普遍感到恐慌，特別是五金，化學藥料和油類。就機器設備而言，英國尚有百分之六十一的紡紗廠和百分之六十九的織布廠，仍舊裝用着十九世紀的紡織機；英國的熔鐵爐，也多是上次大戰時代的平底爐，而不是新型的電氣爐，英國煤礦機械化的程度，更遠落美英之後了。

這勞動，原料和機器，就是英國工業的三大難關。所以，從目前情形來看，英國要增加生產量的百分之十二，誰談何容易？

其次，即使工業生產能夠增加，貿易前途，仍舊長夢多。由於美國獨佔資本的競爭和壟斷，英國在遠東的商品市場，是日蹙一日了。加以法，比，瑞，捷，荷，等國在加緊工業復員，而印，埃，緬甸，馬來亞，巴力勒坦等殖民地，又紛紛要求獨立，大英帝國的商品輸出，再不會有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葉的黃金時代了。

(三) 不平衡的國際收支與財政

上次大戰後，使英國從債權國變成了債務國，經過了這次戰爭，更使英國從一個小債務國變成了大債務國。從經濟上看，大英帝國早就崩潰了。

這次大戰前，英國每年的入超，平均約為四億英鎊，但它每年的海運收入，約有一億英鎊，每年海外投資的收入，約有二億英鎊，每年保險費及手續費等收入（與貿易有關者），也約有五、六千萬英鎊。所以，每年實際的國際收支逆差，約祇四、五千萬英鎊而已。可是，戰後的情形不同了，每年海外投資的收入，祇及戰前的一半（因在戰爭期間，英國出售的海外投資，約達十一億英鎊之巨）。海運及保險費等收入，還不到一半。也就是說，戰後的國際收支逆差，拿去年入超來看約達二億英鎊，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其次，我們來看看去年的英國財政收支。去年預算的租稅收入，共為三十三億英鎊，而海、陸、空軍的預算，竟達十二億英鎊，如果加上給養等，約為十七億英鎊。換言之，租稅收入的一半，是用來支付軍費的，約佔了全部財政支出之百分之三十。但這祇是一個預算的數字，實際的支出，還要超過。從去年四月一日到十二月底為止（按英國財政年度始於四月一日）租稅收入實得二十三億英鎊，而全部軍費及給養，尙不止此數！僅海外駐軍的給養一項，去年即達三億英鎊。像這樣龐大的軍費支出，在英國的平時財政史上，是立前的。就是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的軍費支出，也祇有二億五千英鎊。去年的軍費預算，已比它超過了四倍，至於實際支出，怕要十倍於戰前！

一方面，英國國際收支逆差，較戰前約增了三倍；另一方面，軍費支出又較戰前增加了十倍，試問，英國的財政經濟，又怎麼不要山窮水盡呢？於是，也祇好低首向美國借債了。全部借款是十億英鎊，截止本年正月初止，已借到八億美金，即二億英鎊，就因為這筆借款，使英國的外交政策，由「聯」美而「媚」美了！

(四) 從「經濟的自殺」說到工黨的前途

是的，英國經濟充滿了危機，然而，危機所以嚴重到如此地步

，却是工黨政府的錯誤政策造成的。如果工黨政府真正能夠顧到人的生活，真正提高了實際工資，決不會發生罷工的風潮；如果工黨政府一方面加緊復員，一方面又使男女工資平等，就可以有一百二十萬男工和四十萬女工，決不會感到勞動恐慌；如果工黨政府大刀闊斧地推行國有政策，可以在五年乃至十年內，使全英工業現代化；如果工黨政府放棄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它可以與各國，尤其是歐洲新興的民主國家與其他弱小民族和平相處，建立正常的貿易關係，就不會發生嚴重的原料問題和市場問題；如果工黨政府真有裁軍的誠意和決心，先把海外駐軍撤回國來，每年至少可以節省三億英鎊的軍費支出，也用不到去向美國借款！但，今天的工黨政府，在經濟政策和外交政策上，樣樣背道而馳，結果為處處碰壁。誠如某報所說，它是在實行「經濟的自殺」！

最後，我們認為：英國工黨政府沒有前途，就看看它能不能克服經濟危機。如果工黨政府不願放棄現行的經濟政策和外交政策，經濟危機一定日趨嚴重，它也一定會蹈麥克唐納政府的覆轍！記得上屆英國大選時，工黨所號召的，是實行「政治民主與經濟平等的社會主義」，可是，執政了一年多，依然是一張空頭支票。在外交上，用政治恐怖代替了政治民主；在經濟上，也以經濟貧困代替了經濟平等！所謂社會主義，也一天天變成了非驢非馬的改良主義！弄得民怨沸騰，衆叛親離。如果再這樣「口惠而實不至」，不但工黨內部將起分裂，英國人民也將「羣起而攻之」了！

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於海外

內戰財政的眞面目

龍志成

空前大規模的內戰，已經進行了十八個月了。其間我們政府區三萬萬人民，對於戰爭費用的總負擔，實已達到了極端驚人的程度。單就前年後期幾個月說，政府軍務費的支出，大約就是在六千億元左右，正由於幣值不斷的跌落，此項龐大數字換算成當前的法幣單位，最少即應與六萬億元相當（相差作十倍計），換言之，平均每一國民即負擔了國幣二萬元。

然而去年度的軍費支出更屬可觀。綜計全年度的財政總支出大約爲六萬五千元，屬於軍事性質的項目佔百分之七十五，估計當達四萬八千八百億元之多。顯然地，本年的物價已遠較去年爲高昂，則代表同一價值的金額依現行的法幣計算，當不應較九萬七千六百億元爲少（相差平均作一倍計）。因此，每人的負擔又增多了三萬二千五百元。連前共計，總支出爲十五萬餘億元，每個人分攤卽爲五萬二千五百元。

這便是以往十六個月間政府採用財政的手段所作的戰費支出。但除此以外，其他項目的鉅大尤屬可驚。例如一年來美國對於政府各種方式的援助，總額卽已達四十億美元。此項貸款，僅有極爲微細的部份用以購買交通或生產工具，其餘百分之九十八以上，莫不於內戰中全部消耗（或正在消耗）。如依照當前法定的匯率計算，折合國幣當共達四十八萬億元，亦卽每人平均另行負擔了十六萬元。

其次：糧食的徵發，一年半以來，最少當在八千萬石以上。這撥充軍用的食糧當完全取之於農村，名義上卽如每人平均又爲二萬七千元左右。

第三，正由於通貨不斷地增發，物價在去年度中並猛烈上昇了十二倍。可是每一國民的貨幣所得，却不過增多了六倍至八倍。在

這樣的剪刀差情形下，一般人民在降低生活水準的一點上所忍受的犧牲真是難能以貨幣來估計。如假定政府區全部的國民所得爲廿年時全國國民所得（約一百廿億元）的半數。卽折合貶值後的法幣九十萬億元，則此項剪刀差的損失，應共達二十七萬億元（按百分之三而計算）。自然，此項社會財富並不完全進入政府之手。部份地正爲官僚豪門資本的投機活動所併吞。但人民的負擔總是相同的，平均之官，每人自當再達九萬元之多。

由此可見過去一年又四個月之中，僅僅爲了政府堅持欲達到內戰的目的，我們人民業已負担各色戰費法幣九十八萬七千六百億元，如仍按法定匯率加以換算，亦當折合美金達八十二億三千萬元之鉅。而財產的損失，行政官吏的貪污，以及下層機構的攤派，尤未計算在內。平均言之，每月卽有國幣七萬〇五百億元，折合美金至少五億八千萬元。數字空前龐大，亦卽證實了人民對內戰所作負担的何等慘重！

然而更大的不幸尙擺在我們眼前。就近月來國內政局加以觀察，可見內戰不但沒有停止的象徵，而且相反地，都正向更大的規模和更公開的形式發展。爲配合這種形勢，政府並在上月中旬公佈了劃時代的緊急措施方案，根據這方案，顯而易見地，政府企圖以人爲的硬性政策來穩定國內跳躍中的物價水準，獲得一方面藉以減少戰費的貨幣支出，另一方面，都使所能掌握收入獲得更多的購買力。

正如所謂三十六年度財政新預算所列，政府具有相當把握的各種歲收共有三大類。卽第一，賦稅收入共三萬六千億元，內土地稅則爲二千億元，直接稅九千億元。貨物稅一萬二千億元，礦稅三百億元，關稅六千億元，鹽稅則爲五千億元，其次，公有營業收入七千九百億元，內中紡公司卽佔四千億元。再國有財產及物資售

實收入共二萬千億元，計敵偽產業八千億元，剩餘物資一萬一千億元，黃金外匯三千五百億元，徵借實物則有二千億元，以上三項共計，約有六萬七千億元之多。如以往的經驗所告知，政府此方面的努力決不致失敗，則全數擴充軍費時不啻每一國民又為內戰加了二萬二千元的負擔。

然而即如此，財政收入尚遠較內戰費用的實際需要為極度短少。數周來政府正另在預算以外作種種顯著的努力，我們當不難從各方的新聞報導獲得線索。第一，將是直接徵用國人在外存款。據最初的電訊所傳為三萬五千萬元，後改正為一萬五千萬元。即就此估計推算，亦將為國幣一萬八千萬之譜。顯然地，此項外匯項寸的動用，決直接間接適應於內戰的目的，則列為內戰的費，當至為合理。

其次，便是對於聯總改變救濟計劃的請求。總數初傳為二萬萬美元。後削減為四千九百萬美元，而日內業已核准的，已有五百萬美元。此項預備金當購買棉花運輸我國市場，依黑市價格，高於官價一倍半計算，最少當然可得法幣一千五百餘億元。

其三，出售中紡公司及中華菸草公司。前者大約可值法幣二萬億元，後者則不過一百億元。

第四，政府正圖立刻獲得日本的賠償物資。據公報一千萬噸的總賠償噸位中，我國可得百分之三十，即三百萬噸，而內中五十九萬噸並可以立刻啓用，另據專家估計，此項機器價值可共達美金二百億元。如年內可以出售十分之一，即為美金二十億元，亦當有法幣二十四萬億元之多。

第五，重要產品的輸出實際亦已落入政府的掌握。如桐油，生絲，茶葉，礦產，獸皮，棉紗等項，去年度的輸出共約一萬萬美元，本年內如以半數計，即五千萬美元，亦祇少可抵國幣六千億元。第六，掌握華僑匯款。去年度大約得美金一千二百萬元，本年度如無增加，又即抵充法幣一千四百四十億元。

第七，中央銀行的金鈔收購，當亦可以換取外匯。截至目前為止，大約共收美鈔五百萬元，黃金港幣，尚不為夥。如全年以二千萬美元計，即合法幣二十四億元。

即如上述七項的法幣，總價值共有二十八萬九千四百四十億元，就中可以動用的外匯，當可有美金二萬三千餘萬元。

這便是在內戰繼續進行的情況下政府在一年內所能籌集戰費的最大可能。事實上，國內物價水準的直線上昇必不可免，而戰鬥企圖更難為年內達到，則全年戰費的支出，據權威的估計，最少為總預算的三倍至四倍，如上述各項發現短絀，政府當抄襲通膨脹的舊策略，以新紙幣的發行來填補財政上的赤字。因之，人民對於戰費的負擔，更將不斷地加重，最低限度如以三十萬億元計算，平均每個人不論貧富亦即有十萬元之多。

正如往年的浩劫一般，貨財脹愈向惡性的階級發展，人民對於物價水準與貨幣所得間形差的負擔，將愈達於極度悲慘的地步。一方面，大家生活水準的急速降低，另一方面，社會財富却更向政府壟斷企業及少數壟門資本高度集中。

由此之故，可知當前政府內戰財政的實際情況，正是在隱蔽的剝削政策之下，以三萬萬人民的生活及財產為犧牲，藉以進行殘酷的內戰。然而戰爭總有個終結；人民總也有清算自己的負擔和要求損害賠償的一天。

國信銀行

證券集團套利

第八期

單位：每五十萬元為一單位

期限：五月九日起至十六日共計七天

繳款：即日或至五月七日前繳款

登錄：新戶八日上午十一時前登錄

戶登錄後即可繼續

利息：以市場內登得之利息平均分配

各參加人

地址：漢口路四二二號

電話：九二三九六

所易交券證海上

人紀經號一八二第

書報評介

評「現代中國經濟教程」

紀明

新知書店出版

許滌新著

在學術界出版界仍感貧乏的今天，許滌新先生二十萬字的「現代中國經濟教程」，於此時呈現於飢荒的讀者之前，這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中國人民經過八年來痛苦的戰時經濟生活，而戰後這種痛苦的生活更變本加厲之時，他們是需要理解成他們痛苦的根源，並要求明瞭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各項經濟問題，以增強他們生存鬥爭的能力的，因為他們都要活下去啊！

可是這幾年來中國的經濟學界，顯然存在着兩種偏向。一方面，那些歐美學者從其所處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所意識到的那一套企圖維護或修正已現沒落中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不斷被生吞活剝的移植到中國來，通過「教授」「專家」們的宣講和著述，散佈到一部分聽眾和讀者中去，甚且還影響到政府現行的經濟政策和方案。在另一方面，那些能正確地把握社會經濟發展法則的理論，被介紹到中國來也已有長期的歷史，可是到現在，大致仍還遺留一般化和原則化的理論

階級。要找出幾部能根據正確的理論，融為貫通到中國經濟的現實中去，成為道地中國化的經濟學，在這方面可以說尚無多大成績。

那麼，這部「現代中國經濟教程」，究竟能否適合上述的標準，滿足讀者的迫切要求呢？

據作者在自序中說：「在起初，原想把「戰時中國經濟輪廓」（按該書於卅三年在重慶出版，上海已有再版）稍加整理和補充，但動筆之後，就覺得保持原來的寫法是不可能的了，這不但材料的問題，而且是看法和體系的問題，我們不可能把戰時經濟簡單地只作為日本的殖民地經濟和中國的國民經濟的對立；我們亦不可能只把敘述限制在抗戰時期而把戰後的危機置而不顧；我們更不能只把眼睛朝着黑暗而無視了中國經濟新生的嫩芽。因此，我便把全書的體系重新修改了……在書裏，作者打算總結八年的戰時經濟，並報導戰後殖民地化的危機。關於前者，我們的着眼點是在分析淪陷區的殖民地經濟，大後方的半殖民地半

封建經濟，和解放區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消長；關於後者，我們着眼點則在把握收復區與大後方的殖民地經濟，和中共區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競賽。」（原書第三，四頁）

根據這一方針，作者首先略述雅片戰爭以迄對日抗戰開始以前，這近百年間中國經濟的演變（第一章：戰前的中國經濟），接着依「時間」的分野，敘述戰時經濟的五個時期，即（一）從七七到武漢撤退；（二）從武漢撤退到歐戰爆發；（三）從歐戰爆發到太平洋戰爭；（四）從太平洋戰爭到湘桂淪陷；（五）從湘桂淪陷以迄於「勝利」前夜。（第二章：戰時經濟底動態）然後再以「空間」為分野，敘述三個不同地區的戰時經濟，即（一）敵佔區的殖民地經濟；（二）大後方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以及（三）解放區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第四章，戰時經濟的島嶼）。作者從時空方面檢討了戰時中國經濟後，再進而分析三種不同的經濟政策，即敵寇的經濟侵略政策，以及大後方和解放

區的經濟政策。（第三章：戰時三種經濟政策的分析）。在戰時經濟的分析中（第五章：戰後的經濟危機）作者指出總的經濟危機是工業危機，農村積荒，和財政破產這三種危機的結合，並互相推動，互相影響的結果。接着作者再以一章的篇幅（第六章：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引導讀者向「中國經濟新生的嫩芽」作了一番巡禮。這裏所敘述的是在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下，如何改革土地，如何發展工商業，以及隨着封建經濟的逐漸摧毀，引起了社會關係的怎樣的變化，這部份的材料和分析，對於非解放區的讀者是最有新奇之感的。在第七章中（現代中國經濟的結構與各種社會力量），作者綜合的說明參加這一個經濟結構的各種不同的階級。最後一章（第八章：中國經濟的展望）是結論，作者表示了他對於「新民主主義經濟之成為中國經濟必走之道路」的堅強的信心。

以上所述是全書的一個簡單輪廓，個人覺得這本書有幾個優

點，是值得向讀者介紹的。

第一，在讀者為歐美資本主義經濟學的理论弄得頭昏腦脹，對於中國所發生的許多經濟問題，無從獲得圓滿的理解，從而對於中國經濟的發展規律絲毫不能把握，而又不能運用進步經濟學的一般性或原則性的理論，來分析中國經濟現實的時候，本書在這方面對讀者是大有幫助的。

牛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自日寇於一九一八年在瀋陽北大營燃起侵略的炮火，以迄於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軍國主義的屈膝投降，在這悠長的十五年歲月中，中國的淪敵地區怎樣向着殖民地經濟轉化；西南西北的大後方又怎樣未曾改變原來的半封建經濟結構，反而因戰時的通貨膨脹和種種經濟統制，官僚資本得以急劇壯大起來，成為一個中國式的獨佔資本，以與整個民間資本相對立，到了戰後這種情勢又怎樣愈趨惡化；以及解放區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實施，怎樣獲得了輝煌的成就，向周圍的令人窒息的漆黑一團投射了耀目的閃光。

這些問題作者在本書中，不但提供了明確的輪廓，而且以許多豐富而生動的資料，證實了作者所提出的許多論斷。將戰時和戰後中國經濟的這些重要發展，這樣忠實地記錄下來，使讀者於

讀後對中國經濟發展動向能獲得確切把握的，在目前出版界中，確實找不出第二本書來。

第二，分析中國經濟發展的規律固非易事，要針對中國經濟的現實，提出適合時地要求的建設性的辦法，或更非易事。解放區已經實行的和正在實行中的許多新經濟政策，固然不見得條件都完善無缺，但試驗這些新政策的經驗，卻已得到國內外定評的許多成就，不但對於中國，甚至對於世界都有其異常重大意義的。過去在報章雜誌雖也見到片斷的記載，但予以系統化的報導，並向讀者提供一個清楚輪廓的，還真是本書最大的貢獻。

以上所述是個人粗粗瀏覽一過後，所發現的本書兩個最主要的優點。當然，可資商榷之點也還是有的。

(一) 在第二章「戰時經濟動態」中，作者對於戰時銀行資本的活動，尤其對於所謂國家行局的遍及於工業，農業，貿易及文化各方面的信用膨脹，甚少提及。在第三章「大後方的戰時經濟政策」一節中，關於戰時金融統制的敘述，分量也嫌太少。中國雖然還不是一個信用銀行支配優勢的社會，可是齊個銀行資本在戰時和戰後的活動，對於農工商業所起的作用，以及銀行資

本陣營中國國家銀行對民營銀行的統制和壓迫，這些對於中國經濟發展都著其重要意義的，希望作者在本書再版時能加以補充。

(二) 作者在第三第六兩章論及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政策和發展時，對於解放區的貨幣制度，所述也過於簡單，而且有些材料恐怕已經過時；如邊幣等之「以幣幣作基礎」，現在是否依舊如此呢？解放區的紙幣以什麼作準備，目前的幣值如何，各地區的紙幣如何規定並維持其兌換準？這些問題都是讀者希望理解得更多些的。

(三) 本書中有對於若干名詞的解釋，邏輯稍失之嚴謹。例如在第五章中，作者曾說：「官僚資本就是高級的買辦資本（當然它同時帶着封建性）」，因為殖民地的官僚，就是帝國主義的政治買辦。（本書第二〇四頁）這一定義對於高度獨佔性的官僚資本人成知的「四大家族」，自然是非非常合適的，但如以之解釋一般的官僚資本，就不見得全對。如戰時內地的地方官吏，以超經濟的貪污得本的資本，從事於種種投機經營，這自然是官僚資本，並且也含有濃厚的封建性的，但它並非買辦資本，甚至與後者並無關係。

(四) 這一點也最最重要的，就是本書是以戰時和戰後中國經濟發展過程的智識教育讀者，就這一意義來說，稱本書為教程自然也是恰當的。不過今天讀者最需要的，乃是經濟的理論與實踐融合成一片的基礎智識。假如能有這樣一本教程，從中國的商品形態分析開始，逐步演繹歸納到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而以近代中國的經濟史實作為分析的根據，那將是最理想的。這一本道地中國的經濟學，將遠較側重于敘述經濟史實者為大。然而，在今天的條件下這不是輕而易舉的事。作者在自序中曾證：「這種寫法當然是粗枝大葉的」。這句話的含義，今天在追求真理的一切經濟學者是都能體會到的。當他們在高物價的重壓下，不得不為果腹費去大部分時間，尚須隨時遭受迫害，而不得不流徙四方時，他們便只能揀項要緊的來告訴讀者了。「中國經濟」要走的什麼道路？擺在我們眼前顯然有二條路：一條是美國獨佔資本親御着中國的軍閥官僚及大地主所統治的殖民地經濟；一條是實行土地改革發展工業生產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原書三三三頁）三月一日於上海

捷克斯拉夫經濟的復興

洗文譯

自一九三八年起，捷克斯拉夫的經濟是完全服從於德國軍事計劃的。德國人把軍用工業都集中在這裏。因此，他們不僅利用捷克的工廠，而且把自己的工業企業都整批的搬到這裏來，爲這些工廠工作，更且其他各被佔領國家驅來俘虜和勞動者。捷克斯拉夫工業生產品的價值，自一九三七年的四一六億克隆（註一）增長到一九四四年的六一八億克隆，從業人員也從一百八十九萬五千名增加到二百三十一萬二千名。

於估領者劫掠支配的結果下，作爲解救國家機能的捷克斯拉夫經濟是處於困難狀況中。特種專家委員會確定捷克斯拉夫國民經濟及農作物所遭受的損失，在七千億克隆之譜。三千所工業企業和一萬一千至一萬二千個手工業組織，在改爲適合軍用的過程中被整理或毀滅了。穀物收穫量減低了百分之四十三，甜菜的收穫量減低了百分之四十二。大的有角牲畜減縮了百分之八十，豬隻減縮了百分之五十七。

由於一九四五年四月的轟炸，大企業如許柯達廠，捷克！摩拉夫·斯勃羅易夫喀廠，布爾寧車箱製造廠，拔佳皮鞋廠等均受到損害。所有儲藏的原料也被吸吮殆盡。德國人吸盡了大部份的存款和外匯。捷克斯拉夫國家銀行給予德國國家銀行的透支爲一千億克隆，而予德國銀行界及企業界的私人透支爲三千億克隆。金融紊亂，鈔票發行額達了巨大數目！——一千零七十億克隆。需用勞動力的事業處境非常壞。俘虜工作過的企業因無勞動者而停閉。被驅到德國去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大約有五十萬。從捷克斯拉夫境內移去的國人和匈牙利人約換三百萬，終於顯示出了它的影響和解答。勞動生產力的減縮，在大戰的最後年中就急劇下降了。

捷克斯拉夫人民和政府的當前問題，是從新開始恢復國民經濟

及其機構。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頒布了礦業，大製造工業，合資銀行，私人保險公司的國營法令。到一九四六年四月，徹底國有的大工業，包括擁有四〇〇——五〇〇名勞動者以上的大企業，占工業生產力百分之七十四——七五。

政治的積極性和勞動者的勞動熱誠，使捷克斯拉夫能於短短時期間獲得巨大效果。

自一九四七年起，二年計劃的法規開始生效，依照這法規，戰前的工業生產水準不僅應該恢復，而且還要超過，其時亦將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需要十年的歷程一樣。

由獲得解放以來這一年中的成就，平均到達戰前工業生產水準的百分之六五。一九四五年十月，被使用的生產力平均已到達百分之五十。在若干部門裏被使用的生產力百分比更高：採礦達百分之八五，電力——百分之七〇，造紙——百分之六五。

一九四五年中，阻礙工業復興的基本困難之一，爲燃料的缺乏。一九四五年五月煤的產量爲一九三七年百分之十九，褐煤產量爲一九三七年百分之三三。政府乃實施種種提高產量的限期措置。不得不竭力增加勞動者的數量。此外，成千青年男女勞動者，學生，事務員等組成的突擊隊，義務給國有礦場工作。因此結果，一九四六年四月煤的產量達到了一九三七年水準的百分之九〇，褐煤產量甚至超過了這水準，達到了百分之一一五。按照計劃，預定的褐煤產量爲二千三百九十萬噸，即超過一九三七年水準的百分之三三。煤的產量爲一千六百七十萬噸，即達到一九三七年水準。

原料缺乏是一九四六年最尖刻的問題，首先是鐵礦。一九四五年十月捷克境內的鐵礦產量是三萬八千噸，一九三七年同時期的平

均月份水準爲六萬二千噸。斯洛伐克境內的缺乏情形就更大了。

大戰結束之後，鐵和鋼的產量直接深刻地減縮了。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度的鋼鐵產量大大的增加了鐵的產量達到戰前水準百分之六四，鋼的特量爲百分之六二。一九四八年度的鋼鐵產量，預期達到一九三七年水準。就是產鐵一百四十萬噸，產鋼二百二十萬噸。估領者特別加強五金製造工業和機器製造工業的工作。捷克和摩拉維亞區從事這些工業的勞動者的數量，自一九四四年二十三萬人增加到一九四五年一月的四十三萬九千人；此後它就開始急劇地降低了，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國人完全崩潰的時候，減至十六萬七千人，等到六月裏，僅剩十五萬人了。但是到一九四六年三月，捷克機器製造工業中的勞動者的數量就有二十九萬人。開始輸出自己生產物的五金製造工業和機器製造工業等大企業裏的工作，全給恢復了，但是原料缺乏，對這些工業部門顯得特別困難。因此規定了在一九四六年的前半年度裏，給予工廠的非合金金屬分配比例佔百分之三七，合金金屬佔百分之四十八。

一九四六年前半年度國有拔佳工廠製造了一千萬雙皮鞋，約爲戰前產量的一半。

佔捷克斯拉夫輸出價值百分之四十的紡織工業遭受的估領痛苦特別強烈。該業員工指數，一九四四年減至百分之五七（一九三九年爲一百分）。復興紡織工業的基本問題在於勞動人手的缺乏。國內運輸恢復得很迅速，一九四五年初，捷克斯拉夫約有舊時商運機構的一半和客運機構的百分之七五。自一九四五年五月至一九四六年二月的汽車總量增加兩倍。斯洛伐克的大部份橋樑被破壞了。現在幾乎全給恢復或代以臨時便橋。所有這些工作的進行，全靠國民的本身力量。紅軍是國民復興國家中的巨大幫助。部份紅軍且協助恢復科馬諾和布拉的斯拉發剛地橫貫多瑙河的大橋。蘇聯的幫助，在整個遠大復興工作中起着巨大作用。

和戰前對照，從非生產勞動的極度增長關係中，發展出來的勞動生產力的低落，爲捷克斯拉夫嚴重的經濟問題之一。這是由於復興和準備工作的複雜性與擴大行政機構所招致的。從一九四五年五月至九月三十日，每一百克隆生產工作的工資，要化二百二十四克隆的管理費，同樣在戰前祇要化三十克隆。煤礦工業中的勞動人數，較戰前多百分之十五，而產量却較戰前減百分之十五。

採取了激減非生產勞動人員數量的措施，實行企業管理合理化。這一趨向中的特別重要意義，是決定在斯洛伐克境內建立各種工業企業，該地有剩餘的勞動人手和豐富的原料。而工業化的程度則較捷克境內要低三倍。

基於德國人和捷克奸犯土地擁有的法令，農民中間被沒收及分贖的耕地計一百五十八萬黑克坦（註二）。一百多萬黑克坦的森林轉爲國有財產。最大的地段——十三黑克坦，領取土地者所付的一筆地價，等於這塊地一年或二年的收入，並且准許分期爲若干年付清；在多數情形下，准許免費領取。

捷克斯拉夫在被估領諸年中的國外商業關係是完全被遮斷的。現在它很快給恢復了。這就像一九四五年五月至十月的八個月中，捷克斯拉夫的輸入額爲六萬零四百萬克隆，而一九四六年第一季的輸入額達十一萬四千萬克隆。自五月至十月的輸出額爲四萬七千萬克隆，一九四六年第一季的輸出額達十三萬六千六百萬克隆；這樣一來，國際貿易就成爲出超了。

拿一九四六年四月通過的預算來說罷，顯然復興國家的支出是多麼巨大的一筆。普通預算，歲出爲三百八十九萬二千四百萬克隆，歲入爲三十三萬八千六百萬克隆，包括復興及整理工業的主要支出的非常預算，歲出爲二百五十萬七千六百萬克隆，歲入爲六十四萬〇六百萬克隆。計短少二百六十二萬零八百萬克隆。

國家不願艱難的儘速復興着自己的經濟，且根本的打算是在兩年計劃的執行上。這種成就之成爲可能，全賴於民主的捷克斯拉夫政府施行的根本改革社會的措施上。（譯自一九四六年九月W. R. Egan, *imes And Politics*）

註一：斯堪的那維亞通用銀幣。

註二：約一萬平方米。

當前的財政與法幣

楊培新

今天中國的財政，像是一團紙包着火。凡是稍知內情的人，都會爲它恐懼；惟這團火將燒毀了中國的國民經濟。二月間的黃金潮，僅是這團火燒出來的小窟窿而已。

中央財政的惡化，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嚴重。

例如卅五年度總決算，歲出數量之大，歲入數量之小，便出人意料之外。

卅五年度財政的結算

這裏，我根據各方面所得數字，試作一個決算表。其中未列出的，我不擬以臆測來補足，已列出的，我敢相信是比較近乎正確的。

三十五年度總預算總決算表

項	目	預算	決算
歲	出	二五,〇〇〇億	五五,〇〇〇億
歲	入	二〇,〇〇五億	一九,〇〇〇億
赤	字	三六,〇〇〇億	

三十五年度總收入預算決算表

項	目	預算	決算
歲	入	二〇,〇〇五億	一九,〇〇〇億
賦稅	收入	六,七〇〇億	一二,〇〇〇億
貨物	稅	一,三〇〇億	四,五〇〇億
關稅		七〇〇億	二,〇〇〇億
鹽稅		二,七〇〇億	二,〇〇〇億
直接	稅	二,〇〇〇億	二,〇〇〇億
土地	稅契稅	四〇〇億	一,八〇〇億

所利得稅	四〇〇億
遺產稅	三〇〇億
印花、營業稅	九〇〇億
敵產出售收入	六,二〇〇億
黃金外匯出售收入	六,〇〇〇億
合計	四,〇一〇億

三十五年度總支出預算決算表

軍費	二五,〇〇〇億
復員救濟費	一〇,九五〇億
教育文化費	五,〇四九億
省市補助費	一,〇七九億
合計	五五,〇〇〇億

預算決算的差額，普通都是以緊急命令撥支支付的，按過去的例子，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軍費。例如卅四年一月至八月，緊急命令撥支二千七百八十三億，其中一千九百二十七億爲軍費，連預算中的軍費爲三千一百七十三億，佔總支出百分之七十。

軍費佔支出的百分比，有二點材料透露出來：一是俞財長卅五年六月的報告：「從今年一至五月，政府已將本年度預算二萬五千億，用去一萬五千億，同期稅收祇二億五千萬元，鉅額赤字由發行補足，」其中軍費爲一萬億，即百分之七十。二是南京聯信所訊，政府八月份之總支出約爲四千億，其中軍費佔二千九百億，約爲百分之七十五。按戰事發展情況估計，則上半年戰事較緩和，約佔百分之七十，下半年內戰激化，約佔百分之七十五。大體的估計，卅五年度軍費爲四萬億。

在濟收入之外，還有二筆實物收入：一，田賦：卅五年度田賦

實收爲七成，即四千一百三十一萬担，其中征實爲三九，三五三，五四二石。這是軍隊糧秣的來源。一是美軍剩餘物資和美國代運兵員，裝備機械化師，訓練海空軍的費用，據美國方面估計爲四十億美金。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比較可靠的通貨膨脹數字：

歷年通貨膨脹統計

二十六年(六月)	十四億	廿七年	廿三億
二十八年	四十二億	廿九年	七十八億
三十年	一百五十億	卅一年	二百四十億
卅二年	七百五十億	卅三年	一千九百億
卅四年(八月中)	五千億	卅五年(底)	一萬〇三百九十億
卅五年(六月)	二萬五千億	卅五年(底)	四萬七千億

卅四年底數字的推算，根據俞鴻鈞部長的報告：「抗戰八年內政府共發行紙幣一萬〇三百九十億元。」這八年顯指廿六年到卅四年底。卅五年中期的數字，亦根據俞部長報告(見前引一萬五千億支出，以發行彌補語)。卅五年底數字，是根據決算算出，李儼財次報告：「卅五年度支出超過預算一倍多，」此外還根據可靠方面的數字。由以上數字看來，內戰時期的通貨膨脹遠比抗戰期爲烈。中儲券發行額三萬八千億，法幣早就超過它了。

通貨加發的百分比

時 期	法幣每年平均增加百分比
二十六年——廿七年	四〇·六
二十八年至卅年	八七·二
三十一年至卅四年六月	一三二·五
三十四年(八一—十二月)	一〇〇·〇
三十五年	三七〇·〇

卅六年度的展望

卅六年度的財政情況，一定比卅五年度還要惡劣。

卅六年度財政收支預算

項目	數額	項目	數額
總收入	七〇,三三三億	總支出	九三,二〇〇億

賦稅收入	三六,一一二億	軍費	三八,一五五億
直接稅	一一,六七〇億	建設費	一五,五三四億
土地稅	二,二四〇億	復員救濟費	一四,二二三億
所得稅	三,一一〇億	行政經費	八,七六五億
過分利得稅	二,〇〇〇億	補助省市經費	六,五一五億
遺產稅	一,二〇〇億	教育文化費	三,四二二億
印花稅	三,〇〇〇億	債務支付費	二,五六一億
營業稅	八〇〇億	第二預備金	四,〇四五億
特種營業稅	二二〇億		
關稅	六,〇〇〇億		
貨物稅	一一,一七二億		
礦物稅	三〇〇億		
鹽稅	五,三五〇億		
物資出售收入	二五,〇五六億		
財產學息稅資	三五六億		
財部管售物售	五,〇〇〇億		
敵偽物資出售	八,〇〇〇億		
剩餘物資	一,二〇〇億		
餘糧	四〇〇億		
匯價變價	一〇〇億		
公營事業盈餘	七,八八二億		
其他收入	一,〇七二億		
赤字預算	二二,八六七億		

支出方面，顯然這數字絕對不夠。這預算是在卅五年九月編製的，到現在爲止，物價的上漲已達二倍到三倍(當時物價指數五千倍，二月中旬指券一萬二千倍，這是中央銀行指數，二月底某機關統計爲一萬八千八百倍)。依原預算再加物價指數，這七萬億的數字，一定要加二倍到三倍。軍費方面，國防次長林蔚便說：「軍事復員費合併計算當佔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該預算是根據九月間物價指數計算，士兵服裝糧秣馬草尚未計入，故軍費之龐大將過此。因爲全國兵員已達四百九十萬人。」軍費，大家都知道有二筆不算錢的大窟窿補助：一是美軍的協助，從彈藥武器到糧秣運輸。一是糧食的征實，是軍費能夠低估的原因。但是美軍的援助，今年估計到美

國自身軍費的縮減，未必能夠如上年一樣巨量援助，征實恐怕也未
必能夠超出卅五年度成績，卅五年不如卅四年，已打了七折，卅六
年可能更低，因為已沒有對外戰爭的氣氛，逼使人民繃繃。經濟緊
急措施方案的用意，便在於緊縮其他一切開支，集中打仗，其他開
支是否可縮得了，不知道，軍費的影響却是一定的。

收入方面，各種賦稅都是從徵收的，隨着物價上漲，一定可
能足額。出售物資收入，便未必能如理想：敵偽物資共接收了一萬
二千億，現在除存產業約六千八百億，其中有大部份是工廠，房地
產，倉庫，能出售百分之五十即算好的。剩餘物資就稱八億美金，
實際上恐只值三億美金（政府以駐華美軍三十三、三十四年度款，
幣一千三百億兌換，約合三億美金），這些物資據江鈞局長報告，
已接收者約一千萬美元，已銷售者六百萬美元即依現行匯率，已售
者不過國幣七百億元。一年之內要出售一萬一千億，中國市場未必
有此胃口。最近說的出售國營事業，如中紡可借三萬億等，都不是一
蹴可幾，民間實力乾涸，國營事業一年之內，能賣到二萬億就是
好的。

法幣的枯萎

黃金外匯的枯竭，是今天政府財政經濟上窮蹙的象徵，也更喚
動了物價上漲。黃金在抗戰勝利時，政府有三百五十萬兩，勝利後
接收上海中儲五十萬兩，平津十萬兩，共計四百萬兩，但自卅五年
三月起不斷拋售，（卅六年初一個月即拋售五十萬兩）到卅六年二
月已報告罄。卅六年初貝祖貽想到香港購票市墨金，又遭遲滯，國榮
運金子到墨西哥的打擊。外匯的儲備，美國封存中國人存款時有三
億五千萬美金，其中有一部份是政府銀行存款，最近却宣傳只有一
億五千萬了，二億億當中，可能有一部份政府存款，部份官僚存款
，被解凍了，使用了。此外，三十四年初孔祥熙在美結算駐華美軍卅三
年以前貸款國幣二百億，美國撥還億五千萬，這是撥入外匯基金的
。其後三十三年至卅四年八月的美軍撥款一千三百億，宋子文去結
了二億美金，滙豐美金已經用來購買美軍剩餘物資。因此，我們估
計，卅五年下期宣佈管制輸入時，外匯基金五億已因上期上起用掉
二億，購買剩餘物資三億，已經瀕於竭絕了。卅六年元旦華府記者
透露中國外匯基金只剩五千萬美金，是可信的。

卅六年度的中央財政，將是最為困難的一年，縱然美國有五億
貸款，也抵不上四十億美金的援助。日本即有賠款，但一些貨物如
機器物資，都不易變錢。一方面是通貨更加劇的發行，一方面是貨
幣準備的黃金外匯告竭，法幣的崩潰將不可避免。改組政府所能為的
只是拖延法幣崩潰的時間。但就目前情形看來，法幣的崩潰，已在
二月間發作一次，也就可能在青黃不接之季發作第二次。就如吐血
的人，吐了一次，血管開了一次大裂口，勢必還要吐一次，二次，
直至乾枯為止。

上海河南路328號

致用書店

經濟新聞讀法

培新著

定價一萬零五百元

科書報所總經售

作家書屋

中止路六一〇號

沈起子譯 懺悔錄 本書為全世界最偉大的自傳
二萬二千元，寫出了一生之悲歡史。定價
李勣人譯 小東西 書中寫一孤兒
。歷悲歡離。緊緊扣動青年純潔之心。
。定價一萬六千元。

戰後物價的演變過程

壽進文

這裏所檢討的戰後物價演變過程，在時間的歷程上是從三十四年八月以迄本年三月。這一年半還多一點的時期，雖然並不是很長，但由於這時期正是中國從戰時的閉關經濟中脫出而參加了國際經濟生活，又正是中國結束其對外戰爭而從事於規模更大的內戰，因此，這期間影響物價演變的因素遠比戰時來得複雜，而物價本身的演變也就甚為錯綜。

中國物價的變動是富有地域性的，假如忽略了這一點，就難於獲得物價變動的全貌，可是我們並無足以代表許多不同區域的完善的物價指數可資利用，這不能不說是物價研究工作的一重大阻礙。以下的分析所根據的物價指數，是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所編製的上海重慶兩地主要商品零售物價指數。上海是全國的經濟中心，重慶可以為距離口岸較遠的內地大都市的代表；除此以外，正在進行戰爭的地區，幣制另樹一幟的如東北，台灣，新疆等地，以及政治經濟別成一系統的中共治下的區域，關於這些地

區的物價變動，也構成了中國物價全貌的一部分，可是顯然非上列物價指數所能代表。因為統計資料的不完全，所以以下分析物價演變過程所得的結論，其適用地區也是有限的。

個人認為迄本年三月底止戰後中國物價的演變過程，大致可以分成五個階段，茲逐段加以簡單的說明如下：（所引物價統計係採自中央銀行月報新二卷二期，楊蔚，唐傳泗：勝利以來的我國物價變動）

一，物價回跌時期

勝利前夕重慶舊物價約為戰前，七六六倍，日本投降消息傳來後，感應性最強的黃金美鈔首先暴跌，一般物價也繼之劇降，在八月十日迄十月十五日這兩個多月中，黃金跌百分之四七·八，美鈔跌四五·二，一般物價跌落三二·八。其他內地大都市如昆明，成都，西安，蘭州，貴陽等地，物價在此時期也都下跌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不等。

此時後方物價的普跌，是由於市場心理認為：（一）各地交通即可恢復；（二）對外貿易即可重開；（三）口岸地區廉價的商品即可運來後，所以對於物價前途的估計是回跌而非繼續漲。這種估計表現於經濟行為的，即是商品的持有者於此時紛紛向市場拋出，而商品的需要者則延緩其購買。儘管市場心理所期待的事實尚未實現，可是商品市場的一時供過於求，就必然的促使物價普遍下跌。

至於勝利後上海物價的變動，也發生回跌現象，其原因與後方物價之所以下跌相同。其唯一的不同在於華中人民為應付偽幣在將來整理時可能的貶值，紛紛將所有偽幣變成商品，而此時上海物價以法幣折算遠較後方為廉，復吸引後方的資金開始湧來競購物資。有此兩種原因，所以上海物價的回跌時期非常短促，僅只八月上旬迄中旬那一段時期。

二，物價回漲時期

上期物價的回跌，是由於市

場心理之因勝利而轉變，但往後事實證明這種估計完全落了空。無情的事實表明了：（一）通貨與信用繼續在膨脹；（二）交通只局部恢復，運輸非常困難；（三）對外貿易並未如理想中之很快重開，致國外物資猶未大量來華。除此以外，許多新的事實更助長了物價前途的難於樂觀，如：

（一）一月間的停戰令未能生效；內戰有繼對外戰爭結束後擴大的趨勢；（二）工業生產方面，後方因物價下跌和政府停止軍需品的訂購而趨倒閉，收復區則因接收工作之無效率而停頓。

就由於這些原因，所以在後方自十月中旬，物價又逐步回漲，計自十月十五日到十一月底，重慶物價又上漲了一八·六，平均每月上漲一二·〇，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底，受中行在滙豐金收縮通貨和上海物價不跌的影響，這一個月內重慶物價稍跌三·九，從十二月底到翌年二月下旬對外貿易與匯兌市場重開之前，因上海物價激漲，此期重慶物價又上漲八·〇，平均每月漲四·四。

從卅四年八月下旬起到翌年二月下旬這期間上海物價的急劇回漲，除上述解釋後方物價回漲的共同原因外，主要尚有整理幣制的原因。

廿四年九月財部所規定的中儲券與法幣的兌換率爲二百對一，依當時上海與後方物價計算，同一法幣，在上海的購買力就高於後方甚多，所以一直到翌年二月上海物價水準開始超過後方時止，後方資金之爲競購物資而大量湧向上海迄未稍間斷。計自廿四年九月到十月，上海物價上漲九、四，十月到十一月更猛漲一六二、一，十一月到十二月上海物價之忽下跌一〇、八，這是物價大漲後的回跌，而且此時期外救濟物資已有少量運到，同時敵僞物資又已從十二月起開始在市場平價拋售。

遲至廿五年二月廿六日始公佈辦法。

新辦法公佈後，各地正在波

動的的金鈔立即下降。三月四日央行規定對美匯率爲二、〇二〇元，八日起央行並在上海配售黃金。而對外貿易開放後，除少數禁止和許可進口的物品外，外貨可自由輸入，因此自三月份起，進口貨數量大增，這些新的因素，對於物價變動是很有影響的。

在廿五年二月到八月，這六個月中上海物價共上漲百分之二二三，平均每月漲一八、八，這漲率比較外匯貿易市場開放以前，自然已減緩，但每月平均近百分之二十的上漲，還無論如何談不到穩定。

增加，利率也並不減低，所以工業生產仍處困境，反而因爲國外大量低廉製成品的輸入，使國產工業品在本國市場上無法與之競爭。至於輸出品因匯率之偏低，也陷於停頓中，其價格毫無起色，如此期間上海桐油僅上漲百分之四、一，豬鬃反下跌一一、一。

至於此時期的重慶物價，因華西區糧價平穩，僅上漲百分之二、三，平均每月漲〇、四。

四、第一次調整匯率

本年一月份上海物價漲百分之四、八五，重慶且下跌四、七

〇、一，平均每月漲四四、九。

這一期是戰後物價變動最混亂的時期，勝利之初所期待的一切有利的轉變，都爲無情的事實所粉碎。假如能較合理的整理收復區幣制，妥善處理敵僞物資，並提前開放外匯和對外貿易市場，則收復區物價斷不致於如此狂漲，爲今後的一切措施增加了無窮的困難。

這期間物價之仍不能因匯率的穩定而即穩定，其原因在於與外匯變動無其直接聯繫的食糧價格，此時波動甚烈。糧價的高漲是因爲此時正值秋收前的青黃不接時期，收復區各地軍糧的收購，和由後方復員歸來的人口的增加，更增加食糧的需要，而國外到米數量，也不足以遏制米價漲勢，所以此期間上海食物類の上漲，竟達百分之一六七、四。

自八月十九日到當年十二月底，此期間上海物價共上漲百分之四六、六，平均每月漲八、九，比上期的物價漲率尚低，由此可見食糧價格的穩定，對於一般物價的影響有時比匯率還要重要。此期間重慶物價共上漲百分之八三、四，平均每月漲一四、四，物價的上漲率反速於上海。

三、外匯貿易開放

這期間物價之仍不能因匯率的穩定而即穩定，其原因在於與外匯變動無其直接聯繫的食糧價格，此時波動甚烈。糧價的高漲是因爲此時正值秋收前的青黃不接時期，收復區各地軍糧的收購，和由後方復員歸來的人口的增加，更增加食糧的需要，而國外到米數量，也不足以遏制米價漲勢，所以此期間上海食物類の上漲，竟達百分之一六七、四。

新匯率公佈之初，金鈔價均暴漲，一般物價也上漲甚烈，自八月十九日到九月十九日這一個月間，上海物價上漲百分之二二、七，重慶物價也上漲一九、二

前大漲，計二月上半月上海物價漲百分之四六、九，重慶漲二二、一。

五、緊急措施實行

這一個月之後，匯價對物價的刺激已成過去，故物價的漲勢亦稍戢，而國內各地糧食秋收尚佳，也有助於一般物價的穩定。

十一月中旬修正進出口匯對辦法之實行，嚴格限制輸入雖對於進口物價有極大影響，但八個多

月來輸入的物資不在少數，在市場存貨尚未銷罄之前，影響物價的作用尚不甚顯著。

以來

二月十六日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公布，這是政府在戰後與繼續的物價作最大決心的一次搏鬥。到三月底爲止，在這一箇半月內，物價居然跌落了，計上海物價跌百分之三、九，重慶物價跌一

二、五。

以後

輸入的原料品價格亦穩定了的，這自然是有利於國內工業生產的一面但工資因糧價之繼漲而

重開外匯和對外貿易市場，

重開外匯和對外貿易市場，

物價的下跌現象是否罷歸功於方案的實施呢？

方案有助於物價下跌的作用，首先是禁止金鈔的自由買賣，以停閉金鈔的公開市場來暫時隔離金鈔行市變動對於一般物價的刺激，金鈔交易的由公開而轉入地下，比起以前公開領導一般物價的漲跌時，自己不可同日而語。次之，金鈔公開市場停閉後，

凍結於金鈔上的游資數量相當鉅大，在地下交易大規模展開以前，稍大量的金鈔除非售給中央銀行，否則脫售總比較困難；因此也就暫時阻礙了這部分游資向商品市場流竄。此外，經濟監察團在上海對於食糧，紗布等重要商品市場的監視，儘管其所運用的力量為政治的而非經濟的，但一時也却可收一點效果。

經濟緊急措施方案足以促使物價下跌的作用，也就僅如上所述。這一個半月來物價之所以下跌，主要還是為物價本身的發展規律所決定的，因為在物價漲風之時，一切可能運用的貨幣資本都向商品轉化，到了一定的飽和點之後，物價的漲勢也就自然戢止，繼之而來的常是因持貨者於獲利後逐漸拋出，從而物價也就

止漲轉跌，這一個半月正就是物價大漲後的反動回跌時期。這一個時期將延居到何時為止，雖然無從具體指出，但無論如何這只是另一次波動前的間歇，倒是可以斷言的；因為經濟緊急措施方案並未從根本上來解決物價運動的最大矛盾！——貨幣量增加與商品量減少間的對立。

四月四日

替日內瓦的貿易會議推流年

婁立齋

國際貿易會議第二次籌備會議已於本月十日在日內瓦揭幕，這是去年十月倫敦會議的延續，今秋正式會議的最後準備。參與會議的有英、美、法、比、澳、巴西、捷克、紐西蘭、盧森堡、加拿大、智利、印度、挪威、黎巴嫩、古巴、印度、南非和我國等十八個國家的代表，討論的問題，遍及今後國際經濟合作與自由貿易的各個部門，範圍廣泛，內容複雜。會議的時期，可能延長到四、五個月之久。會議的陣容，雖沒有一九三〇年日內瓦的關稅休戰會議和一九三三年倫敦的世界經濟會議那樣偉大，但其

性質却亦不容忽視，因為會議如果能有切實具體的收穫，便可替今後國際經濟合作的前途塗下一塊穩固的基石，否則就難免不再是一雷聲大，雨點小，重蹈一九三〇年的日內瓦會議和一九三三年的倫敦會議的覆轍的。

那麼這次會議究竟會不會有切實具體的收穫呢？工業先進國家和後進國家間，以及主要輸出國家間的利害對立，是否可以以相互讓步之下緩和妥協，是有決定的作用的。

這次會議由美國發起召集，她的目的，在建立國際的自由貿易制度。原來這次戰爭以後，她

的工業生產技術，生量能量以及資本的蓄積，已佔領了資本主義國家領域裏的王座。自由貿易制度的建立，可以幫助她擴大市場，增加商品的輸出，所以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對英貸款成立以後，馬上提出了擬訂國際貿易憲章，建立自由貿易制度的白皮書，邀集蘇聯聯上述出席會議的國家於一九四六年二月舉行世界貿易會議的籌備會議。屆時因對英貸款協定，還未經國會批准，協定中所規定的英帝國貿易優先制度的廢棄，又沒有實施的把握，而美蘇之間的經濟關係，因美國對蘇拒絕貸款，也頗冷淡，故預

定二月間舉行的籌備會議就被延擱下來，一直延到十月十四日，始在倫敦正式揭幕，但蘇聯仍沒有代表出席。

在這次會議中，基本上發生了兩個對立：工業先進國家和後進國家的利害對立，與輸出國家間的利害對立。

前一個對立，工業國家的理論根據是美國所提出的國際貿易機構憲章，主張取消貿易的管制，實行自由貿易制度。附和這個論點的是印度和中國；後進國家的理論的根據，是巴西所提出的對案，主張會議應充份注意與會各國的就業問題，因為倘真要激

底實施美國的計劃，則美國的商貨，必將獲得大量出口，而形成鉅額的出超。目前世界黃金，集中在美國的已達總數的百分之八四，如再繼續集中，很可能促成另一次的世界性的經濟恐慌，附和這個論點的，有澳洲，加拿大，智利，比利時，和捷克等國。

後一個對立，主要的是英美兩國間的對立。這兩個國家，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輸出國家，前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也曾坐過資本主義國家領域內的經濟王座。一九二九年爆發的世界經濟恐慌，削弱了她的經濟勢力，到一九三一年，她爲了保持過去的經濟地位，連從十九世紀以來一向採用的自由貿易政策也被迫放棄。這次戰爭以後，經濟的王座已被美國奪去，她在國際間的經濟地位，更爲衰落，爲了恢復過去的繁榮，帝國優先貿易制度的放棄和自由貿易政策的重被採用，究竟是不大可能的，雖然三十七億五千萬美元的借款逼逼着她做了美國的尾巴。

在這二個基本的對立之下，第一次的籌備會議，沒有切實具體的結果，就散了場。

第一次籌備會議閉幕以後，英國就加強了匯兌的統制，成立「匯兌統制法案」，以補救廢除帝國貿易優先權後可能引起的缺

陷。而加拿大，南非聯邦，澳洲，紐西蘭以及英本國的發言者，雖先後聲明願意考慮優先制度的變更，但均再三強調，任何變更，將繫於他國的充分讓步。這所謂「他國」，主要的自然是指美國，因爲目前世界各主要輸出國家，惟有英美間對立最爲尖銳。美國的態度怎樣呢？杜魯門總統於三月四日，正值英帝國貿易會議的前一星期，在台北克羅斯州發表演說稱：「美國將以種種方式，實現國際自由貿易……美國是經濟世界的巨人，將來經濟關係的形成，終必唯美國的馬首是瞻……舉世各國，倘不放棄管制貿易的政策，則美國在此種壓力之下，將使用同樣方法，以爭取原料與市場」。這種傲慢自大的態度，不是對世界各國！尤其是英國的威脅是甚麼呢？三月十一日，英帝國及其領屬舉行貿易會議，商討應付這次日內瓦會議的方略。商務大臣克里浦斯致開幕辭說：「日內瓦會議的成敗，將影響未來的整個世界經濟。英帝國各部對此項會議，尤有特別艱難複雜的課題。本國與各領屬間，由於特種親屬關係，向有特別聯繫，今爲適應世界更廣泛的範疇，必須使其配合」。這幾句話和杜魯門的演說放在一起，我們就不難發見其微妙的關係。這次

會議揭幕後，克里浦斯在日內瓦招待記者時又稱：「美國減低關稅，尙不足以易取英政府之發達帝國貿易優惠制度，蓋因關稅之減低，不免有限制，則優惠制之減除，自亦應附有限制」。從這幾句話中，英國的態度，不是更明顯了嗎？

不但如此，當今的世界經濟關係，比諸去年十月倫敦會議的時候，不但未見改善，而且更見惡化。英美間的經濟合作關係，已日臻黯淡，今年一月到二月間，唐密街發表的二次白皮書，英國經濟的危機，提出了嚴重的

警告，同時三十七億五千萬美元借款的運用，不但無補於英國的復興，反使英國的資本到處受到嚴厲的約束。這是舉國上下，都已深切體味到的。在另一方面，美國經濟，也走過了繁榮的頂點，步向恐慌的深淵，過剩的商品，日有增加，而工業後進國家，大部份已深深地感到美貨泛濫的威脅。在這種情勢之下，要這個會議，不重蹈一九三〇年的日內瓦會議和一九三三年的倫敦會議的覆轍，我們實在不敢十分樂觀。



鐘牌
414
毛

拔萃越做
到處同行

中國萃造公司出品

誰應得日本賠償品

志龍成

垂涎甚久的日本賠償物資，最近似可袖手而得。遠在二月上旬，首都方面已經盛傳遠東委員會業已指定拆遷十三種軍事性工業設備，即鋼鐵廠，火力發電廠，造船廠，飛機製造廠，海陸兵工廠，製酸廠，鹹廠，鋼球軸承廠，工具機製造廠，鉛金屬廠，民營兵工廠，及人造橡皮廠等。據日政府估計，以上各設備總噸位將達一千二百萬噸之多，價值三千億日元。我國應得比例，雖未經最後確定，一般觀察以為最少可獲百分之三十，即賠償品三百六十萬噸，價值日幣九百億元。其中第一批即將立刻拆運國內的，共重五十九萬八千四百八十一噸，計工具機有十四萬噸，造船機械五萬噸，鋼鐵機械三十三萬噸，化工機二萬四千噸，電力機二萬九千噸，及輕金屬製造機一萬七千噸。全部運輸費用，估計應達國幣三千四百餘億元，至建廠費用，並當需一萬七千餘億元之鉅。另據三月廿九日合衆社電，日民生產管理局發言人透露，中義越南及暹羅四國，並將分配日本存金計七千三百萬公分，約八千一百八十萬美元。其中我國可得六十八萬三千二百二十一美元，暹羅越南則較多。可見本月賠償物資主要除機械外，在預擬中者尚有其他貴重物品。降至本月五日，美國政府方面突然下令麥帥執行臨時分配計劃，即將全部賠償品的百分之三十，依下列比率立刻進行拆遷，計我國得百分之十五，約有工廠三百所，其餘則分配於菲律賓，荷屬東印度，緬甸，及馬來聯邦等各百分之五。工廠內容，主要為鋼鐵，造船，燒煤，電力，化學，機器，飛機製造，及海陸軍兵工製造等業。曠目已逾半年的日本賠償問題，至此遂到達了一個最具體的階段。

政府方面，對於此項賠償物資的處理，在行政院之下早設有專門委員會，而派赴日本的代表團，包括電機，化工，機械，經濟，和法律專家各一人，亦先後於本年春季陸續首途赴任。綜觀此次先行拆運回國的物資，計一百三十餘萬噸，擬分二次運送，需費估計約常有國幣八千餘億元，即折合美金六千六百五十萬元。至於分配辦法，經報端所公佈者，約為第一，國防部將於最初六十萬噸中提出四分之一，大部當為兵工廠機械。其次，關於鋼鐵的部份，將撥交鞍山及華北二鋼鐵公司。關於造船部份，撥交上海中央造船公司。電力部份，撥交東北電力局，冀北電力局，以及首都，上海，廣州，長沙等地的發電廠。工具機廠，則移設馬鞍山。另工作機並分配於中央電工廠，以及航委會，交通部，經濟部等所屬的其他各工廠。設如其餘部份陸續到達，則處理方案，自當另行擬訂。

由此可知，關於此項物資的分配運用，政府方面已全部包辦。緣二月中旬本市民營工業界還組織了一個日本賠償機電工廠籌備委員會，計劃以日本賠償機械，成立造船，水力機，電機，蒸氣鍋爐，鋼球軸承，內燃機，蒸氣機，農具製造，電氣用具等各聯合工廠，開工以後，其股權即由戰時蒙受損失而此次復行投資的民營各廠分別掌握。美麗的憧憬，至此遂粉碎無餘。即或能夠分。享殘羹，其代表並已明白宣稱，此並非直接賠償戰時的損害，仍將由民營工廠出資承購，可見如不付代價，所有步驟，仍當完全落空。

另一個特色便是政府方面特別着重軍火工業的機械。如兵工製造，將由國防部統一接收，其餘如工具機，煉鋼設備等，亦莫

不直接分配於與國防部有密切聯繫的各國營工廠，實際上固無異構成整個軍火工業的另一重要部份，企圖如何，當值得 倍最嚴密的注意。

原來當局所有打算，仍不脫一切服從於內戰的最高原則。不僅在軍火工業方面，要求增加生產實力，以補充前線給養的不足。即在財政方面，由於本年度最少十萬億元以上的鉅赤字無法得以彌補，也必須另開可靠財源，藉以挹注。出售日本賠償物資，正是最好的不費成本的辦法之一。例如三月中旬商報載有所謂有資格人士的指出：最近中樞所定的經濟政策，係側重於日本對華賠償，估計可以獲得價值二十一億美元的貨物，實較向美磋商借款，更現實云云。不啻全盤心事，已被一語道破。卽是財政最高當局，也不諱言此種秘密。如本月九日記者招待會上，俞部長亦承認出售日本賠償物資，可以增加鉅額收入，以達到平衡財政的目的。因之，行政當局重視這一問題的處理，自在一般意料之中。

但全國人民在抗戰期間一切公私損失，政府方面應該担負全部的責任，加以賠償。如據上月廿七日商報所載本市市參議會頃接到行政院覆文，謂敵偽產業的標售，不得作為賠償戰時損失之用，至於該項損失，應向日本索取賠償，可見亦無任何推諉的餘地。回憶去年年底經濟部潘次長曾經公開估計我國戰時直接損失為三百億美元。間接損失為二百億美元，共計五百億美元。另本年三月廿三日法國新聞社電，行政院對抗戰期間我國所受損害的估計，業已確定概數為二百二十億美元，可見與上述數字，大約相當，至分類的統計，據二月十六日紐約聯合祕書處所提出的報告，謂我國人民，直接死於戰爭者有九百萬人，死於疾病及受傷者，亦有數百萬人，貧病遷徙失業的人數，尚不在內。房屋的損燬，大約有四千萬間。棉花的減產，則達戰前總生產量的三分之一。此外工業機器，則損失十分之九。船舶方面，本市專家的估計共約十二萬噸，另漁船尚有三十萬噸，依目前船價每噸九十美元計算，應共值一千三百五十萬美元。再如整個武漢區方面工業的損失，據工協鄂分會的報告，工作母機計損失三千八百部，約二千九百噸。材料損失一萬一千噸，共佔原額百分之六十五。其他機器一萬四千二百噸，另廠房及附屬設備佔原額的百分之六十一，可見慘重的一般。

總括以上所述，可以斷定八年抗戰，我國人民所曾忍受的驚人現在辦事的諸公，對於這項危機，難道還不值得好好警惕嗎？

損失，這非任何國家可以比擬。大體予以估計，死亡約有一千五百萬人，西遷約有六千萬人，至財產房屋工業設備等的損燬，估價最少應及美金三百億元以上，如折合目前法幣，即達三百六十萬億元之譜，數字的鉅大，亦史無前例。因此之故，如當前政府方面的措施不立即變更，無異戰時一切的損害，間接變成了僅僅迎合少數人的拖延擴大，將有更多人民的生命及財產，又不可避免要遭受新的摧殘與犧牲。後果的惡劣，只要明眼人一加分析，就可知完全不能想像。

因此之故，我們不得不要求第一步，所謂行政院賠償委員會不得作為獨裁的機構，應由各地人民自動派遣代表，正式參加。其次，全國人民的直接間接損失，應由人民團體自行申報，不得由指定機關代為辦理。第三，物資的處理，應以發展社會生產力，並確實賠償人民的損失為唯一的執行的原則。至於由軍事機關壟斷分配，或由官僚事業輾轉取得，均當由當事人負事後的完全的責任。

至於此次臨時賠償物資的選擇，麥帥總部除已將六十五家機器廠，及十二家火力發電廠的名單公佈外，其餘應即拆遷各廠，亦將陸續予以確定。我國代表團方面，切勿以選擇有利於軍需工業的機械設備為滿足，應該多考慮本國工業化過程中的實際的需要，而以有利於社會生產的工廠為選定的第一目標。至於運送返國以後如何處置，應由賠償委員會秉承各方面的意見，加以辦理。大抵此項物資共值美金二十餘億元，另運費及建廠費數億元，總額決不致超過美金三十億元。以之賠償全國民營工業的損失尚嫌不足甚多。因之，不如仍由全國民營工業聯合會加以承受，然後按戰時的損失以及目前的整款多寡，以確定股權。能如此辦理，才可稱為完全公允。至於第二批物資選定之後，應由何方面接受，自可以徵詢輿論界的意見。

總之，人民在抗戰期間担当了犧牲和痛苦，則取之於敵入方面的賠償物品，自必須完全歸還於人民，同時，據最近聯合社的消息，目前標作賠償的各廠，不過是日本工業中的「明顯剩餘財產」，則日本基本生產力的存在，根本並未加以破壞，由此可以獲得證明。因此日後敵人如東山再起，我國勢當又被列為侵略的第一目標。

論美金庫券公債之發行

千家駒

最近南京國民政府通過發行卅六年短期庫券美金三億元及卅六年美金公債一億元，均分兩期發行，本年四月一日及十月一日各發半數；前者利息年息二分，每六個月付息一次，三年還本，每六個月平均還本六分之一。後者年息六厘，每六個月付息一次，還本期限，合計為美金四億元。

這兩項公債，也許真正要被當作政府財政上的「王牌」了。據財政部長聲明政府發行短期庫券及美金公債的目的是為的「吸收游資，穩定金融，減少發行，平衡預算」，俞部長並「以財長地位保證此次公債絕對有信用」。但究竟這兩項公債能否發行成功，即令發行成功是否能夠挽救財政的危機以及達到俞部長所宣稱的目的，却不要說是我們，即最樂觀的觀察家，怕也不能不表示懷疑吧！

我們知道：公債發行成功的條件是政府必須有良好的信用，使人民真正相信購買公債是一種投資或儲蓄，而不是對政府的什麼捐款或獻納。在一個信用良好的國家，一筆公債的發行，往往不須數日即被人民購實一空，而且購銷額有時甚至超過發行額以上。這本不失為吸收人民剩餘購買力補苴財政良好的方法。但在我們中國的情形可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了，在抗戰以前，政府以高利貸的方式來發行公債，每一筆債券的發行，利息折扣等計算起來，平均利息終在二三分以上（當時一般利息為七八厘，兩分已是驚人的高利貸）。所以政府發行公債無異飲鴆止渴，銀行為貪圖厚利而承受公債，政府為救濟燃眉之急而以公債票向銀行抵押。但當時因法幣尙未貶值，所以公債雖不一定公開發行，究竟還不失為吸收銀行資金的一種方法；同時，政府之政權相當的穩定信用尙未全失，公債只

要按期還本付息（雖然有過兩次變更公債條例，如民國二十一年及民國廿五年各有一次，頗失信於人民），究竟也還不失為一種投資。但自抗戰以後，由於法幣之不斷貶值，公債之微薄的利息再也引不起購買者的興趣，同時政府的財政政策採取以發鈔為重點，所以戰時發行的內債，除了有三五次（如民國廿六年的救國公債，廿七年之金公債，廿九年之建設金公債與軍需公債及卅一年之同盟勝利美金公債等等數次以外）公開發行，成績欠佳以外，其他各次都以總預約券的方式，向銀行抵押，即以公債債券交與銀行，作為擔保，再由銀行墊款給政府，而收取幾厘利息，根本未印成條票，更說不上公開勸募。這種公債發行早已失去了公債的意義而成爲變相的通貨膨脹，所不同之通貨膨脹直接由國家銀行發行鈔票，而發公債向銀行抵押是銀行帳面上多了一筆公債票之債權收入，如果銀行是國家銀行的話，則債權與債務者固屬同一主體，發公債與發鈔票更成爲二而一，一而二的東西。就財政經濟之意義來說，實屬毫無分別。由於發行公債之無異發行鈔票，所以這幾年來，政府彌補赤字財政的手段毋寧是採取簡直了當的通貨發行，而不再用掩耳盜鈴自欺欺人的發行公債。

何以我國發行公債，即印成債票向社會勸募公債，每次的成績都欠美滿呢？這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當然是政府沒有良好的信用，對公債的還本付息，很少認真的履行，儘管公債條例由立法院通過公佈，票面有財政長官署名蓋章，而且當發行之初財政長官信誓旦旦，表示遵守國家之大信，但結果還是會以「財政困難」為理由，以「命令」改變「立法」，把還本付息期限，隨意變更，例如民國二十一年及二十五年便失信過兩次，這事已成陳跡，也許大家不甚記憶。但民國廿四年的黃金儲蓄存款四成歇款，失信之舉，莫此為甚，國人如不健忘，當尙留有深刻之印象。其次中國發行公債

不容易成功的原因是由於中國的資本主義尚未發展，證券市場不發達，人民根本沒有購買公債的習慣。因此人民都把買公債當作對政府的捐輸而不把它當作投資，政府亦以強迫攤派方式推銷公債，更增加公債在人民中之惡劣印象。最後再加以戰時幣值的跌落，目前黑市利息已提高至月息幾角，連銀行定期存款部已絕跡，誰還有興趣去買政府的公債，而貪圖幾厘利息呢？

這次發行的四億元美金公債，以美金為發行單位，『將來還本付息時，照支付日國家銀行美金牌價折給國幣（庫券），或付以美金外匯（公債）』，這樣公債購買人可以保持其投資的幣值。這在今天本不失為一個較聰明的辦法，因為購買美金公債的人，可以不必顧慮法幣貶值的損失。但問題便在這裏：人民不是真正相信政府的信用呢？誰能夠保證政府在還本付息時不會藉口什麼經費支絀，再來一次如民國卅四年的四成黃金獻金，或者再變更還本付息的條例呢？在『好話說盡壞事做盡』的政府當局，今天還會有人真正相信財政部長『債信鞏固』的保證嗎？怕中國不會有那樣老實的投資家吧！所以我們即令把三年或十年之內，中國政局會發生什麼變化這一成問題的問題，暫且認為『沒有問題』，今天有游資在握的人不是對購買公債會發生興趣，怕也是不待龜卜而後知的吧！我們終還記得民國三十一年同盟勝利美金公債，那時政府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來推銷，用了搭配、購權、攤派種種方法，到了三十二年六月尚未推銷一半，而人民却早已怨聲載道。論發行條件，那次還比這次有利，所不及的，祇是那次利率稍低，而這次庫券的利率較高（年息二分），但當時黑市的利率也遠低於今日。但那一次美金公債勸募尚且失敗了，要在政府信用較之卅一年更為一落千丈的今天，發行公債能有良好的成績，除非天底下有奇蹟出現，否則恐怕是不可強的吧！

在這次美金庫券發行條例上，規定『還本付息，按照支付日中央銀行美金牌價折算付給國幣』，根據過去的經驗，中央銀行的美金牌價與美金實際的市價是有很大距離的，就目前說，一萬二千元的牌價是與黑市市價差不多的，但誰能保證在六個月之後，黑市不漲高至二萬或二萬元以上呢？這時央行牌價如依舊不變，則一個人投資美金庫券，為了貪圖年息二分而甘冒法幣貶值的危險（牌價不變，而黑市美金已提高，則依牌價折合國幣依然受貶值之損失）；他又何

如被放於每月二角的高利貸（較庫券利息高了十倍），或者直接購買美金黃金以保存幣值之為得計。如果匯率常常改變，這顯然非社會市場之福，結果在匯率快變的前幾天，庫券可能銷售一相當數量，也會重蹈過去去舉辦黃金儲蓄存款時之覆轍，受其利者為消息靈通的官僚資本家而已。所以一個穩健的投資者，對這次短期美金庫券是決不會感到興趣的。

至於美金公債本息，雖決定「一律以美金外匯付給」，但它的還本期限是定為十年，誰能料到這十年之內，中國政局會發生什麼變化？中國政府能不能長期保持信用？恐怕神仙也不能作保證吧！所以長期公債雖規定以「美金外匯」支付，但這張空頭支票，要十年之長期內才能兌現的，在政府信用早已掃地無餘的今天，美金公債推銷之困難，自必更甚於美金庫券，當可斷言。

因此，我們相信這次公債發行是不會成功的，當局雖宣稱將採取自由買賣，不用攤派方式，但結果恐仍不免於攤派，一用攤派，流弊自多，擾民必烈，而且決不可能募集足額。過去若干年的公債發行史實，可為證明，無待贅言。

上海金融界及輿論界似乎一致希望這次發行的公債真正用之於生產建設上，而不用在內戰上，這真是太天真的「書生之見」，不為是為內戰，國民政府還用得到發行公債嗎？事實上問題的關鍵不在用途，用途是早已確定了的，「軍事第一」，這是用得到討論嗎？問題在四億元美金公債能否順利募集？其次，即令能順利募集，能不能挽救今日瀕於破產的國民政府的財政危機？我們知道去年國民政府所消耗於內戰上的費用約國幣六萬億元，假定以去年匯率三十元合一元折合美金，約須二十億美元。今年內戰的費用至少估計需三十萬億元國幣，以一萬二千元匯率折合美金約須二十五億美元之譜，可知這四億元美金公債不過當今年戰費之六分之一而已。所以即令四億元美金能夠順利募集，也決無補於當前破產的國民政府財政，這是不待智者而後知的。

挽救財政危機的辦法只有一個，即立刻停止內戰，但今天國民政府既決心打內戰到底，中國財政除崩潰之外，是不會有第二條路的。四億元美金公債濟不了事，即發十億元美金公債，最終還不是變成了炮灰嗎？

劉大中教授的「妙策」

紀明

在四月六日的大公報及第一期經濟評論上，劉大中教授接連發表了兩篇建議「根治目前經濟危機的方策」的大文。劉氏的基本觀點認為：「目前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是游資的充斥，和政府收支的不平衡。所以封凍游資，和用直接稅去彌補政府收入的不足，是徹底解決目前危機的根本辦法。」

劉氏所見到的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其實只是現象而非本質，以因果關係來說，也只是果而不是因。游資為什麼充斥？是因為通貨膨脹在不斷使社會財富重分配而集中於少數人手裏去，並且在不斷減縮社會財富的再生產，使膨脹中的貨幣資本不投入生產而成為游資。政府收支為什麼不能平衡？是因為額外的軍費支出，以及物價擴張的擴大不平衡的程度。因此劉氏所指出的這兩種經濟危機現象的共同的本質，在現階段乃是內戰所造成的通貨膨脹。

這一點劉大中教授也是知道的，他在註釋中就承認：「平弭內戰自然是更根本更重要的政治條件」，令人奇怪的是為什麼他同時又說：「只有封凍游資和推行直接稅，才是根本挽救經濟危機的辦法」呢？政治是經濟的集中，我們不懂為什麼談經濟問題就只能將論點局限於「經濟方面」，而將政治因素避而不談？這樣避重就輕的討論又有什麼實際的價值？

再就劉氏獻策的內容而論，他建議用分期發行「臨時性新幣」和「永久性新幣」的辦法，來迫使企業和個人申報所存資金，然後將其游資部分封凍，並迫使企業據實陳報營業收支及盈虧額，以杜絕逃避所得稅。

這樣的方策乍看起來似乎既新穎又精巧，但一究其實，漏洞就很多，在這短文中不暇詳論，僅提出兩點來就教於劉大中教授。

(一)無論「臨時性」或「永久性」的新幣，劉氏方策中未有

一語涉及其幣值的穩定，如新幣的價值仍不能穩定（不「平弭內戰」是無法穩定幣值的），則與舊幣又何異？又何必多此一舉來發行徒足擾亂市場的新幣？

(二)新幣幣值既不稳定，而「臨時性新幣」的流通期限又甚短，於是發行之後，商品的持有人必不願出售，而市場交易也必被迫採行物物交換，物價激漲和市場紊亂的情形必將釀成經濟上的大混亂。「臨時性新幣」發行幾次之後，那時新幣價值跌到一文不值，也許於政府發行「永久性新幣」有利，但，且不論這種新幣價值仍難穩定，現政權還經得起經濟上的大混亂麼？

所以我們不懂，為什麼劉大中教授的獻策避去更根本更重要的治本方法不談，而他的治標辦法，又偏偏選定了困難重重的工商業，和在無把握的改革幣制中犧牲將最慘重的人民大眾來開刀！

胡明編著、戰後新版，上卷出書

世界經濟地理講座

是中國出版界唯一完備及最新世界地理專著
定價三萬五千元，讀者郵購，八折優待，批發特廉

光華出版社
上海（9）南京西路
九一弄一七八七號

新政府的經濟方針

紀明

國民政府已經宣告改組了，改組後的新政府所面臨的課題，自然是「軍事」第一，因此今後凡百施政，都得向前線看齊，經濟施政也不能例外。

由三黨及幾位「社會賢達」所共同簽署，「將為改組後國民政府所共同遵守」的十二條施政方針，與經濟有關的為第九及第十一兩條。在這兩條簡短的條文中，雖然嗅不到什麼火藥的跡象，但其中第十一條（這一條在公布之前曾加修正）就頗有微妙的跡象可尋。

就這一條條文「今後所有舉辦之外債，應指定專為穩定並改善人民生活及生產建設之用」看來，「生產建設」的範圍是不待解釋就很明確的，但怎樣才算「穩定並改善人民生活」，字面就相當含混，而且範圍也不易確定；大至假整理幣制之名以遂行加強內戰財政之實，這種外債可以說是為穩定人民生活，小至為暢達軍運而借外債的運用之妙，真是存乎一心了！

施政方針雖為外債用途的「合法化」預先留下伏筆，但新外債的真正借到手恐怕還要再下些工夫，因為新政府成立後美國對於對華貸款的表示，還儘在兜圈子，似乎尙須再觀望一陣，這在新貴們是感到有些掃興的。

至於稅種方針第九條，所謂「澈底整理稅制及財政，簡化稽征，減少賦稅種類及附加稅，以減輕人民負擔」云云，不過民青兩黨登台時在人民面前拿這張遠期支票作為障目的扇子，否則以實際將這一條重申和平建國綱領第六章第十一條的條文，刪去「以資產及收入定累進稅則」呢？為了避免得罪富人，連平均人民負擔的財產累進稅都不願實行，還談什麼「減輕人民負擔」？

在政協決議的和平建國綱領中，其第六章財政經濟章，對於如何促進中國工業化，防止官僚資本發展，實行「耕者有其田」，改善勞動條件，厲行財政預決算制度，監督內外債用途，根絕苛雜與非法攤派，以為徵用逃避資產等等，本來已有明確而具體的規定，而這些規定，也確實是「本於國家的需要，與人民的要求」，可以

達到「建設統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國」的。可是因為這次政府改組，誠如美國紐約時報所論，是「並不符合政治協商會議的決定」的，儘管施政方針第一條還聲言「改組後之國民政府以和平建國綱領為施政之準繩」，實際上是不會不有距離的了，否則又何必於和平建國綱領之外，再來十二條施政方針？

在新政府行政院長張羣的就職後廣播中，就更可窺見今後政府經濟施政的動向，他說：「治標方面，當繼續切實執行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治本方面，今後的措施，必須特別謹慎，着重於根本之圖，少作枝節之計，凡是無關於預算平衡幣制整理，無關於國計民生的迫切重要事項，絕對不輕率行動。」

就這一段話看來，張院長將穩定經濟的治本之圖，歸納為平衡預算與整理幣制兩個重點，確已把握了問題的重心，但具體辦法又怎樣呢？在當前軍事第一，凡百施政都得向前線看齊的形勢下，軍費支出既有增無減，平衡預算與整理幣制試問如何着手？且不說現在新外債猶未借到，就是到手之後，內戰財政的無底之洞又豈是有限的外債所能填得滿？所以內戰的大前提如不改變，講老實話，穩定經濟的具體辦法是永遠提不出來的，而假如沒有具體辦法，儘管已經把握問題的重心，問題仍是不會解決的。

治本既尙無可能，光是治標又能有什麼用呢？而現治標方面又不過是「一切實執行」已經褪了色的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像方案所規定的禁止金鈔買賣和流通，凍結生活指數，在京滬兩地嚴格執行議價等等，並非沒有切實執行過，其效果如何，睜眼一看方案實施一個半月後從四月初到目前物價波動的情形，誰都能答復這一問題。現在再繼續切實執行下去，至多尙尚未執行部分各國營生產事業轉讓民營等予以實現，可是這也仍不能解決財政方面的危機。

在以軍事求統一的形勢下，所以不能有穩定經濟的治本辦法，甚至頭痛醫頭的治標辦法也醫不好頭，就因為「形勢比人還強」，問題在形勢之改變與否，而不在于人事的更迭。

（四月廿六日）

獨佔資本與美帝國主義

王士章

今日國際間情勢的緊張，是帝國主義的金融寡頭們急切地要實現其利潤以挽救資本主義制度的結果，而這裏的所謂金融寡頭，主要地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因為他的資本主義國家，在二次大戰中都已經破殘不堪，自救之不遑，他們的目的是，只不過保持國內市場，只有美國，在這次戰爭中是唯一的暴發戶，大量的生產迫使他不得不向國外拓展市場，因而便引起了國際間劍拔弩張的緊張局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參戰各國都遭受了嚴重的損失，英國已喪失其在國內和國外的財富的百分之廿五，德國喪失其國民財富達三分之一以上，其他各國的生產量，也只相當於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八十，但在這個廢墟之上，美國的財閥們却建立了更大的財富，生產率的膨脹，達到了空前的水準，工業產品的指數，從一九三九年的百分之一，到一九四四年就達到三五三三的比例，全國各大企業公司的利潤，據美國商務部的估計：一九三九年為三十三萬萬元，至一九四四年就達到九十九萬萬元，五年之間的盈餘，增高了三倍，戰時生產力的急激發展，促使財富迅速地集中於少數人手中，許多中小企業在戰爭過程中都被併吞了十五家汽車公司，在一九四一年獲利二萬萬七千四百萬元，而這十五家公司，又被摩根和杜邦二財閥所密切控制，鐵路事業在一九四二年獲利，達九萬萬元，除了極少數以外，差不多全被普洛勃財閥和摩根財團所瓜分，又十一家大公司控制着全國工廠百分之三十，而這三十一家公司，又被摩根，梅龍，洛克斐勒，杜邦，和克里夫蘭辛的卡所掌握着。

獨佔企圖構成了美國式的「繁榮」，龐大的財產集積使所謂「自由競爭」者無立锥之地，大至鐵路，煤礦，小至酒吧間，啤酒，餅乾，糖果，信箋，汽水都被獨佔資本家瓜分得精光，財富迅速地集中，一九四六年全國生產總值達一萬萬八千萬萬元，是據農業部分的統計：百分之十的存戶，却佔了百分之六十的總存款，其餘百分之四十的存款，掌握在百分之六十中小存戶之手，而另有五千萬人民却絲毫沒有積蓄，甚至收支不能相抵！號稱「黃金國」的美國

，却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掙扎在飢餓線上，而讓少數財閥們渡着極其極端的生活！

推行十三年的羅斯福新政，在戰爭期中曾經大大地縮小了財閥們的利潤，過份利得稅的徵收，最高額達百分之八十五，五，當在財閥們看來，自然是眼中釘，工人運動在羅斯福執政期內，他的勢力迅速地擴大了，工資普遍地提高，各種保護勞工的法案也相繼施行，但隨着羅斯福的逝世，杜魯門並不能繼承他的遺產，反動勢力在共和黨代表表中控制了美國的議會，財閥們的代言人眾院院長馬丁，參院共和黨政策委員會主席塔夫脫等，竟公開宣佈要徹底肅清「新政之散亂局面」，保護勞工的三種法律：華納勞工關係法，納里斯拉加第亞法令限立法，費爾斯勞動標準法，都將有被廢止之虞，共和黨反動派準備通過立法的手段，制裁一切合法的罷工，並延長工作時間自每週四小時至四十八小時，馬丁並宣佈美國政府「應即停止干涉人民之私事」，並「制止一切足以影響公眾健康或安全之罷工，如煤鐵罷工之類」，「通用電氣公司董事長威爾遜甚至建議於十二個月內停止增加工資！」

但是反動勢力的擴張，並不能真正地克服工人階級，相反地，只有加緊了二者間的矛盾和衝突，大規模的罷工風起雲湧，一九四六年一開頭便有層層工人的罷工，接着便是通用汽車公司，二十五萬名鐵道工人的大罷工，鋼鐵業，煤礦業，海軍船塢等相繼罷工，影響工人，達一百六十五萬人，四月以後，煤礦業工人，海員工人工等復因物價管制之取消所引起的物價高漲而相繼罷工，迫得杜魯門不得不急切地在國會裏通過禁止罷工的法令，共和黨在去年競選獲勝後，緊隨而來的便是親約四十萬煤礦工人的總罷工，財富的集中在去年達到了最高峯，而去年勞工間極大的險惡亦已經達到了空前的程度，總計一九四六年罷工的次數達四千七百次，參加的工人達四百六十五萬人，工作時間的損失為一萬萬一千三百萬「人日」。在美國五千五百七十萬工人中，不參加組織的已寥寥無幾，美國勞工聯

合會擁有會員七百萬人，而工業組織委員會則擁有會員六百五十萬人，美國工人組織的迅速擴展，與財富的日益集中，使階級的矛盾愈形深刻。不在此也，工人的罷工運動顯然已經從經濟鬥爭發展到政治鬥爭的前夜了，去年五月，美國鐵道工人大罷工的時候，杜魯門一面命令軍隊武力接收，一面在國會裏稱：「此並非勞資糾紛問題，事實現已演變至以政府為對象之罷工，此種工潮如在其持續存在，政府勢將宣告解體」，同時國會通過了阻止罷工的緊急法案，充分地表明了「民主」的範圍愈來愈小，而政治鬥爭的道路則愈來愈近了。去年十二月三十日，「美國進步公民協會」在華萊士領導之下正式宣佈成立，而今年一月四日，羅斯福公民協會」在華萊士領導價管理局長漢德遜等復組織「美國人民主行動會」，美國工人現在已漸漸覺悟到：政治的鬥爭與經濟的鬥爭為不可分，離開了政治的鬥爭，則經濟的鬥爭便成爲沒有意義。

獨佔資本的高度膨脹，與因而引起的嚴重的勞資衝突，社會消費力因物價之上漲而下降，於是巨額的商品堆積，迫使財閥們不得不向國外尋求市場，以緩和這些內在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體系中，政治不過是經濟的附庸，所謂外交，不在是金融寡頭們掠奪世界市場的一種代理機關，通過貝爾納斯——范登堡的外交政策，商品與資本便大量地輸出了，除了蘇聯及加拿大以外，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有獨佔資本的蹤跡。摩根系的鋼鐵公司在巴西，智利，墨西哥，和古巴開採着鐵礦。摩根系赫爾斯的大銅公司在秘魯，智利，墨西哥，和玻利維亞開採着銅礦。梅爾系的美國鋁公司開採着圭亞那的鋁礦。而巴西，巴拿馬，和委內瑞拉的錳礦則全被摩根系和梅爾系所瓜分。石油大王洛克斐勒開採着玻璃維亞，委內瑞拉，秘魯，墨西哥，中美各國，以及伊刺，伊拉克，荷屬東印度的石油。其所控制的美孚油公司與紐架賽標準油公司收買沙地阿拉伯境內油公司的所有權，在最近也已經談判完畢，近東和南美的弱小國家，在經濟上已淪爲美帝國的殖民地了。

表現爲資本主義國家生產與消費了矛盾的龐大商品堆積，迫使其貨物不得不向海外傾銷，一九四六年的美國國際貿易，極爲活躍，約達一百五十萬萬元之鉅。去年的對英貸款三十七萬萬五千元萬元，對中國的五萬萬貸款雖未核准，但變相的貸款則已超出二十萬萬元了。對外的貸款並不是爲了「促進世界復興」，而是爲了金元國

自身的利益，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以外，凡是向美國貸款的國家，並沒有把一箱箱的美鈔裝回國內去，而是用那筆錢向美國購買機器，農業設備，糧食，軍火，以及其他物資的。結果，喂肥了的並不是債務國，而是財閥們。債務國的貸款除了利息以外還有附帶的條件的，例如英國的向美貸的三十七萬萬五千元萬元，貸款期限爲五十年，除每年要付息金一萬萬二千元萬元以外，英國還須部份地放棄其印度管轄與進口管制，因而美國商品便可自由地在英國及其殖民地印度埃及緬甸傾銷了。對於中國的援助，如軍備租借十五萬萬六千元萬元，國庫撥款五萬萬元，進出口銀行信用貸款六千六百萬元，剩餘物資一萬萬七千五百萬元等，總計達二十三萬萬萬元之巨。而中國則於去年十一月四日與美國簽訂「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允許美國人在華有「居住，商務，製造，加上，職業，科學，教育，宗教」之權，這種交換條件，難道還不足以表明美帝國主義者的用心嗎？美國的對法貸款，國務院直到法國大選的時候才將這筆五萬萬五千元萬元發放出去，使法國的溫和份子變爲反共產主義者。拿金元來影響他國內政，使其更趨於保守。這正是金融寡頭們所賴以苟延其殘喘並從而榨取其利潤的卑鄙手段，美國借給比利士一萬萬一千元萬元，丹麥二千萬元，荷蘭一萬萬元，沙地阿拉伯一千元萬元，也同樣地含有除利息以外的更廣大的利潤。向美國貸款的國家，便須時時聽命於美國，正如犯罪者不得不受深知其秘密的人的要挾一樣，因此，受貸國便有漸漸地淪爲殖民地的危險。

被財閥所支配着的美帝國主義，非但企圖以貸款來實現其利潤及苟延其殘喘，而且還企圖以其金元的威力來控制世界。專爲大企業大銀行說話的拜龍經濟週刊最近曾透露了這樣的一個計劃：美國獨佔資本企圖通過資本一百萬萬元的國際復興銀行，以控制某些國家的財政和金融，它的業務，據拜龍週刊說，除了貸款以外，還要執行國際「經濟警察」的任務，它在各國的分支行將極力限制某些政府在經濟事務上的主權，並企圖通過立法程序來嘉惠美貨的輸入。他們有責任「阻止會員國家把從國際銀行裏借來的款項作錯誤的用途和一切政治投資，任何政府都不得避免國際資金的通貨及貸款制裁。」被誇爲「世界復興」計劃之一環的國際復興銀行，正如善後救濟物資一樣地被用作帝國主義以經濟奴役世界的政策之一部份了。

爲了實現其利潤，美國的經濟寡頭們，竟不惜違反波茨坦協定，而企圖重建德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已陷於普遍的飢饉和破產，德國是如何迫切地需要着救濟，但是美國經濟寡頭們所注意到的，却是德國的大企業和托拉斯，他們正在拚命地收購這些龐大而又陷於困境的企業的股票！因爲這樣，所以德國資產階級的利益便和遠隔重洋的美國財閥們的利益打成一片了！德境美佔領軍司令麥克納特在去年七月宣佈美國的工業家可以和德國工廠建立直接的商業關係後，美國的商品和資本便源源輸入殘破的德國市場，以剝取利潤。

財閥們爲了要在這個具有六千萬人口的市場充份地實現其利潤起見，所以他們主張復興德國，以增加其人民的購買力。他們主張復興德國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強大的德國一方面可以做美國的市場，一方面則不啻是進攻蘇聯的橋頭堡，陷於飢饉和貧乏的德國，如果一旦社會主義化了，對於美國自是莫大的威脅。

同樣的理由，日本的復興在財閥的眼光中也便成爲必要，一年半來，日本在麥帥扶植之下，各項生產力迅速地恢復，某些工業品如紡織品等却已經運銷南洋各地了。美國的財閥們現在並不怕日本

所謂貨幣恐慌包括一切由貨幣方面所表現的恐慌，如本位幣恐慌，金融恐慌，信用恐慌。至本文的對象不是我國目下的危機，而是針對歐美各國的狀態。這種恐慌在十九世紀各年代早已開

論貨幣恐慌

王師復

始，但在第一次大戰之後，它更加嚴重化了，而且是取得了完成的形態。特別在一九二九年爆發的空前大恐慌中，它不但加重了一般經濟恐慌的破壞性，而且延長了恐慌的繼續發展。在今後，由於循環的繼續發展，加以歐洲各國本位幣基礎極端薄弱，財政

再和他們作競爭，因爲現在的日本已經整個地在美國統治之下，大的財閥如三菱，三井，安田，住友等（這四個財閥控制着日本國民經濟百分之四十）已經被解散，剩下來的小企業並不能和美國作競爭，而是附隨在美國財閥尾巴之後，何況這些中小企業中，美國爲了協助他們的「復興」，早已投下大筆資金了呢！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擁有一萬萬六千萬人口的號稱「最民主」的國家的美國，他的命運，却被八個寡頭財閥所佈置着。而且他們還企圖利用他們的國家作工具，來控制整個世界！這原是資本主義發達高度化的必然邏輯。

二次大戰的結果，德國，意大利，日本的財閥們被擊敗了，代之而起的，却是碩大無朋的美國財閥，這個財閥的興起，使英國法國的財閥貴族們都爲之黯然失色！但是，「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也即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目前美國財富的集中，已經達到了空前的程度，社會的矛盾也日益尖銳化，勞工階級將普遍地覺醒，我們相信：美帝國主義實在是出世得太晚了！

——一九四七，三，十二於杭州之大

一

幾種：

萬分困難與國際金融關係非常錯
 一，信用恐慌 以信用制度
 之破壞與現款之退存爲
 特徵。
 二，投機恐慌 以估價過程
 爲限，可再分爲：
 甲 證券市場恐慌
 乙 商品市場恐慌

三、新企業恐慌 由於過分投資到新興企業，其原因為預期的錯誤或有效資本之不足。

四、資本恐慌

由於過分投資到公債，其完成在於有效資本供給之不足。以上各種恐慌與貨幣多少都有直接的關係，不過據德學者烏魯布克看來，中以信用恐慌最為嚴重而且影響範圍亦大（註一），這無非是由於它與貨幣關係最為直接的緣故。所以加塞爾在他的社會經濟原理對於景氣的說明中曾以為第一次戰後的經濟發展曾受到重大的貨幣紛亂之影響（註二）。嗣於一九三六年，他又公開接受循環是純貨幣現象的見解（註三）。總言之，貨幣之成為恐慌或循環的中心已是有着公認的實格了。但貨幣如何會造成恐慌呢？各家之解釋不同。茲就貨幣理論案中對貨幣因素之影響特別注意的人們中間特選以下三家的意見以資參考（註四）。

二

首先提出的學者便是以循環貨幣原因說的先驅者來看的法學者威克西爾，他認定：在現代信用制度之下，一切借款集中在銀行手中，如果其他因素不變，若借款銀行把它們的利率減低在自

然利率之下，並在若干時期保持此種態度不變，則一般商品的價格將提高至無止境（註五）。所謂銀行利率即指貼現率，而自然利率則指資本市場上的利率，是貸放資本需求與儲蓄供給均衡的利率，故又稱為均衡利率。當銀行利率減低在自然利率之下時候，儲蓄數量便要減少，因資本市場的需求被銀行放款所吸收，儲蓄便減少它的需要。在一定的所得數量下，私人所得是比例地分為儲蓄與消費兩方面。儲蓄方面減少，消費方面便會增加，消費部分增加，增加了消費品的需求，結果消費品的價格便上漲了。在另一方面，銀行利率減低的結果，企業者可有利的地從銀行獲到資本，而擴大他們的生產，因而他們對於勞動土地及原料的需求將相應加大。在這種場合工資地租及原料價格也勢將上漲。因為在市場上，未來的價格是以現在的價格為準而估定的，因此，由於現在價格的上漲，企業者便必然要把他們的製造品的未來價格提高，由此類推，物價水準便愈提高，企業者的成本也日益加大。

這樣便造成了暢銷的狀態。最後，由於價格之不斷提高，勢必引起經濟崩潰的。其次他認定銀行的業務大半是受手續上的限制，因此在景氣向上期中，銀行利

率是奏着非常遲緩的步伐跟隨自然率之上漲而增加的。這種遲緩便引起通貨膨脹與物價上升。在恐慌之後，銀行利率也是較自然率降低為緩而下降，因而便引起今日循環與跌價。因而他結論謂今日循環之產生不是為了銀行不能適時調整銀行率之自然變動，而是為了他們不能適時依從自然率之自然變動而加以調整。這樣物價之變動不是與銀行率而是與兩率之差額起了相互的關係。以上所述包括了威氏的循環兩大原理，那就是利率差額說與緩步的銀行率說。雖然威氏並不會徹底主張貨幣原因說，可是他的以上見解却為後來貨幣學派的理論根據。

三

正式提出恐慌是貨幣現象的是英學者豪特利。據豪氏看來，恐慌是關及需求的問題；而需求根本就是貨幣的現象（註六）。需求的源泉是消費者所得。所得來自生產。一般說來，社會的消費力與生產量相等。然所以會發生問題者，實在於生產量與賣出量的不一致，若干工業因生產品得不到銷路，於是縮小生產，減低價格。在此場合，他們的所得基金將雙倍減少，一方面是為了就業降低，他方是為利潤減少

。結果使其他工業的生產量的需求亦受影響，因而便影響到一般需求的減縮，一般需求縮減，利潤與工資愈低，所得更減，需求愈縮。恐慌終於發生。從表面看來一切好像祇是在生產部份的變動，但他却以為，在實際，生產活動必須通過金融機構才能存在之前，甚或未完成前，必須先期支付參加生產的人們的所得的。所以首先他就得向銀行借款。其次定貨商人也必須向銀行借款。以定貨。第三，在這裏所謂消費大部分自然是指資本物生產而言的。企業家固然可以發行股票向資本市場募集資本，可是不但資本市場必須經常向銀行借款調節直接的供購而且銀行還可以公開直接向資本購買股票。此外資本市場上有許多投機者，這般人也要向銀行借款的。因此生產之擴縮自取決於銀行的態度，這樣，造成人民所得的主要源泉是在銀行了。如果銀行放低利率或立即購買股票，則生產便可擴大，生產擴大，所得增加，所得增加，消費品要求開始增大。結果價格水準上漲。價格水準上漲到一定階段，實際所得減少，消費品需求減少。另一方面，由於原料及生產品價格亦相應上漲之故，利潤減低。企業家支付無力，於是銀

行停止借款，提高利率，或拋出證券。企業家勢必無法維持。倒閉及暴發發生，恐慌便降臨了。這種循環，豪氏稱之為惡性循環。不過他還以為利率下跌也有不能刺激生產的時期：第一，在許多生產者正忙於製造已定購的數量時，第二，在不景氣中需求縮小，商人減少定單時，第三，在某期間中，企業者經常必須交付一定量定貨時。在這些時期，低廉的貨幣，或低下的利率對生產便失去它的影響力。這種場合，豪氏稱之為信用僵屍。一旦此種情形發生，本位幣便受到危害，金融恐慌便產生了。

四

如果說豪氏是貨幣原因說的創始者，那末德學者海耶克可說是此派的修正者（註七）。他指出貨幣制度與物物交換不同，因為它分裂了後者場合所固有的直接均衡關係。同時他還認定貨幣數量不一定會引起貨幣價值的變動，因而貨幣價格水準的變動，幣值的影響是兩方面的，即供需兩面，而幣量的影響僅為單面，只在需求一面。在擴張的經濟中，幣量對於生產的影響是不必通過幣值與物價的。在這種經濟中，幣量之增加並不會影響價格水準，然可單獨造成銀行率與自然

率之不一致。這種不一致的結果與價格水準無關，但却和相對價格有密切的關聯。因為相對價格可以影響生產量與生產方法的，所以幣量之任何變動必然也會影響生產了。基此概念，海氏展開了他的說明。在他的說明體系中，一方面採取蓬巴威克的資本的生產時間說，把生產過程分為許多階段，從原料生產通過各種中間物品生產到消費品的生產。消費品生產為最後階段，與消費品階段較為接近的階段為較後階段，而與之較為隔離的階段為較前階段。原料生產為最初的階段。每一階段都假定有一個價格差度。另一方面，他又採取了密什新的自動儲蓄與強制儲蓄的分法，所謂自動儲蓄是指所得的儲蓄部分，所謂強制儲蓄是指銀行的信用儲蓄，而是強制儲蓄。上述中間物品即是生產者物品，這種物品可分為特殊品與通用品。前者只能用在某特定階段生產上的物品，如各種特別機器與必須經過一定階段始能完成的半製品。後者為可用在任何階段的物品，如一切生產原始因素，原料及若干通用的工具如刀鎚等。何以自動儲蓄不會而強制儲蓄會造成恐慌呢？據海氏看來，自動儲蓄對社會生產有自動調節的能力。假定消

費者決定多儲蓄少消費，結果投資增加，生產增加，於是生產者物品的需求相應增大，因而它的價格上漲。另一方面消費減少，消費者物品的需求相應減縮，因而它的價格下跌。但是生產者物品的價格並不一例上漲的因為與消費者的物品接近階段的生產者物品，其價格受到消費者物品的跌價之影響較之其受生產者物品基金增加之影響為大，故此階段的價格仍將下跌僅較消費者物品的跌價程度為小而已。這樣價格差度便更趨地縮小。生產者為追求到週計勢必將資本找到價格較高的階段。通用品全用在那些階段的階段。上，故價格上漲。特殊品之用在同一階段者價高，而用在較後階段的價低。這樣便引起生產結構的變動，延長了生產的迂迴過程。但這種趨勢不會保持長久，因為，生產者鑑於資本受新機器生產之吸收而逐漸耗盡，而他方社會消費者物品復日漸缺乏，必將改向消費者物品之增產。這時消費者物品的價格將相應提高，其或較生產者物品為大。則生產過程將漸縮短。於是生產活動重新調整過來。但在強制儲蓄的場合便不同了。關於這一點，海氏分

兩方面加以說明。第一銀行的新增貨幣首先注入生產者兩場合。此時銀行將利率減低在自然率之下，提供低廉的借款，生產者便擴張生產；延長生產的迂迴過程。生產者物品生產之增加即為消費者物品生產之減少，消費品價格上漲，另一方面，由於投資數量的增加，工資勞動者的所得也增加了。於是消費者物品與生產者物品的需要比例地起了相反的更動。但因受銀行信用的刺激使生產者物品的生產并不因消費者物品生產而縮短其過程，最少可以與消費者物品保持均衡的狀態。但是銀行不能繼續擴張信用的，即使它們願意繼續，惟因價格之激增，也不得不停止信用供給。一激增至，生產者物品生產停頓，恐慌便發生了。第二是銀行追增的信用量首先注入消費者方面。在此場合，結果也會一樣的。因為在消費者物品需求增加之下，生產機構從長期過程中到短期過程。生產的較前階段的一切活動將一律突然停止，失業發生，恐慌也就難免。這就是海氏所以認為貨幣會造成恐慌的理由。

五

儘管以上各家的解釋不同，但他們都一致承認恐慌的泉源是貨幣。貨幣所以會造成恐慌由於自身調節之失當。從貨幣本身所造成的一切紛亂，如信用失墜，竊通停頓，便引起生產部門的紛

亂。這樣他們的結論不是說貨幣恐慌就是一般危機的內容，即是說貨幣恐慌為生產恐慌的原因。而論那一種結論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那就是說，只要貨幣方面不發生問題，則恐慌也不會發生。誠然我們不能不承認貨幣經濟是含有恐慌的可能性的。第一，從表面看來，好像貨幣交換與物物交換是沒有區別的。一匹布換一担米，即商品——商品，和一匹布換一千元，即商品——貨幣，這兩種公式在性質上是沒有差異的。但實際第一公式是表現整個的交換過程，販賣與購買是同時發生。可是第二公式只代表一個交換過程的一個階段。從前的商品——商品，現在却成為商品——貨幣，貨幣——商品，或商品——貨幣——商品。完成這整個過程是含有或長或暫的時距的，因而販賣與購買不僅是統一的，而且是分離的。像這樣把一個流通過程分為兩個表面的獨立階段，就含有恐慌的可能性，為了流通過程有中斷的可能。用商品轉形為貨幣的人，即賣者，他並不負有購買的義務的。第二，依附於貨幣流通的恐慌可能性更發展而成為依附於貨幣支付或信用關係上的金融恐慌的可能性。商品流通的發展使商品的交付與價格實現之間發生了時間的不一

致的新關係。當握有現物商品（例如布）的販賣者A把他的布轉讓與沒有現金的購買者B，假定B是生產者的農民，他要等到把米賣出後才能把賣得的款還給A。在B獲到A布時，他便負有與布價格等量的債務。這時A與B不單是販賣者與買者的關係，而且是債權者與債務者的關係。A給B以信用，不接收現金而把布轉讓給B。B須承認在賣了他的米後用貨幣來支付債務。如果B的米是賣給C，而C又曾因交易關係保有對A的債權，則A與B的債務關係可通過C而抵消，否則B須以現款自行清償A的債務。從這種關係，作為支付工具的貨幣，在它的機能上便含有直接的矛盾，即當支付抵消時，它不過是觀念上的計算貨幣，但在不能抵消時，它却存在有恐慌的可能性，因為信用的讓與在一定時間內將還元為現金的支付。從以上兩點看來，貨幣本身潛伏有恐慌的可能性了。不過我們必須了解，固然沒有貨幣流通恐慌無從發生，但貨幣流通即沒有恐慌也可能存在的。這樣造成恐慌的原因明顯不存在於貨幣而在於貨幣所依存的社會。換句話，貨幣所隱存的可能性，只有在一定社會裏面才可能實現的。既然恐慌

只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或與資本主義有密切關係的社會，則貨幣恐慌的必然性與資本主義生產便有直接的關係了。這樣從貨幣所發生的恐慌不僅不是生產部面恐慌的原因，而且連它的本身也不是自發的了，它不過是資本主義的工業恐慌從貨幣流通上表現出來的一種形態。而貨幣恐慌的原因同樣是包含在資本主義經濟內

六

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從我看來應該是這樣加以解釋的。本來在人羣之中，為了生存必須共同努力。在物質的生活上就構成了經濟的社會性。這種社會性隨着分業之發展而益見顯著。因為專門生產的人如果沒有生產來的人，他就得不到生活的必需品。所以表面上專業化好像給與私人活動以獨立性了，但實際却發展了彼此的依賴性。經濟的社會性在一面表現為經濟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的內容就是生產與消費的統一關係。另一方面，它又表現為經濟目的性，即是一切生產是為消費。在共同體社會之中，經濟的必然性與其目的是彼此統一於社會性之中。可是在私有制的社會中，這兩重性不僅是統一，而且是分化了。由於資本

主義生產是向着極高度的分業發展，而一面生產的目的從消費而移到牟利。於是另一方面生產與消費的統一形態愈益完備，而他方生產却是為了牟利。這樣經濟社會性便引起了矛盾。這種矛盾是從以下的現象表現出來的。即一方面資本家為追求利潤的增加而盲目地擴大生產，另一方面，社會上最大多數的消費者的購買力却相對地縮小。明顯的，沒有購買生產無暇擴大，而社會購買力相對減縮時候，生產過剩就難免了。從這一點看來，生產過剩並不意味着絕對的過剩，而是相對於消費不足而言的；即是一方面大量商品得不到銷路，另一方面却有無數的消費者得不到商品。在信用制度之下，生產是依附於貸款。貸款的最後支付只是在商品賣出後才有可能的。一旦資本實現過程發生停滯，支付便感無力。支付無力，信用動搖，信用突然停止了。此時只有現金才可通用，勢必引起支付手段的爭奪戰，而引致恐慌。這時從全恐慌看來好像不過是信用恐慌或金融恐慌，好像不過是票據兌現成為問題，但是這些票據大部分却是代表現實的買賣。所以橫在全恐慌裏面，不是信用，而是生產問題。如果生產過程不發生問題，

如果生產與消費的統一不發生分裂，則流通不會沉滯，信用也不會動搖了。所以流通沉滯本身不是原理而是一種現象。設不把其恐慌的本質而單就現象來尋求其原因，尋求救濟的辦法，是不會發生何種效果的。從貨幣恐慌的眞諦看來，便知它雖非工業恐慌，而却是工業恐慌在流通部門獲得外的表現。惟在全恐慌的過程中，它却佔了一個特殊的階段。它雖是工業恐慌的結果，但它可以在工商業上發生反作用的影響，使工業恐慌益趨嚴重化。

七

上面我們提出了貨幣恐慌包括信用恐慌，金融恐慌及本位幣恐慌。但在其完成形態上，三者實際是不能分開的，因為它們有共同的原因，而在特徵上，三者彼此是錯綜的。分開來看，金融恐慌的運動中心是在貨幣資本，即貨幣形態的資本。它以銀行，交易所，財政等爲其直接活動的舞台。信用恐慌的特徵是貨幣資本需求的急切與其供給的收縮，跟着便是利率的提高與信用的停止，是銀行存款的提取和銀行大量的破產；在不景氣中它又表現爲貸放資本供給過多和低率的利息。至本位幣恐慌的特徵即表現在本位幣貶值與通貨膨脹方面。

因爲貸放資本是以貨幣資本爲其形態，而貨幣資本又即以本位幣爲其標準。故對這三種恐慌必須作爲單一的過程來分析。在生產的正常發展的階段，貨幣在流通面上不過演着暫時形態的作用。信用充分可以代替現金，在財富的社會形態上，信用同樣驅逐了貨幣而奪取它的位置。但到恐慌時期，一切有價證券，一切類型的商品都要兌換爲銀行貨幣，而一切銀行貨幣都要兌換爲金。這樣，爲阻止銀行金準備之銳減就不能不停止兌現，金本位國家便被迫宣布金本位的廢止，利用通貨膨脹政策，利用本位貨幣不能解決困難，反之，它却可以加深恐慌的程度。

八

明瞭貨幣恐慌的原因，性質與特徵，我們進一步便要分析在國內外市場上貨幣恐慌的典型過程。

一、恐慌時貨幣各種機能的作用發生動搖作用爲購買工具（流通工具）的貨幣流通開始收縮，而作用爲支付工具的貨幣流通則非常增大。後者的增率較前者的減率爲大。所以雖然購買工具的貨幣是減少了，但通貨的總額可能是加大的，這在信用完全崩

潰，不只商品與有價證券賣不出去，就是票據也不能貼現，除現金支付外沒有可通用的時候，這種事實自然會現實地發生的。二、貨幣退行代替流通的增加。恐慌發生，支付工具以外的東西已經不成爲問題，但是支付工具之取得，誰都只能取決於他人的狀況。比期到時，誰也不能知道他人究竟能支付與否。在此時，大家都只得爭取股資的銀行券與本位幣，并把它們退存起來，這樣，銀行券或本位幣在最急切被要求的瞬息間由流通退出不露面。結果出現貨幣的退行代替流通的增加，退行的程度是超出平時的退存的。這明顯地表示商品流通沉滯，商品轉形爲貨幣的過程之被中斷。

三、金向國外流出和外匯市價之下跌。在恐慌發生時，最初引起貨幣融通的需要，促使金的流出。在這種場合，事情極爲單純，要據用銀行券來貼現，銀行券又在銀行自身的發行部與金兌換。因之被要求的不是資本形態的資本，而是貨幣形態的資本。換言之，即是貴金屬的貨幣的本來形態所以金流出不是資本問題，而是貨幣問題。不過雖說是貨幣，但是具有特殊機能的貨幣。這就是說，這個貨幣問題不是單

純的普通的貨幣問題，而是成爲國際支付工具的貨幣問題，即是黃金問題。這種貨幣內身的輸出爲銀行制度所最感不安的事件。因爲在由於金輸出使銀行金準備減少時期，恐慌將更加甚。在貨幣恐慌來得嚴重時，中央銀行的破產并非不可能的。到了本位幣不能不減價時，本位幣的恐慌便發生了，它將加重一切的危機。爲了貨幣恐慌的國際性，所以在其發展過程中其對國際金融之影響自可知曉了。

註一、見 Ropke: Crises and Cycles P. 33.
H. Cassel: Theory of Social Economy Vol II, 538.
H. Lassel: The Downfall of the Gold Standard 1936

四、據一般分派貨幣原因說本人看法真正屬三人但據本人看法真正屬三人此派的恐怕除豪海二氏外最多只能加了 Donx 派一派的人物，即一般所稱的貨幣的消費不足說。雖然一代貨幣專家 Keynes 對貨幣理論如何有貢獻，但在循環理論上并不能當做貨幣原因說來看的，因爲

他的說明并不能從貨幣着手，他的中心還脫不了「一般國民所得派」的作風。所以麥特利曾譏笑他是用非貨幣的概念來說明貨幣：Non-Monetary Ex pression

Of Money. 見氏著 Art of Control Banking
五、氏 wicksell: 一 The Influence of The Rate of interest upon Prices. Ec

o. J. 17 p. 213
六、根據 Hawtrey: 一 The Depression and The Way out 及 Capital and Employment.
七、根據 Hayek: 一 M

onetary Theory and The TayloristC
及 Price and Production inlP

美國對華貸款的透視

紀明

在行政院張院長於記者招待會上，對於美國貸款表示：「余並不注意，因中國需要自力更生」後之翌日，華盛頓傳來的消息，證明了「中國官員在華盛頓曾非正式提出使用一部分五億元借款之計劃，詳細計劃即將提出，該計劃包括戰後及民用建設等計劃。除非延長期限之要求獲得，否則該結之借款將撥作基金。今因中國似在六月卅日以前尚不可能提出其全部用途計劃，故官員認為延長期限一議，或有其可能性。」（合衆華盛頓五月二日電）

此項報導如無失實，則可知中國當局儘管對五億美元貸款的表示是沖淡的，實際上並未放鬆對於這筆貸款的積極追求。而其緣由也很明顯：中國今日所最感困難的幣制危機，沒有一筆鉅額的國外貸款，是無從着手整理幣制的；至於同等嚴重的物資缺乏的危機，如無國外貸款來增強外匯基金，且不說工業生產得不到原料器材的補充，就是民以爲天的食糧，也將難於取得洋米洋麥的接濟。「自力更生」自然是中國走向復興的正確途徑，可是抗戰八年中未曾曾在廣大的內地建立起自力更生的基礎，戰後一年半來在經濟政策所走的買辦路線，更深化了中國經濟的殖民地性；時至今日，自力更生的號召已機變了一點，遠承救不了當前經濟危機的星火。因此挽救經濟危機的「近路」，自然而然的便唯有美國借款是賴。觀於報

紙上美國貸款的報導，時常引起上海金融市場的波動，縱然這是投機行爲，也可以看出，商人對於中國需求美國貸款之迫切，倒是洞若觀火，而且也表示得很坦白。

究竟美國這筆五億美元的貸款，爲什麼遲遲出口銀行在去年四月間就已經儲款以待，而歷時一年之久而仍不貸出呢？

最近上海大美晚報的總編輯高爾德（Radcliff Gould），對於五億美元的動向曾從紐約發來一則詳細報導，他整個的看法認爲：「中國希望由于國民政府之改組獲得美國五億元貸款一事，顯屬幻想。」他所根據的理由可以歸納如次：（一）「美政府不願在未獲得該項貸款確能適當使用之估計時，即行盲目貸于中國」；（二）「聯總經濟及剩餘物資之處理，已同時遭受中美人士之公正譴責」，故美國目前深感對華援助之處境極感困難，蓋既不欲使成爲涇黃，又不欲聽任其轉入私壟」；（三）「現在美國商人對於自中國獲得商業利益之期望，業已完全破滅」。

高爾德這幾點看法都是很客觀的，至少表達了美國人民的意見以及一部分美國官吏的見解。但我們中國人民看來，高爾德所提出的幾點還嫌不完全和不深入。

關於美國五億貸款，是必須將其聯繫於整個美國對華援助來加

以考察，否則不僅難於獲得全般概念，反將引起錯覺，而上了美國宣傳戰的當。

據美聯社的統計（聯合社華盛頓四月廿四日電），十二年來（按係從一九三三年美國進出口銀行成立，開始對華貸款時算起）美國官方援華數字，約略如下：

(一) 國會戰時貸款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二日美國參戰後，國會即開始此種援助，對華戰時貸款共計五億美元。

(二) 進出口銀行貸款 美國進出口銀行於一九三三年成立後，曾先後對華貸款多種，未償還貸款餘額共計六四，九〇〇，〇〇〇美元。

(三) 軍備租借 根據美國租借法案供給中國之軍備租借，共計一，五六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尚有戰後軍備租借五千萬美元。

(四) 聯總救濟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指撥救濟中國用之資金，達五七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估計裝運費用約耗一億美元，故對華救濟與運費總值六七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其中美國負擔百分之七十二，約四八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五) 剩餘物資 美國在華及太平洋島嶼之戰時剩餘物資，據美國國外物資清理委員會估計，計值約在八億至九億美元之間，其中一部分是否確屬剩餘性質，尙待宣佈，由美國政府全部作為抵償戰時所負中國政府債務一億七千五百萬美元，中國淨獲剩餘物資約六億七千五百萬美元。

以上美國對華援助各項數字合計，達三十三億四千零九十萬美元的鉅額。中國財政雖認爲此項報導「殊非確實」，尙須經過即將在華府舉行的中美清算會議的清算，但美聯社所云：「查五億美元爲數不貲，但與美國所已付給中國者相較，殊屬渺小」，這不會不確實吧！

而且值得注意的，美國大部分對華援助，竟是戰後實現的，聯總救濟及剩餘物資之運華始於戰後固屬盡人皆知，即以租借物資一項而論，據美國 Foreign Commerce 週刊載稱，自對日戰爭勝利日迄去年九月底止，美國供給中國的即值六億九千四百萬美元，除勞務及運費外，可作民用的僅三千五百萬美元，而軍用物資竟值二

億六千五百萬美元之多。

由此可知，如就美國援華數字全數予以檢討，則無論五億美元貸出與否，對美國整個援助國民政府之計劃，並沒有多大影響，而現在華府之可能延長五億貸款的時效至六月卅日以後，自然也不能認爲華萊士所抨擊的「無條件貸款於全球反蘇國家」的「杜魯門主義」，已有本質變更的跡象。如不信，以最近的事件爲證吧，繼杜魯門總統令美國海軍部以二七一號海軍船隻贈予中國之後，美國衆院又通過了二億美元的對外救濟方案，中國也赫然在被救濟之列，將來聯總救濟結束之後，中國仍可繼續得到救濟。

如再進一步從深處看，美國之所以遲遲未嘗將早已儲款以待的五億美元貸付，一方面確有其「處境的困難」，同時也正有其作用的。

所謂困難，高爾德在其報導中所云「美政府不願在未獲得該項貸款計劃確能適當使用之估計時，即行盲目貸與中國」，這或祇代表美國國務院一部分官吏的見解，因爲，假如說中國對於五億美元尙無適當使用的保證，則華府慨然以四億美元貸予土希，難道美政府就已有確能使之「適當」使用的把握？

據我們看來，華府對於五億貸款所感困難的，除來自中美兩國之公正輿論之外，大概有兩點：

第一，杜魯門總統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對華政策聲明中，曾聲言：「當中國由上述的途徑（按即指和平民主團結的途徑）走向和平與團結的時候，美國將準備用各種合理辦法，來協助國民政府復興與中國……爲了增進這種援助，美國政府將準備對中國要求信用貸款及借款，以便進行在全國發展健全的經濟及中美間健全的貿易關係的計劃一事，在合理條件之下給以善意的考慮。」美國進出口銀行的指定五億美元專款，就是響應杜魯門總統這一聲明，而在以後美國官方對於五億貸款所迭次發表的聲明或談話中，也都強調貸款是附有杜總統在其聲明所指定的「政治條件」的。既然如此，除非美國已決定對於中國國民政府這次改組是否已「自由主義化」，願意作肯定的表示，否則就不能實然將五億美元貸出，而據上月廿七日合衆社電傳，「認爲靜觀政策至少當有兩月之繼續」，這或許即是華府考慮將貸款延長其時效的由來。

第二，在整個世界問題上，如美蘇破裂的傾向未能對妥協的傾

向佔支配的優勢之時，在對華問題上美蘇也仍將尋覓妥協之道，美國不願在歐洲問題未獲解決之前，再在遠東方面增加對蘇聯的刺激。因此美國對於宣傳已久，為舉世所矚目的這五億美元貸款，不能不特別慎重將事。

除上述兩點困難之外，所謂美國遲不貸款尙有其作用，那就是

多瑙河流域的勞工和工業

田圃譯

說，經過一年來迭再傳言即將貸出，而又迭再由美國有關當局否認，這長期的神經戰已經在不大明瞭美國整個對華援助情形。中國人民中，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即美國像煞是嚴格遵守「不干涉中國內政」之諾言的，這與美國迭次的撤兵表示，同樣是一種外交姿態。

(五月五日)

在多瑙河流域的四個國家裏，工業是比較最新發展起來的事業。但從十九世紀末就已成爲主要工業中心的布達佩斯是惟一的例外。在其餘的三個國家，勞工之已久具有階級意識和組織的大都是礦工，鐵路工人和紡織業工人。情形特殊的是羅馬尼亞的石油業。重工業，從一九三〇年以來，在羅馬尼亞已逐漸在發展，同時在捷克斯拉夫，重工業也有相當的進步。因之，在所有的三個國家裏，勞工階級的力量都在迅速增長，但其主要勢力仍在於上一世代。

在戰爭期間，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鄉村的勞力不斷的流向都市，鄉村被僱用的農工多走向都市，在工廠裏尋找非技術性的短期或較長期工作，他們的家屬留在鄉村，並且可以養活自己。因此，他們只需要足以維持自己生活的很少的工資，主要的爲應付穿衣和納稅就夠了。他們比較起必需贍養家庭的城市工人，對於較少的工資自然更容易滿足。僱主們就利用這部份工人來壓低工資，這種現象使任何團結工人的工作都異常困難，縱然沒有資方的迫害。在匈牙利事情比較容易，那因爲一方面由於人口增加的速率較緩，一方面由於地主們利用其政治力量儘可能阻止農工之脫離土地。

職工聯合的更進一步的困難原因於政治的迫害，在匈牙利職工同盟獲得了相當程度的自由，這由於一九二一年，社會主義領袖和比西林伯爵的協議，在該項協議中，前者允許放棄對農業勞工的活動。雖然，工人們仍不能完全擺脫警察的監視。在保加利亞，於一九三四年，政府公開的壓制職工的活動，羅馬尼亞的職

工於一九三八年，也遭遇同樣的壓迫。捷克斯拉夫的職工同盟在一九四一年以前也不過只是名義上的存在。但，在實際上，在所有的三個國家裏，工人們早在公開壓制以前，已喪失了真正的自由。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在這些國度裏，普遍着同盟罷工的運動。在匈牙利，被壓迫的組織迅速又得以恢復。並且新的組織已在先前經常受禁止的各工業部門裏，如鐵路和郵政等企業內成立起來。在保加利亞和捷克斯拉夫，雖然舊有的職工同盟的會員仍然存在，但就整個組織來說，幾乎是嶄然一新的東西了。

一九四五年底，羅馬尼亞職工同盟之會員約爲一，三〇〇，〇〇〇人，捷克斯拉夫和匈牙利各有八〇〇，〇〇〇人，保加利亞約有四〇〇，〇〇〇人。

除了匈牙利，共產主義者領導的作用較小外，其他三個國家都由共產黨佔領導的地位，在匈牙利的職工同盟內，過去佔優勢者爲社會民主黨，此蓋由於共產黨當時沒有合法的地方，而其同情者多加入社會主義黨的緣故。這些左翼的社會主義者，當在一九四四重出現的時候，就正式參加了共產黨。在新成立的職工同盟中，共產主義者已經發生起主導的力量了。現在的匈牙利的職工同盟組織是經過一九四五年兩黨的同意而成立的。職工同盟會的重要位置，像書記長，即由共產主義者，布達佩斯市區鐵路工人領袖高薩所充任。

在捷克斯拉夫，社會主義者從來沒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共產黨在游擊戰爭時取得的聲望和權力使得他們在新成立的職工同盟中仍保持最高的地位。保加利亞

的情形大部份和捷克斯拉夫一樣，在這裏，戰爭以前，大多數有政治覺悟的工人都無疑的同情共產主義者，而不同情社會主義者。並且在戰爭期間，共產黨曾經領導了抵抗納粹的地下工作。羅馬尼亞不曾有抵抗的運動，並且在戰前好多年間，工人們就不曾發生過令人注意的政治活動。但，就在這裏，工人們的同情也是傾向於共產黨，而不擁護無用而妥協的社會黨的。

無疑義的在這四個國家內擺在工人階級目前的重要任務是工業的重建。關於這個問題，在所有的職工同盟會的領袖和工人階級發言人的演說中，都一再強調。他們經常的呼籲增加生產，匈牙利且已得到了輝煌的成績在這裏通貨膨脹實際上使工人們的勞動成爲一種強迫勞動因爲對於大量的勞動所支付的實際工資幾乎等於零。在得不到外國幫助的情況下，政府實無法把一個毀滅且枯竭的國家重建起來。但勞工們瞭解政府的苦衷，因此，所有的國內和國外的觀察家都一致稱贊匈牙利過去一年間的英雄的成就。工業方面受害較輕的捷克斯拉夫，在許多方面可以說和匈牙利相像，由於各種原因，在遊擊戰期間，勞工們對於國家的供獻遠在農民和智識份子之後，因之在

戰後，大家都要求勞工們應對國家的建設以特殊的努力來償還。對於這種要求，勞工階級給予一種明智而慷慨的答覆，每一個到捷克斯拉夫的訪問者，對於其工人階級之努力與熱情都有極深刻的印象。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建設工作比較稍易，因之其成就就不像捷克斯拉夫和匈牙利一樣輝煌，但是在那裏同樣可以發現生產力的提高。

用以達到此種成就的方法，有些係借鑑於蘇聯的經驗。他們採用工廠間之競賽，工廠各部門間之競賽，和工人間之競賽等方法以恢復蘇聯的社會主義競賽制。在保加利亞曾有五萬個工人已獲得突擊隊員的榮譽；在羅馬尼亞，有好幾百個勞動英雄。對於這些榮譽的工作者尙伴有助章和金錢的獎給。他們鼓勵自願的延長工作時間，並且，有些場合，特別是在捷克斯拉夫，實際上呈強迫工人延長其工作時間的。長時間內的工資率在普通時間的工資爲高。在捷克斯拉夫和羅馬尼亞高百分之五十，在保加利亞則只高百分之廿五。一個有趣的例子是當農忙的時候，工人們自願的在星期日幫助農人做田間的工作。對於這，政府爲着增加農人和工人間的團結，曾公開加以鼓勵，特別是在羅馬尼亞

和保加利亞。

在多瑙河流域的工業，現在有一個重要制度，即由工人選舉的工廠委員會的設立。在匈牙利舉的該委員會的委員差不多由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所平分，而其餘的三個國家，則共產主義者佔有優勢。該委員會代表工人的利益來處理工人和工廠經理方面的事情。至於工廠的經理可能是替國家服務，亦可能是爲私人利益而服務。在捷克斯拉夫，多數的工廠是屬於國有。這裏沒有一般的國家化的法律，但許多工廠（並非全部的）都基於合作的立場。在匈牙利，礦場已被國家化，並且預料某些重要的重工業也將要收歸國有，但大多數仍容許私人經營。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多數的工業在名義上仍屬私有，但政府在實際上，已通過價格和原料管制而掌握了這些工業。並且在許多情形下廠主的利潤已由政府設立的重稅和對於工人福利方面的開支而減少。而後者即爲工廠委員會和職工同盟所關心的事情。職工同盟曾經有反對工人們要求更高工資的政策。因爲這在匈牙利通貨膨脹期間是不可能的，但自通貨穩定後，此事已成爲習慣。在另外三個國家，這種政策也一致被推行着，並且在防止通貨膨脹上已在捷

克斯拉夫發生了良好的效果。在保加利亞也發生了相當的效果。工廠委員會包括雜項工人，工人兒童的看護，遊戲俱樂部，戲劇和音樂表演等事項。這些實足以彌補工人們的工資上的損失而有餘。對於私家的廠主，這確是一種很重的負擔，特別是罐頭食品一項，因爲在羅馬尼亞，這項東西必需在暗中購買。最現代化的工廠內，在戰前就已有些實際的設備，但在大多數的多瑙河流域的工廠裏，這種設備還完全是新的東西。因此自然被工人們所歡迎。

像蘇聯革命以後一樣，她們也同樣遭遇到技術工人缺乏的困難。因此職工同盟採用了史太林著名的口號「一切都由等級決定」。自然，這在其他三個國家內比在匈牙利更爲需要，她們以極大的努力並在工廠裏設立短期訓練的課程，並於全國提倡較長期的技術教育。爲着應付緊急的需要，她們又設置了許多關於教育職工同盟的職員的課程。

倘若忽略了整個職工同盟所執行的政治宣傳，我們將不可能把多瑙河流域的勞工組織作一個完全的敘述。因爲實際上職工同盟由共產主義者所控制的。該同盟之目的，據說在於培養工人

之階級意識和促進落後羣衆的團結。但事實上其宣傳已遠超過此種目的。他們的宣傳特別在外交方面加強。職工同盟經常宣傳對英國和美國的仇恨。多瑙河流域的工人們經常接受關於印度西尼亞的利亞斯德，希臘和中國現狀的長篇的演說。這是使西方的訪問者最不高興的地方，但此並

不應掩飾其社會建設之功績。

結尾，我們必須指出，多瑙河流域諸國工人，組織發展之路線有異於西方各國，此乃由於其環境之不同。西方的勞工們反對職工同盟和國家密切的結合。反對任何人以私人的意見來指導或干涉工人們的運動。——雖然在西方各國，這種事情仍難完

全避免。很可能在多瑙河流域有些工人也同樣反對這種事情。但這種現象並不十分重要。最重要的恢復生產問題使得這些政策的執行成爲無可避免的事。並且，無可疑問的，在這些國家，有享受已被戰爭損毀的物資的優先權的是工人階級，較窮的工人們的生活實質上已比以前有所改

良，技術工人的生活也可能較前稍壞。但與其他階級相比，仍屬不錯，大多數的工人都了解這一點，所以都依然樂意爲新制度效忠。（原文載「經濟人月刊」

一九四七，二，廿五）

內戰經濟的面貌

李作周

抗戰勝利已經一年八個月了。全國人民在勝利後得到的是什麼？內戰代替了抗戰，美國代替了日本，中國人民除掉繼續過苦難的生活外，還有什麼可得？最顯著的，一年八個月以來的國民經濟，真是江河日下；人民的生活，更是每况愈下。如果內戰再繼續下去，中國的國民經濟在一年半載之內誰還能保證其不崩潰呢？現在上海人已經吃過十八萬元一担的貴米了，不知三個月半年以後要吃多少錢一担的米。

還有不少人要勸人民忍耐。甚至最近參加政府的青年和民社兩黨，也同意要在恢復鐵路交通線後，再以「政治方式解決國是。」但是他們就沒有想到，如果鐵路交通線沒法恢復了又怎麼辦呢？還不是要繼續內戰下去吧？內戰繼續下去，人民還能忍受嗎？經濟還能避免崩潰嗎？

為什麼過去八年抗戰全國人民能忍受過來，而一年半載的內戰便不能忍受呢？理由十分簡單：內戰與抗戰的性質根本不同。對外抗戰的目的在求民族的解放與獨立，全國軍民的目的是一致的。抗戰中儘管要遭遇殘酷的破壞，但這種破壞正是新中國建設的必經過程，所以抗戰從根本上看是有建設性的。目前烽火遍地的內戰，除掉維持少數人的獨裁統治外，全國人民是一致反對的。內戰歷程兒是一種破壞過程，是毀滅民族前途，斷送民族生存的炸彈。抗戰表示民族的團結，內戰則是徹底的分裂行為；抗戰是正義的自衛戰爭，內戰則是不義的反動戰爭。因為是正義的戰爭，所以人民容易動員，雖徵兵徵糧，出錢出糧，而人民無怨言（最多發生公平與不公平的問題）。而不義的內戰便不然。人民無主持內戰的義務，因此徵兵難，徵糧亦不易。通貨無限制的膨脹，人民要問：印那麼多的鈔票幹什麼的？稅捐無止境的增加，人民要問：收這麼多的錢幹什麼的？公債大量的發行，人民又要問：發那麼多的公債又幹什麼的？在抗戰的時候，盟國協同作戰，目標也是一致的，因此盟國對我

們的任何援助，是正義的，人民竭誠歡迎；現在對內戰一方面的任何援助，都足以助長內戰，使我們的民族走上萬劫不復之境，是不正義的，人民堅決反對。

戰爭是政治的延長，戰爭的性質決定於政治。目前的內戰是民主與反民主之戰，除掉這一性質外，我們找不出別的性质，我們決不能含糊。經濟又是政治的集中表現，經濟上的一切措施，不能脫離政治，對於今天迷惑人們視線的種種經濟上的幻術，真會如入五里霧中，莫知其真相。

實際上內戰經濟的法門不外兩條途徑：其一是榨取人民，其二是依賴外援，而依賴外援之結果，必然要有種種權益之損失，這筆賬最後還是算在人民頭上。內戰是一個無底之洞，二三百萬軍隊的給養，一天就是一個驚人的數目，還要加上彈藥的消耗，軍隊行動時的費用，貪污機構額外的損失；如此經年累月的打下去，儘管一等的理財家，如果不從人民身上打主意，能變出什麼戲法來呢？今年的預算支出要九萬三千二百億，收入就是照政府的如意算盤，也只有七萬多億。照近年來的趨勢，由於物價不斷高漲，以及緊急開支的臨時追加，實際支出往往要比預算支出增加三倍乃至四倍。這樣龐大的赤字，除掉乞靈於印刷機，增發通貨外，基本上是不会有別的門法的。這就是只有繼續通貨膨脹的政策。通貨膨脹便是在不知不覺中掠奪人民財產的政策，就是最殘酷的榨取人民的方法，就是普遍向人民徵稅的辦法。

至於說到外援，今天主要是依賴美國。去年在救濟物資，租借物資，剩餘物資等種種名義下，美國先後援助政府的據估計達竟四十億美元之譜。目前還在進行五億至十億美元的借款，如果這筆借款成功，難道真能用於生產建設而不把它當作內戰的資本嗎？美國的援助不是無條件的，去年簽訂的中美商約以及中美航空協定等等

損害主權的條約，就是美國援華的代價。內戰如欲延續，依賴外援的政策決不會變，最後將使中國完全變成美國的殖民地而後已！

在通貨膨脹與去年美貨大量傾銷（這也是依賴外援之結果）的前提下，中國的民族工業垮台了，農村經濟破產了。由於生產的破壞，物價繼續高漲，人民購買力降落，遍地災荒，民不聊生，再加徵兵徵糧，急如星火，廣大的農民不是坐以待斃，便只有挺而走險。去年秋天以來，各地民變蜂起，威脅着內戰的後方，今年青黃不接的時候，這種趨勢，恐怕還要繼續發展。

爲了和緩目前的經濟危機，拖過「未來九個月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當局不惜採取種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枝節辦法，藉以迷惑人民的視線，欺騙人民，「把經濟危機拖過去再說」。最初的「經濟緊急措施方案」也好，後來的「經濟改革方案」也好，以及最近發行的美金公債，美金庫券也好，以至於將來可能實行的幣

被動的經濟政策

「一個國家國內貨幣不穩定，對外的價值是無法穩定的。」

這一句衡擗不破的名言推演出來，就可以衡量出目前中國的經濟纏結在那裏。釀成貨幣不穩定的最大因素是財政收支不平衡。八年的抗戰，財政赤字飛躍增添，政府唯一的辦法就是以通貨的發行來彌補，也就是政府對人民一種普遍的課稅。那時候漫長的海岸連絡線已被切斷，因國內物價上漲，逼使法幣的價值與匯率脫了節。政府祇要在生活必需品的供應上獲得解決，通貨膨脹是不致促成中國經濟的崩潰，同時在同仇敵愾的情緒裏，沖淡了問

題的嚴重性，人民在苦苦的忍挨下勉得了這個危機。

到了，久被封鎖的海岸線又洞開了，政府爲推廣進出口貿易宣佈了一個國際匯兌管理暫行辦法。更沿用了「穩定金價，平抑物價」的黃金政策，來解決戰後的物價問題。可是物價並不受抑物價的抗戰的終結而停止上漲，相反的内戰的纏起更助長了物價的瘋狂上昇。抗戰時，人民內在的心理還覆上了一層希望的遠景，現在似乎連這希望的遠景也消失盡了。

物價昇騰的結果，通貨更膨脹了，政府對外匯政策煞費了一

制改革也好，這一套法寶的作用，無非在公開的，或帶些欺騙性的權取人民最後的一滴血，以充內戰中孤注一擲的資本，拖過最後的難關。然而經濟的危機真能拖過去嗎？「只要內戰存在，任何聰明的理財家，共至亞當斯密再世，也無法挽救這種危機。」（二月十七日倫敦「經濟學界」雜誌中這樣說。）上述這些措施，充其量也只在政府控制力較強的大城市發生暫時和緩危機的作用。但對政府控制力薄弱的小城市以及廣大的鄉村，是很難收效的。例如糧食和各種原料都生產在鄉村，糧食和原料的產地價格不能控制，光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限價，濟什麼事？最近上海的物價又一度上漲，主要原因就是由於產地價格高過上海。進一步說，內戰的兵源和糧源，都在廣大的鄉村，一旦鄉村經濟崩潰，或鄉村普遍動亂，更將直接影響到前方的軍事。到那時，任何經濟措施將會失去效用，而真正的經濟崩潰，與政治危機，恐怕就無法避免了。

姚大均

番苦心，匯率定得過低，外貨湧到而來，威脅得國內工商業幾乎瀕於奄奄一息。政府不得不再把匯率調整。但跟來的不是物價被刺激得更上昇，調整匯率的目的又完全被沖淡了。政府對調整匯率已有了解，所以每達到出口停滯，民族工業的凋敝有了現實的艱難，政府總是一籌莫展，才棋不下，直逼到無法延宕時，才頭痛醫頭的來一個臨時的應付辦法。黃金政策也是這樣產生出來的。這是因爲黃金與物價在心理上有一種聯繫，物價追隨黃金，穩定金價也所，只是平抑物價。

但黃金政策祇是整個經濟政策中的一環，黃金政策祇能對整個經濟有影響，決不能左右經濟。整個經濟的惡現象是由通貨膨脹所造成，黃金政策的緊縮信用祇暫時的收得效果，從整個通貨膨脹數字看信用膨脹，真是微乎其可憐。通貨膨脹彷彿一個水閘的放水，緊縮信用的黃金政策，彷彿一個水管從閘外吸水進閘內，兩者相抵下，泛濫成災，是可以預期的，黃金政策在通貨膨脹的歷程裏，也早就佔定了它的命運。

勝利後的一年，和平商談還不絕如縷，剩餘物資的出售，敵

爲財產的標價，國營企業的贏利，配合了黃金的拋售，似乎對於物價的操縱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可是，一年來的教訓，洞悉了戰後和平安定的生活祇是一個夢景；遍地烽火，到處殘殺，人民在心理上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政府政策的動輒變換，大大低落了對法幣的信任。在今日，儲蓄已沒有代價，於是急劇地增劇了消費。握有多量法幣的人，爲保持貨幣未來的財能與今日的價值相等，高利貸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市場上就有了高利貸，於是發生利息與利潤的高下，利息高於利潤，逼使工商業傾近了艱難的深淵。但如利潤高過利息，往往又使資金流於投機與囤積。

通貨繼續膨脹，高利貸是無法消滅的，物價漲，這種條件下，一定看漲。物價漲，鈔票機是決不會停印的，這時候忍受最苦的是一般薪給者與勞動者，他們在物價的瞬息萬變裏遭到了政府的重重剝削。

分析過去政府對經濟緩結所施行的政策，得到了一個明白的概念，就是一切是治標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缺少一貫的策略。從二〇二〇時的外匯無限制供給，到二〇二〇時的外匯嚴格管制，從央行印鈔票，每條七百萬元到今日收緊貨幣，每條四百八十萬元，

就這兩點看，政府是沒有一貫的策略。過到了考驗的難題，總是先猶豫，然後決定對策，行不通時再改。這種行動完全是被動的，碰到了困難才想辦法，這不會有效果的。

三個月間公佈的經濟緊急措施方案也是被動的，先有了金鈔的風潮，然後才有這次的方案。這方案的要點有七：（一）禁止黃金買賣，外鈔不准在國內流通。（二）調整匯率爲二〇〇〇。（三）廢除出口補貼進口附加辦法。（四）嚴格管制日用品必需品。（五）平衡財政收支。（六）穩定國內物價。

從這辦法的本質看過去的成績，政府始終未能控制當前的物價，黃金陣出千萬元大關，中央銀行已無法再拋售黃金，在最後拋售價格爲七百六十萬元，央行非僅不能平穩金價，官價反追蹤黑市而升。匯的掛牌三三五〇，與物價脫節太多，使出口無望，進口停滯，僑匯流到黑市，於是在千呼萬喚下，政府嫻嫻來遲地公佈了出口補貼進口附加的辦法，辦法還未見實施，物價刺激得又漲，未及半月又廢了，再來着一個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政府三令五申，必須要貫徹到底。但過去的施行的辦法，導傳給人民的印象實在太壞，朝令夕改式

的辦法決不是政策，政策是一貫的，而遇到環境的困難，要改變也祇是部份的。

經濟緊急措施的方案祇可以說極度困難時期的一個權宜之計，它不能長時期的延續下去，同時軍令式的政治氣味太濃厚，今日的中國經濟的根本癥結不解除，以政治來推行政策終是要失敗的。立正，稍息，向右看齊在軍隊裏發令，步驟是可以一致的，但行之於經濟，往往得到相反的效果。

今日中國經濟的癥結是在內戰，因內戰的連綿不絕，促使通貨膨脹，交通遭到了阻礙，膨脹的通貨影響到物價，物價的騰貴危害了國民生計。同時物價的波動不已，匯率無法確定，外匯貶值往往迫隨在物價激漲的後面，國內的工商業是永遠在威脅下得不到解救。國際收支不能平衡，外匯喪失了很多，這也是當前經濟的大癥結。

內戰不停，和平安定無望，間接影響到生產，這個根本的癥結不除去，任何好的辦法，收效是暫時的，失敗祇是時間的問題。經濟彷彿流水，政治是河床，是先有了水然後才有河床的。政治與經濟決不能分開，河水泛濫不是利用築堤壩可以防治的，主要的還是修浚河床。中國的經

濟也就是這樣，被動的消極的政策不會求得良好的反應，祇會把頻臨的危機拖得遠一步。

當前的經濟情況，內戰如不停，所可循的路祇有兩條：（一）嚴格執行配給生活必需品，但必須是普遍的配給。（二）採放有意義的通貨膨脹，但決不能用於無謂的消耗，應使其用於生產事業，使物資不虞匱乏，同時政府須提高公教人員的待遇，安定其生活。但這依舊是一個拖的辦法，治標的辦法。

社會是一個有機體，貧乏的經濟現象從艱苦的抗敵戰爭發展到現在，國民的生活祇有向後退，却一些兒沒有前進。人民煎熬得實在太苦了，畸形的都市裏所表現的現象是生產者寡，消費者衆。再看廣大的農村，飢饉，災荒，凋敝，冷落而田園，又在作無情的毀滅。追溯一下縱的歷史吧！再看一下橫的現況吧，中國整個經濟前途，太可愁了，也太可悲了。

勝利的憧憬曇花一現即逝，苦難生活的陷阱一天天在那深，人民是有權向政府要和平安定的生活，要工作的機會來改善生活。請政府拿辦法出來！

中國官僚資本之理論的分析

王亞南

記得在去年暑假前的四月及六月，我曾分別在國立廈門大學和中山大學的學術講演會中，就「官僚資本」這個對象，作過研究性的講演，講詞後曾被若干雜誌報紙節載過，但與原意頗有出入，且太簡略。經過近一年來事實上的演變，覺得我的意見，還大體不失為正確，因依原稿論點，加入新增事實，成此文稿。

一九四七年三月於廈門海畔野馬軒。

一 我們應如何理解

官僚資本

在抗戰結束後的這一年多以來，「官僚資本」竟變成一個流行語了。在這以前，官僚資本儘管早經存在，在道間或有人論到它，或論到與它相類似相關聯的「買辦資本」一類名詞，經常是在資本二字上面劃××，有時竟連資本兩字亦以××代，或者乾脆禁止談到諸如此類有損官譽有污官格的「不敬語」。然而，會幾何時，一般輿論已毫無忌諱的在尚論着這着官僚資本，甚至一向嫌忌這類名詞的黨政論壇，亦公然把這以前認為是異黨份子中傷的「不祥物」，當作必須打倒必須解決的對象。這種大轉變，

一部份雖然是由於時代的進步，民主作風變成了不可違抗的潮流。一部份是由於官僚資本活動得過於猖獗，聽其發展下去，不但會斷送整個國民經濟命脈，且將不可避免地危及黨政自身的生存，但同時也由於官僚資本家集團內部，因着「發展不平衡律」引起了「內訌」。不論如何，我們今日總算取得了討論官僚資本的某種限度的「自由」了。

也許因為我們取得這有限制的討論的自由，還是不久的事，一般人對於官僚資本本身的認識，就不免有些感到「漠然」。廣州綜合出版社，編印了一本「論官僚資本」的小叢書，把時下有關這方面的論文，集在一塊，其中計有狄超白、馬寅初、周恩來、吳大現、鄭森禹、鄭振鐸、姜慶湘、趙元浩諸先生分別發表於各地雜誌報章上的。這些文字，因為有的是臨時演講記錄，有的是夾在其他論題中附帶提到，所以大都不免「語焉不詳」，我覺得，對於這樣一個重要的大題目，理應多費點時間，把它的特質作用等方面的關鍵較詳明的闡述出來。

在目前，大家對於官僚資本，似乎有兩個近似對立的認識：其一是抓住官僚資本靜態的一面，彷彿官僚資本就是「官僚的資本」，這樣一種同義語反覆的呆板表現，當然會阻礙我們對於官僚資本的科學的分析；又其一是把握官僚資本動態的一面，過分強調它的融通性，結局，官僚資本

本就變成了閃爍不定難於捉摸的東西。

事實上，官僚資本是非常生動，但也非常具體的。

官僚資本有三個具體形態：一是官僚所有資本形態，一是官僚使用資本形態，一是官僚支配資本形態。這三者相互的依存性和融通性，是官僚資本所以成形成官僚資本的具體內容和條件。它們的存在，在某些場合是各別獨立的，在某些場合是相合的，但離開了其中之一，則不足以通體瞭解其他。

這裏且先分別說明它們各別的特質，然後再統觀其共同機能。

首先，所謂官僚所有資本形態，就是指着官僚自己舉辦的某種企業和經營。這種企業在允許任何私人可以自由經營的限內，他曾是官僚或已經不是官僚，他的資本活動，卻不包括在這種所有資本形態中（自然，我們很知道，現實的官僚資本，有極大一部分，是把握在那些已從政治舞台退出的人手裏，但一個人政治生命的確實終結，同時却會是他

的所有資本形態向着其他形態變形的開始)；官僚資本所有形態，必得所有者尚是官僚，一方面以公務人的資格，從事政治活動，同時又以私法人的資格，從事經濟活動。在這種情形下，不管他的經濟活動是被禁止的，抑是被允許的，也不管他是直接從事經營，抑是委託旁人經營，他那種經濟活動依以進行的資本，就似乎取得了官僚的資本的屬性。但是這種說法，馬上就要遭遇到以次事實的反駁。近代社會，是所謂商工業者市民社會。由商業經營者變成官僚，是極其尋常的事。一個商業家工業家或銀行家如其一旦成功為官或官僚，是不是定要停止他原已經營的一切企業呢？即，是不是他一進入政界同時就得退出經濟界呢？或者，他不退出經濟界，他前此經濟活動所依以進行的資本，就會因為他投身政界，而變為官僚資本呢？如其對於這些問題的答覆，不能一概斷然予以肯定，我們就有理由相信：所謂官僚資本，即使就是就其所有形態來說，那也不能單從資本為官形有這一事實來評定，而要從資本在如何的情形下為官所有這一事實來評定；官僚兼有他自己的經營資本，其所以被人詛咒被人詬病，乃因他的資本來源，他的資本活動，通通

與他的官職發生密切聯繫。我們由此知道：官僚所有資本形態，只是官僚資本的諸現象形態之一，我們稱此為官僚資本的第一形態。

其次，存在於官僚所有資本形態一傍的，還有官僚使用資本形態或官僚運用資本形態。凡經由公家經營的一切企業，其經營主體，不拘是國，是省，是市，是其他黨政軍乃至社會文化團體，其實際經營者，通是各種各式的官；官僚對於此類資本經營，沒有所有權，但卻有運用權。本來，在一切現代國家，均存在有大大小小的這類公營事業，它們的這類公營事業，也多半是任用公務員或「官」去經營，但它那些經營資本，是不是可歸屬於官僚資本範疇呢？如其不然，其在因安在呢？那第一可以說的是由於它們的公營資本與官或官自己經營的資本，沒有何等內在的關聯；第二可以說是由於那些從事公營事業經理的人，即使是官廳任命的，即使不是以官的「格」機關，他們便不是以官的「格」企業者，專家或技術人員的身份在那裏活動。正惟其有這第二種理由，更使第一種理由得到確立，從這裏，我們又明瞭，不是資本由公家所運用，為官方所經營

，便變為官僚資本，而是公家的企業經營，被掌握在官僚手中，由官僚任意處置，並使其對前述官僚所有資本形態，發生或明或暗的內在聯繫，才叫人厭惡叫人詛咒。像這樣為官僚資本所運用的資本形態，我們稱它為官僚資本的第二形態。

再次，我們要談到官僚所支配的資本形態了。本來，官僚個人所有資本，官僚所運用的公家資本，通可說是受其支配控制，但我們這裏却是另有所指，或即是指着那些既非由官僚直接擁有，又非為官僚所直接運用，但却顯然在多方面受着官僚支配控制的那些私人企業的資本，在經濟與政治保有密切聯繫，而又缺少明確的法的極界以資分別的場合，特別在私人資本必須取得政府各種方式的支援，始能維繫的場合，幾乎大部分的私人企業或其資本，都不免要在不同的程度，通過不同的方式，變為官僚的「俘虜」，變為官僚任意侵漁和自由游泳的大水池，變為他們所有資本形態擴大匯集的又一來源。像這樣一種資本形態，我們稱之為官僚資本的第三形態。

由上面各別的說明，我們應對官僚資本有一個總的概念，即所謂官僚資本，應是在特殊社會條件下，為官僚所擁有所運用所控制的諸種資本之有機結合的總稱。那從以次三方面顯出了它的基本特徵：

第一，官僚資本的三個形態，通是以官為其發生聯繫作用的樞紐；沒有官的憑藉，這種資本的屬性就根本無法存在。

第二，官僚資本之一極，是人的屬性的官或官僚，而其對極，却是物的屬性的資本。資本而按上官僚的烙印，是只有在一定的社會政治條件下才有可能，因此，官僚資本的產生與發展，皆當從特定社會政治關係中去加以理解，而那同時也正好是特定社會政治關係的體現物。

第三，官僚資本的上述三個形態，就某一方面或其活動的歸結來講，似以第一形態即官僚所有資本形態為基本形態，因為對公營資本作自利的運用，對私營資本作自利的控制，無非是想使其所有資本形態迅速擴大起來。但從另一方面或從其活動機能立論，則第二、第三兩資本形態，不但同樣重要，其或更形重要，沒有這兩個資本形態，第一資本形態，也許根本就不易產生，即使產生，也恐怕難得成形成為官僚資本。

論到這裏，大家也許仍覺得我上面關於官僚資本的總概念，還有不夠包容的地方，即在現實

上，除了上述官僚資本的二個形態外，不是分明存在着官商合辦的資本形態麼？詳細分析起來，這所謂官商合辦的官，並非官，而是官家或公家，所謂商，並非商，倒反而是官或官僚。官僚資本在其作用過程中，可以有許許多多的連結方式，而由此表現出許許多多的複合形態：官和私人的資本，參組到公資本方面；官以公家資本，參組到私資本方面；官以所謂官商合辦的金融機關的資本，參組到私資本或公資本方面；官以屬於國有的資本，參組到地方官商合辦事業或官辦事業方面……各種各色的結合方式，都不過是官為擴大並加強自己資本活動所搭起的「便橋」。

我們應當把他們理解為前述三個基本形態的派生形態，並為那三個基本形態作用的環節或結果，它們的真相，是會在後面待述及的官僚資本活動的過程中明白顯露出來的。

二 官僚資本是怎

樣形成的

論述到官僚資本如何形成，我們似乎要被追着說明以次的問題：

「中國有幾千年的官僚制度或官僚主義，為什麼到

現在始出現官僚資本？中國或許有幾十年乃至一百年的官僚資本發生史，為什麼它到最近始被人重視和注意？」

對於這類問題，我可以就以前次幾個論點，予以綜合而簡括的解答，我希望在解答的當中，能把官僚資本形成的過程，描出一個大體的輪廓。

先講現代以前。在以往的前資本社會，夠稱為資本活動的，大體是限於有關商業和高利貸業方面。中國的封建官僚體制，在西漢時代已完全確立。當時的官或官僚，儘管也開始兼作商業高利貸活動，並進而為國家從事有關鹽、鐵、酒等的生產企業及市場獨立經營。但一則因為他們活動的範圍，過於狹狹，同時，他們對於從事此類活動結果的所得，並不是用作擴大再生產的蓄積資本，而寧是用以增加消費的手段，再有剩餘，也可能是用作兼併土地的手段。因為在當時，土地是採取社會剝削勞動生產物最有效的把柄。也餘勞動生產物最有的把柄。也餘政治上之地位 and 權勢的，並不是資本數量的多少，乃是土地範圍的大小。在這種情形下，官僚資本當然不易形成。

次講現代：

到了十九世紀中期乃至二十世紀初期，我們已漸有現代型的資本活動了。我們的官僚資本亦漸伴隨著萌芽起來。在中國產業發展過程中，有所謂官辦時期，有所謂官督商辦時期，有所謂民營時期，李鴻章盛宣懷張季直輩的大財富與經營，為我們提供了當時官僚資本萌芽的榜樣。但首則因為前兩時期的民營資本未曾發達起來，次則因為民營資本開始發達的時期，又正是官辦及官督商辦事業完全破產的時候，致官僚資本形成的來源以及其造出的機會，都大受限制，換言之，就是因為官僚資本的第二形態（運用形態）與第三形態（支配形態）沒有廣泛的存在，官僚資本的第一形態（所有形態）的存在與發展，也自不能不受妨礙。

不僅此也，我們在說明的便利上，雖然把中國產業發展的過程，分作上述三個時期，事實上，在所謂官辦時期官督商辦時期的產業規模，實在是有限得很。由中日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期間，民營事業雖有蓬勃的擴展，但妨礙產業資本成長的內在條件，却不允許我們的產業，正當的完成現代化的程序，官僚資本在一方面原是要要求產業資本有相當的發達的，但產業資本

過度發達起來，却又是對於它自己的否定。所以，產業現代化的坎坷，在某種限度內，竟可說是官僚資本存在的前提條件；亦就因此之故，官僚資本如非有偶然的外在的接生條件，（例如這次接收敵偽產業）存在，它就只能具有產業資本以外的資本內容。如其它因緣那種以外的接生條件的存在，而以產業資本為非產業的性質（如我們在本文第三節所要說明的）。

官僚資本的這種先天的限制，使它在此次抗戰以前的發展形態，不可能是產業資本的，而却是銀行資本的。

不錯，現代型的銀行資本，原是伴隨現代產業資本，或為滿足產業資本之信用要求而成長起來的。產業資本的發達受到挫折，這裏所謂銀行資本的發達形態云云，就顯然不是正當的，而是變態的。我在其他場合（見「中國經濟原論」第四篇）講過，中國的銀行資本，具有三種特殊性格，一是財政的，它是高利貸的，一是商業的，單就它與這裏特別有關的財政的性格而言，乃是說：「近三十年來最顯赫膨大起來的銀行資本，論其蓄積過程，應當不忽視政府所給予它們特別恩惠；政府以公債的方式向銀行

貸款，公債票面價格和政府實際收入款項之間，有一個鉅大差額，除此差額利得之外，還有較高的利率，還可能把公債當作資本運用，且還可把公債券作為發行鈔票的準備金。銀行就把其他方面的業務活動的應利拋開不講，單是這種借貸關係，就能給予它以四重的利益，銀行資本是這樣累積起來的」。我們由此應聯想到一段古典的說明：「國債的債權者，實際並不會拿出什麼，因為他所貸與的金額，轉化為容易移轉的公債券了，這種公債券在他的手中，和同額硬幣有相同的作用。由是，產生一個無所事事的食利者階級，由是在政府與國民間蒸着媒介機能的金融業者，獲得了速成的富；由是賦稅包徵人，商人，私人製造業者，將以國債的一大部分當作從天而降的資本來利用。」（見郭王譯資本論第一卷六四五頁）但是銀行資本的這種發達過程，正是銀行與政府相互增大其依存性的過程，（銀行投資總額中，有一半以上是直接間接貸給政府，政府支出總額中，有極大一部分是仰給銀行承購的公債。）同時，也是銀行資本官僚化的過程。在戰前，在政治軍事上的勢力者，差不多都已經是金融上的勢力者；由地獄上的土霸以至中央的顯貴，都

不約而同的在或明或暗的從事金融活動，而當時整個社會的動亂與不安，內地資金向都市，更向大都市的集中，益發加強了這一變態銀行資本發達的趨勢。

因此，在抗戰發生前十數年間逐漸繁昌起來的銀行資本，已早有人充分嗅到了它的官僚氣息。大家一提到所謂江浙金融資本與政治上的因緣，一聽到當時「統制產業」救濟產業的嘆聲，就已經預感到了官僚資本「旺盛的前景」。然而官僚資本的表面化，它使一般人感到它的存在和威脅，却是抗戰發生以後的事。

再次講戰時：

抗戰發生以後，爲了供應戰時的非常緊迫需要，就是不夠條件不夠資格的國民經濟，也不能不半受強迫半由模仿的改變平時的面貌。公經濟統制經濟的範圍盡量擴大起來了：由生產到配給，由交通到金融，凡屬經濟所在的地方，就是政治所在的地方，同時也是官僚應手所觸及的地方。我們已講到了由官僚所運用的資本形態，和由官僚所控制的資本形態的擴增或發展，正意味着官僚所有資本形態的增長。大約由民國二十八年到民國三十一年這短數年之間，公營經濟是有

長足進展的。同時由官方所獎勵扶植的私人企業，亦表現了蓬勃繁興的氣象，但公私資本經營一被掌握到官僚的手中很快就交到厄運。這厄運，在某種方面看來，雖然像是象徵着官僚資本所有形態的擴展，但在官僚資本所形體是把它運用的形態與支配形體作爲來源的限內，官僚資本整體，很快就要發現到它的擴展界限。現在且來分述公私企業實在戰時官僚資本化並作用爲官僚資本的實情。

在戰時，各級軍事政治部門，差不多都像在講求有關它們各別部門的經濟方面的一自給自足，先就國字號的工業經營主體來說：經濟部資源委員會是首屈一指國營工業專管機關，在民國三十二年，它所屬的，已達到七十八個單位。軍工部是兵工業的經營機關，除兵工廠外，亦經營鋼鐵，煉油，酒精，毛織，棉紡，棉織及被服工業。交通部則經營有造船，造車，機器及煉油，酒精等工業。糧食部設有中國糧食公司，經營糧食加工工業。財政部則由所屬的花紗布管制局，貿易委員會，復興公司，中茶公司各自經營了若干工廠。此外，農林部，教育部及社會部，亦多少有直接經營或附屬的工廠。賑濟委員會未裁撤前，曾經營了二十三個

工廠。以紡織等輕工業爲主。國家銀行中經營工業的，以中國銀行的雍興公司爲最大，它已有近三十個單位的工廠。其次，交通銀行，中央信託局及中國農民銀行，亦有直接經營的工業。至於省字號的經營主體，每個省府，差不多都有一個範圍或大或小的企業公司，包括有各種各色的工業單位。屬於省政府的省銀行，在許多省份，亦有它的生產事業。建設廳更是一個「正言順」的工礦業經營機關。此外，省以下的縣級政府機關，以及不直屬於省政府的社會公團，亦都像是在爭先恐後的響應「勝利第一生產第一」的號召。然而略一考察實際，就要發現其中許多曲折有致的隱情。

第一，所有各級各部門之從事生產事業，在最先也許是爲了供應當前緊迫的需求，但愈到後來，除了極少數的經營機關外，其餘差不多都是爲了把生產事業，作爲囤積事業的掩護。

第二，物價不絕高漲，商業經營事業，愈來愈較生產事業爲有利。於是各級政府機關都把它們的注意，集中到專事囤積的合作供銷處一類企業方面，而原已設立的生產機構，亦相率在一「商養工」的感召下向着商業機構轉化。

第三，生產事業商業化，就無異爲「假公濟私」乃至「化公爲私」開一大方便之門。各種貪職枉法的秘訣與技巧，大體都是從這裏表演出來的。

至若官僚對於私人經營的支配或控制，那顯然是經由另一套手法。戰時公經濟的發展情形，已如上述。可是，正當公經濟各部門擴展過程中，私人的企業經營，亦在種種刺激與政府獎勵下，得到非常之發展。這裏毋須證出我們戰時究有那些私人生產企業，及它們對公營企業所占比例如何，這類統計數字，隨在可以找到。我們所當注意的，當是一般私人的生產事業經營，究是如何遭受着官方或官僚的管制。民國二十七年十月，政府曾公佈一個修正了的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理條例。這個條例對於工業之種類，分析，生產，輸出，價格和消費皆有規定；在種類方面（一）所用原料爲軍用所必需及製造非必需品，而所用原料供給缺乏之企業，經濟部得令其停業，對於停業的企業，經濟部得將其土地房屋機器動力材料工具等移作他用；（二）經濟部對於製造奢侈品及其他非必需品之企業，得分別限制或禁止之；（三）企業之原有設備，只以改製軍用有關之物品者，經濟部得令其改製

。在地域之分配方面，對於戰區及鄰近戰區之指定各業，經濟部因必欲令其遷移。對於各業之生產者及經營者，非經濟部核准，不得歇業或停工，其已歇業停工者，經濟部得限期令其復業復工，對於指定物品之輸出輸入，經濟部得因必要分別限制或禁止之，對於指定之物品，經濟部得因必要分別作禁售或平售之處分得依公平價格分別收買其全部或一部，同時得令生產者或經營者儲藏或移置之。這個統制條例，自然不曾一一見諸實行，但在公營企業取得有各種特殊便利，同時私人企業又須在廠具遷移，交通，販賣，特別是信用等方面，需要仰賴政府的情形下，它們將可能依其希望取得特殊便利與仰賴政府的程度，甚且也可能依政治勢力者對其發生興趣的程度，變爲官僚所控制私營企業的有力武器。我相信，並且也隨在有事實證明，戰時許多人私企業乃由是被淘汰，被合併，被參入官僚或官僚們的私股，因而，由官僚支配資本形態變爲官僚所有資本形態。

可是，臨到勝利的前夕，幾乎全部由官僚擺佈的公私企業經營，都陷在極端凋敝的破產危狀中。我們似有理由把它的原因，歸之於這以前的戰事惡化情形，

特別景湘桂兩省淪入敵手後，散佈在這個地區的公私企業，全部化爲烏有了。可是，單從戰爭失敗方面着眼，顯然無法說明以次的事實：（一）整個大後方的各種企業經營，都是在戰爭局面非常緊張的時期（民國二十八年到三十一年）次第建立起來的。（二）那些企業經營的開始衰落，却正好是發生在戰爭入於半休眠狀態的民國三十二年及這時以後。

我們試回憶一下當時的情景。

「工業生產，在抗戰以來，在大後方未有顯著之進步，但由於物價，稅制，運輸等影響，過去一年（按即三十二年）新工業之推動，已萬分困難，原有的工業生產，已表現着極度的蕭條，除少數生產消費品工業，尚能繼續進行，或有相當增產，一部分化學工業如醱釀酒精等，尚能勉強支持外，各業工廠，無不停工減產，或歇業倒閉。此等現象，以鋼鐵和機械工業爲尤甚。據經濟部部長對記者報告：陪都一地，已登記之機器廠，共有三百六十四家，歇業或停工者，佔總數百分之十九，工具機停工者，佔總數百分之十二……川省鋼鐵工廠共有十八廠，先後停工者，已有十廠……衡陽已加入工會之

九十餘家工廠，因無力繼續維持，將於本年初停工者，約占四分之一……桂林各工廠，近月以來，亦轉入疲弱時期。其他各地，情形亦復類似。即公營工廠，雖有政府貸款救濟，亦因產品銷路疲滯，而開支日益增大，不得不在虛盈中吃本，或部分出賣機器，賴以維持……」（見「中國工業」月刊）

從民國三十二年度起，中國戰時經濟即已發生深刻危機，那在表面上，雖然說是由於物價，稅制，運輸等影響，但這幾方面的不利影響，都有官僚的非法的不合理的無能力的活動因素存在其中。這，我們將在下面指證出來。

最後再講到戰後：

在國民黨的二大大會中，一位要人彷彿這樣「概乎言之」：「過一切國營事業失敗了，私人企業也不振，官僚資本却膨大起來。」

然而這句話，只有相對的意義。在我們的理解上，國營事業在被當作官僚運用資本形態的限內，大部份私人企業，在被當作官僚支配資本形態的限內，它們的失敗與不振，已經是意味着官僚資本本身的沒落，即使單就官僚資本的所有形態而言，那亦是

表示它的累積來源的涸竭。如其在這種情形下，官僚資本還能膨大，那只是說（一）在公私私企業的凋殘破壞的當中，化公為私，乃至化私為官的事實確實存在着。與公家及一般私人相對待而言，許多官僚所有資本，是膨大了，但（二）那種膨大，在沒有現實產業發展作為基礎的限內，只能是虛擬資本的膨大，只能是國債所有額，銀行股權的增大，或者至多只是整個停頓了的或半停頓了的各種生財的貨幣價值的增大。

在動員的時候，一部分企業經營忙亂的內遷，一日復員，殘留下的大部分企業經營，又忙亂的外遷。交通的阻礙，週轉資金的缺乏，原有市場關係的突然變化，許多原來已在半停頓中的企業經營，工廠設備，事實上，無非是一棟一棟的臨時搭架的建築物和一堆一堆的正在誘餌中的濫鐵而已。但雖如此，至於此類類的房屋，不生產財，乃至它們所數佔的地產，却不儘將其原有價值列在各經營單位資產的貸方，甚且還被擴大增加起來，當作那些經營單位應付銀行欠款的抵償物，而列在銀行資產的貸方。戰時在大後方，在一切所謂臨時省會的地產，其建築物，其經營設備，甚且其霉爛了沒有售賣可能的

倉庫貯存物，就這樣被「保持住」乃至「增大」其價值，成了我們社會總資本繼續和擴大的內容。舉例來說吧，永安是福建臨時省的省會，一時曾興建起了不少的房屋，曾依省銀行及其他國家銀行的幫助，設立了有關農產的農林公司，有關供應的合作供銷處，有關工業的企業公司分處，乃至其他用種種名色，向銀行通籌款項開創的官私事業。在省會準備還治之始，這一切經營已早不約而同的一致虧蝕到不可開交，結局，它們對銀行幾百萬幾千萬幾萬萬的欠款，還有銀行對自身經營的各種事業的負累，一大部鄧由今日永安那座迅速趨於荒廢的小城市的房地產產，作了一報銷」。我相信，這在今日全國各地方，決不是什麼特例，而是一個通例。

然而，「柳暗花明又一村」。官僚所有及其所用資本，絕處逢生的得到了敵偽所遺接收資產的大補充了。敵偽公私所留給我們的財產！——流動資金和固定資產！——共有多少，迄今尙不曾見到一個概略的計算數字，單就那一再被文武官員們貪錢「規留」後而登記在國家或政府名義下的一部分而言，亦還是用「不計其數」這類術語來含糊的描述它。這在一方面是由於我們價格

標準的貨幣，在不斷大貶價，以致接收資產的估值發生了技術上的困難。而同時，那也正好是官僚政治無效率的實話，雖然其中還存在着公私不分混水摸魚的「秘密」。我們在這裏只想指出大家公認的一件事實，就是，今日在全國各大都市，不論是依國營名義，私營名義，抑是依牛公營私名義所活動着的各種企業，恐怕有最大部分是由於敵偽資產的「潤澤」。而在目前全面內戰所造成的全面破局下，我們每日儘管從報紙的經濟欄中，只是見到商工百業倒產歇業的驚人消息，

可是，由官僚所進行的「國營」事業，有的却竟能給我們以這麼有前途的展望：誰都知道中國紡織建設公司，是當前國營事業中最大規模的一個。前行政院長宋子文最近在立法院報告書中有云：「至於中紡公司的成立，當時羣起指摘，多主張應將敵有紡廠出賣，如果照此實行，事實上等於犧牲全體國家利益，而政府所得，事實上不過二三千億元而已。去年中紡公司盈餘即達四千元，今年或可得到一萬億元。假使實施輕工業歸民營的政策，現時將中紡公司估價變賣，其資產可售得三萬至四萬億美元」。假使報紙所登載的沒有錯誤，宋院長的那個報告所給予我們的最深

印象，就是：一年以前準備以二千億元（就以二千五百億元計）變賣的產業經過這短暫期間，就可變賣到三四萬億美元，（就以三萬五千億美元計），折算起來，增值達十二萬八千倍，就把這一年來的物價變動加入考慮，這個數字的提出如其不是過火的說開了一個笑話，那也只是說明中國達官貴人們對於國營事業的處理，該是多麼隨意，多麼漫不經心。至若這事業「一本萬利」的原委，我們後面將是有機會談到的。

三、官僚資本的作 用及其後果

關於這方面，可分作以次兩點來說明。

(一) 官僚資本是怎樣作用着的，官僚資本在實際的活動或運用上，自始至終，都同借貸資本保持着極密切的聯繫。在前述

現在官僚資本的形成過程上，我們已指出了這種組織的來源來說，中國原始的官僚資本形態，即現代以前已經存在着的官僚資產，一向是由各種方式的高利貸業累積起來。典當業，賒賣商業以及指不勝屈的本格借貸方式，儘管是一般散見於民間的，但稍加分析，就知道那主要是所謂大大小小候補官！士，出缺官！在任官自己及其親朋故舊們在從事經營，他們因為是社會政治上的勢力者，他們的貸借資本，就不但因此有了來源，有了保障，且還變成爲極有強制性的吞併土地的手段。我們很可以說，高利貸或借貸資本，是官僚們之政治勢力在經濟上的擴大與延長。

保持着官僚的屬性。中國官僚的生活形態，以及當前社會的客觀情勢，都不宜於從事高利貸的投機，但更宜於從事高利貸性的投機，金融活動，以及這許多其他有關的原因湊合起來，使大大小小的官僚都不期然而然的把金融事業作爲其經濟事業展開的出發點。

中國金融界早就有所謂南四行北四行的系統的。近廿年來因爲許多新的金勢力的出現，使得原來的系統有了不少的錯合的改變，但有一點是不會改變或者只有「變本加厲」的改變的，那就是你不論翻看那一個銀行的董事會，理監事會的名錄，却總可發現那都是一批一批的官僚標準官僚或者他們的家族。公家銀行固如此，所謂私立，實際仍不外是「官立」的銀行亦如此，那怕是若干真正的民間銀行，它們亦得爲了實際上的經營的特殊便利的取得，而不能不拉若干政治上的紅人來撐撐門面，雖然政治上的人，往往也因為公然出面經商，有礙視聽，而失官格，竟也標列出一些「莫須有」的商人，作爲「偽裝的後台」。在這場合，倒不是民藉「官力」，而是官藉「民名」了。我會想，中國社會中的最複雜場面，往往是由「足智多謀」的官僚扮演出來的。

官僚們這樣熱衷於金融事業，乃因官亦是人（雖然他們有時扮演得趨之超人），大利所在，人必趨之。金融業的大利益，並非在金融活動本身，在以往，那是藉着高利貸來擴大商業和兼併土地，並進而保障政治上的地位，而在現代，則顯然是藉着金融活動，去接近並參與一切有利可圖的公私企業部門。參與的方式，五花八門，比起現代先進國銀行資本，參與各種企業的方式，還要複雜。試舉二例，以類其餘。川康興業公司是與川康銀行有着血肉關係的，川康銀行的資本來源，是匯庫，是川康兩政府，還有是所謂商股，由這樣一種組成方式，就決定了它的官僚性格，事實上商股云云，無非就是官股，官僚們通過川康興業公司，把一切有利可圖的事業，都囊括淨盡了。又如貴州企業公司的資金來源，是貴州省政府，是中國，交通，農民銀行及貴州省行，還有也是所謂名商實官的「商股」；這個企業公司的包羅性，在國內是有名的，幾乎經營了省內一切新式事業。戰時其他各省相率設立的企业公司，差不多都是把貴州企業公司作爲榜樣，其間即使也有完全由省行或者政府出資經營的，那並不妨礙它

這種組織戴上公家名義，實際上大抵是在種種曲折的手法下作着某些特殊勢力者的業餘經濟買賣的機構。這就是說，官人們一般是通過他們自己控制的銀行，進而參與或控制一般經濟事業。結局就使官僚金融活動，變成整個官僚資本活動的重心。往往一個人兼爲官，金融家，企業家。而政治巨頭，銀行董事，公司後台老闆，事實上早爲大家熟知的一三位一體了。

英國拉斯基教授曾就大英帝國的這三方面的人物列出一個相通的表式，彷彿我們在這方面已經迎頭趕上了先進國，值得「稱許」了，然而美中不足，却不僅是我們已在前指出了的本質上的差別，並還有是由那種本質差別導出的極有危險性的後果。

(二) 官僚資本作用的後果，在私有制下，特別在現代性的私有制下，社會資本或財富被累積到誰手中，在官的手中，抑在非官的手中，本來不值得去計較的，乃在它自始至終，都必然招致禍國殃民和妨礙社會經濟發達的不利影響。把官僚資本展開的全過程加以考察，我們可以見到它的以次幾種顯著傾向：

一、獨占資本化 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極度同情中國

政府的英國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曾自南京發出一個電訊，報道「中國政府用各種不同的公司組織，已包攬了國內一切主要的經濟事業，掌握礦產，動力，重工業，絲，棉紗及糖的生產」。其實何至生茶，一切比較重要的貿易對象，如茶，桐油，棉花……等等，幾無一不由買賣或官營一類名色壟斷或獨占了。這種獨占傾向的產生與發展，無非是官僚資本作用的必然結果。我們知道：官僚資本之獨占資本化的傾向，最先，就因為它這種資本形態，不但最便於發生此種傾向，且最不能不保有此種傾向，官僚資本是否能維持並擴大，就看它保有那種獨占到什麼程度。

我在前面已指出官僚資本的所有形態使用形態以及其他種種中間形態了。完全由公家名義或主要由公家名義經營的事業，在一般工商市民階級尚未取得政治發言權的社會，可以依照政府當權者的一時高興，或個別的利害打算，而確定其獨占範圍。而在戰爭過程中，更加是一悉隨尊意了。我們社會本身，原本是缺乏實行統制經濟的先天條件的，但雖如此，我們戰時乃至戰後許多所謂公營事業或半公營事業，都一直在藉着金融上的或產銷運銷上的優先利益或特殊便利支

持着。比如在倒產歇業變成極普通現象的今日，像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一類的大規模企業，却在昌言着並預期着高額贏利。其實，敢於誇稱有贏利的公營事業，恐怕也僅只有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如怡和它同時成立的中國蠶絲公司。其經理人就苦臉訴說：「我們是虧本事業」，這不是對於以往所加於公營事業之批評指摘的反駁麼？但仔細分析，就明白它是在經營的任何方面，都享有特殊便利的結果，換言之，也就是由於獨占的結果。凡獨占經營所獲的利益依一般經濟原理評判起來，都是由於其他未享有同等優待的同類事業的損失。它是把同業的犧牲作為營養而成長起來的。大家試想想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從中央銀行所得到的無限制的貸款便利，它在購進原料和添補機件上所獲的外匯和運輸上的優先便利，它的廠房公有不付租金的便利，它在運銷上與紗布統制密切關聯起來的便利，它的極龐大規模的托辣斯組織的便利，以及其他關於納稅方面所得的便利，殆無一不是由於獨占。我們由中國紡織公司，不難推測到其他名義上公營或半公營官僚事業的發展的內情。不但此也，獨占利益的本身，往往又會成為未享此種利益，並因此種利益蒙受

到致命損害的其同類事業特殊化或官僚資本化的誘因。一般未享獨占利益的同類民間企業，要就是睜大眼睛看自己已沒落，否則就是讓那些握有政治經濟權勢的人；即可能使它也多少分有那種獨占利益的人，參加進來。

事實上，凡屬由官僚所參與的事業，不可避免的要由於人情主義，應付主義，形式主義而逐漸變得沒有效率，可是正因爲如此，獨占與成爲必要。許多過於天真的的人，還在高嚷着取消公營事業半公營事業的差別優遇，那其實就等於說是取消官僚資本本身，那是可能的麼？事業是否存在，是否能發達，不取決於經營技術或效率，却取決於是否取得獨占權利，單就這種場合來說，官僚資本之妨礙私資本和一般企業效率的改進或提高，就是非常明顯的了。

但其弊還不止此。官僚私人對於獨占的利益，可依三個方式取得，其一是藉着公營事業的經營，從中漁利。其二是參加所謂「商股」到享有獨占權的半公營事業方面。其三是讓私人經營獲有某種獨占，因而在那種私人經營中享有相應的「特殊股份」。無論就那一個方式說，獨占的利益，都非靠着官，靠着政治勢力

不行則。獨占利益的大小，就同官的大小，政治權勢的大小發生了直接關係，結局，官僚資本的活動，必然表現爲政治上的角逐，取得政權，變成了取得某種官僚資本利益的前提條件。可是，這還是問題的一面，更緊要的，却是另一方面。一個官，或一批有血肉關係的官，欲保持其已有的政治權勢，或擴大其已有的政治權勢，往往又靠着或倚仗着是否還有政治大黨的官僚資本。在這種官權上，官僚資本又變成了政治權勢取得的前提條件。所以，按逆更進則支那某種較大規模的較有利益的公營事業（無論那事業是屬於左派方面的，抑或屬於交際派或無黨派方面的）乃成爲政治鬥爭最本質的動因。試從小蔣者而推，到各，到中央，所有各種派系主義地方主義之間的傾軋，儘管表面上有極其差異或極其合理的藉口，而熟悉內情的人，却是很容易指出它們最後的目的的所在。除了極少的特例外，我敢說，它們那些傾軋或鬥爭，實無不與官僚資本獨占權的分配鬥爭。

把官僚資本當作保持政治權勢的手段，那把政治權勢當作取得官僚資本的手段，本來是含有其內在因果關係的。且以官權爲害，前者就安比後者大得許多，顯

二、政治資本化 官僚私人

把官僚資本當作保持政治權勢的手段，那把政治權勢當作取得官僚資本的手段，本來是含有其內在因果關係的。且以官權爲害，前者就安比後者大得許多，顯

把官僚資本當作保持政治權勢的手段，那把政治權勢當作取得官僚資本的手段，本來是含有其內在因果關係的。且以官權爲害，前者就安比後者大得許多，顯

把官僚資本當作保持政治權勢的手段，那把政治權勢當作取得官僚資本的手段，本來是含有其內在因果關係的。且以官權爲害，前者就安比後者大得許多，顯

重得多。因為在前一場合，官僚資本勢將轉化為政治資本，官僚資本的活動，勢將歪曲到經濟本身以外去，某種公營事業一被某政治巨頭所運用，那種事業將會自然而然的機關化為這巨頭一派的「小嘍囉們的一根據地」。這一來，公司衙門化的可能性大增，在漁取「政治活動費」的名色下，一切腐化貪污就由此更加受到保障性的鼓勵了。結局，官僚資本的經濟目的，勢不免要為其政治目的所犧牲。

惟其官僚資本與政治，政治勢力者如此密切的聯繫，所以政治上一旦掀起波瀾，政治勢力者有了升沉去就，馬上就影響一切為官僚勢力所及的經濟部門，銀行也好，公司也好，其他任何企業組織也好，都相應發生脫節或崩解的現象。新政治勢力上台後的經濟第一項「調整」工作，也許就是看對前任所留下的一「大漏洞」，如何去彌縫；當他們在台下的時候，儘管對其蓄意打倒的對象，如何痛加體無完膚的攻擊，但是等到登台以後，却像很「思想」很「紳士」的寬容前任的「賈污」。這「官官相衛」的哲學，到近來已明知觀火的證明那是他們想藉此混水摸魚，並預留自己下台飽掠步驟的破計。大家試想，近十年來，該有多少屬於國家的

資市的公營事業，都不同而的隨著有關政治勢力者的場合而解體了。我敢担保，即在依着多方面的獨占，多方面的特殊便利，而在表面上顯得「經營有方」「生財有道」的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如其叫熱識內情的人仔細考究一番，恐怕不會像前任負責人那樣自吹自擂的「滿意」吧，即使真的如此，試多經幾回「交代的轉折」一看，其命運也許不過如昔日曾經被宣揚得炫赫一時的招商局或漢冶萍公司呵！

然而官僚資本活動的弊害，還不止此。

三、買辦資本化 我這裏得指明，官僚資本獨占資本化，政治資本化，無疑是一種必然的發展程序。至其買辦資本化的傾向，在某些場合，雖然是由其政治資本化必然演化而來的，但在實際，我們的官僚資本一開始活動，一開始當作一個顯著的經濟形態，就已經與買辦資本結了不解之緣。我們甚至可以說，買辦資本與官僚資本，最初就是以孿生兄弟的姿態出現的，它們通是在國際資本作用下的中國這種社會的必然產物。為補足前述官僚資本形成過程的說明，且附帶簡略指出那種關鍵。國際資本在落後地帶發生支配作用，或把落後地帶變為它的營養生命線，是必得

落後地帶破壞其原有生產方法，才得為它提供製造品市場和原料供給的。而要達成這種目的，在已經殖民地化的落後地帶，其政治支配權使它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向作去，而在不曾完全殖民地化的國家，它就必須通過這種國家的政治支配者，給那些支配者以某些經濟的利得，才行得通的，結局，各種各色的借款成立了，各種各色的採購組織成立了，各種現代型的經營出現了；中國現代初期的所謂官辦產業，官商合辦產業，是在這種種現實要求下實現的。與外人接近的政治勢力者，無論以國家的名義借債還是借債，購入還是賣出，均被視為有利可圖，這是官僚資本原始蓄積的一個側面，也是官僚資本最初就與買辦資本發生血肉關係的內情。此後，凡屬有關官僚資本的活動，殆無一不例外保持着某種聯繫，而使那種活動，附加上「買辦的」烙印。可是，在理論的敘述邏輯上，我們這裏應當特別注意的，却是前述的官僚資本的政治資本化傾向一經形成。就必然會進一步加強其買辦資本化傾向。這可從以次幾點來說明：

首先，官僚資本一變為達成政治目的的手段，一變為一種政治資本，它無論從積極方面講，抑從消極方面講，都要求帶有買辦資本的性格。為了藉官僚資本勢力來保持政治勢力，那種資本活動中，參入了有力的外國資本力量，那就無異取得了國外有力的奧援。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實。同時在消極方面，為了自救已有政治勢力一旦不保，而仍欲再獲得政治勢力的可能，也證其在資本活動中，參入有外力的外國資本的力量，最近不時見諸報章的所謂中美什麼公司什麼公司的計劃與組織，顯然與官僚們的別的主觀如意算盤有關，但在官僚資本活動過程中，事實上，造出了一種更有危險性的官僚資本乃至一般社會資本的買辦資本化的必然情勢。即：

其次，官僚資本既如前面所述，依種獨占，妨礙一般民間產業的發展，妨礙一般經營技術的改善，而又由其化作政治手段，而不時引起整個經濟上的混亂與脫節的破壞影響，其結果，全國產業將愈來愈變，成過身癱瘓不遂的狀態，將益使從事生產業者裹足不前，而社會上可能用作資本的蓄財，勢必主要把一切對外有關的金融，貿易，交通以及市場投機一類流通經濟作為唯一可能的出路。這種傾向發展下去，就是產業上的全面的對外依

種，也就是全面買辦資本化。自然，我們並不否認我們政治勢力者也有建設中國經濟的大企圖，可是，我們也同樣難於否認他們維護自己及其一派經濟勢力的「小企圖」，往往是被位置在那種大企圖以上，並使那種大企圖去遷就它。因此，在什麼中美航運公司什麼中美貿易公司瀛羅富中，我們又發現中美農業考察團中美貿易考察團：「一類顧問或指導組織，或已或將陸續不遠萬里而來了。這些客卿之來，也許不完全自告奮勇，他們也許不盡是自國利己第一主義者，但依據他們考察結果的報告（如最近發表的中美農業技術考察團報告書），如其說他們不是對於中國社會根本的性質過於無知。就是對於中國經濟建設，過於不感興趣，設把他們的活動，與我們官僚資本之買辦化的動態關聯起來加以考察，任何人都不免為中國經濟之殖民地化的前景表示憂懼。

四 我們將怎樣對付官僚資本

本來，我這篇文章的主旨，在指出官僚資本活動的必然歸趨，至若如何對付官僚資本，並不在細究之列。但因目前高頭打倒官僚資本的人，提出了許多高明的具體的辦法，那些辦法，彷彿

根本不曾認知我們官僚資本的本質，所以我在這種範圍內，附帶提出我的補充修正意見。

綜合懲治官僚資本的意見，約三端：

第一，主張禁止官僚從事商業活動。我們在戰時的許多法令中，就不時見到這類條文。中國一般的法令條文，原都是當作「具文」來理解。禁止文武官員經商法令，當非例外。不過，這法令曾三令五申過，這就使大家不能不略具戒心，研究如何去設法逃避。其實官吏不得經商的法令本身就大成問題，沒有一個聰明的官吏，肯自己出面做生意的。他對銀行，對工廠，對各種企業公司參加股份算不算經商呢？他的子女，他的親故從事商業活動能不能禁止呢！何況，我們前面已把官僚資本的諸種形態分別指出了，個別官吏或下級職員貪污不得，業餘小賣補助生活所需，甯可說是廉儉可風，然而整個的恐怕就是他們，而把整個國家資本國營事業控制在自己手中，作着種種不法行動（如利用職權作着黃金外匯投機並強制兼併私人企業之類）的大官們，一點也不會抵觸法令。

第二，厲行自由經濟政策，縮小管制經濟範圍，照前面所述，官僚資本乃由國營事業擴大而繁昌由統制而發展，由獨佔而加強，設厲行自由經濟政策，放寬民營事業工業，使國營事業限於最基本的重工業部門，這層做到了，官僚運用資本的範圍就會縮小；取消各種獨佔，官僚文配資本的範圍也會縮小，結局，官僚所有資本的來源就有所限制了。這種辦法能夠比較認真的實行起來，顯然要比前面禁止官僚經商法令，要有效得多。

但是我要問：這所謂自由經濟政策，究是由誰所定立？又是由誰去執行？不錯，我們聰明的官僚們，是不惜定下或通過一種令人滿意的自由經濟政策的，但他們其所敢於「定下」，勇於「通過」，就是因為他們分明知道，對於任何政策及其詳細明確的規定，他們都有擺在一邊不去過問的「自由」。再往前看罷！

第三，登記官僚財產。登記官僚的財產，曾經被朝野上下噴得怪兒的。官僚資本作祟，用登記的方式，隨時予以監視，必要時則毫不客氣的沒收，說起來，是再徹底不過的。這彷彿是前清時代官吏財產達到一定限額以上，即予以抄家沒收處分的復活。且不管清代這種辦法在當時資本活動有限，而又沒有外國可資逃避的情形下，收到了多大效果，而在我們今日似乎是沒有實行可

能的。也許就因為這個緣故，就連在最近公佈的財政經濟緊急措施當中，前行政院長宋子文也毫無保留的同意提出登記國內外存款的辦法，許多天真的人，還因此強調這種緊急措施的非常革命性，可是當立法院若干委員，把美國存款究有多少的問題，拿來詰詰宋院長的時候，我們友邦美國已早代他擬好答案了：「事關私人經濟活動，未便加以干涉」。於是，戰時的，帳可查的以三千萬五千萬美元不算，戰後短短一年餘的時期中，我們相率逃到美國的十億美元（據上海報載）就由我們有遠見的大大小小的官員們，去享受「中美條約」中規定的「美國國民」的保護待遇了。

這些辦法都行不通，該怎麼辦呢？依照前面的研究，我得出了一個不是對付而是根絕官僚資本的必由之路。

戰後一年多以來，官僚資本變成一般深惡痛絕的對象，正如同抗戰後幾年的商業資本一樣。當時過於天真的人，大聲疾呼殺幾個大囤積商人，以為用這種殺一儆百的方法，就可以叫商業資本的猖獗活動平服下來，而在目前，打殺大官僚資本家的口號雖不曾提出來，打倒某某大官僚資本家的呼聲，却是叫得聲嘶力竭。除了姓「趙」姓「錢」的官僚

資本家也可以行所無事的喊打倒姓「孫」姓「李」的官僚資本家，自是別有作用，自是獨占資本分配權的鬥爭作祟，尚另有一個看法外，其餘認真表示厭棄官僚資本的人，確有不少在希望打倒若干大官僚資本，以為這樣做了，官僚資本的猖獗活動也可平服下來。

我在前面已明確指出了，所謂官僚資本，是官僚們藉着政治勢力而作着經濟活動。他們所以這樣做，並不單純是由於他們的私慾，而更是由於使他們「可能」具有可能「實現」那種私慾的客觀情勢。他們的假公濟私的活動，是在一定政治機構下作出來的，而那種政治機構，又是把一定的社會生產關係作為其存在的更基本的前提。我們社會的半封建與半殖民地性，一直都潛存着我們那種官僚資本形態形成的諸般條件，只要一有誘發的因素作用着，那種資本活動就猖獗起來了。我們指明，像我們社會這種官僚型，這種官僚資本型，並不是完全沒有在其他由封建制度過渡來的現代國家存在過，我們因為有悠久的官僚制度的歷史傳統，又加極長期的處在過渡社會中，以至其存在規模與表現深刻程度，都不是任何其他國家所能望其項背。

在一切私有制度下，一切個人的經濟活動，都會要求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條件，以實現更多的利益。當一國現代性產業發展的內在有利條件不曾展開，而在那種經濟基礎上的政治勢，又不但允許甚且鼓勵從事經濟活動者利用其政治權勢來增進其經濟利得的時候，一個從政者，要就是無政治野望，要就是他還不會具備有主觀的經濟活動條件，否則他就彷彿是「命定的」要變成一個官僚資本家。任何一個強烈的主觀主義者，任何一個裝模作樣的四維八德的說教者，都不易克服或掩飾這歷史為他們預定要表演的角色，因此，在官僚資本本身尚有其存在的社會經濟基礎的場合，特定官僚資本家的興替，理應是無關體

的。反過來看，一個社會如其很順利的完成了它的過渡階段，即是說，它的封建生產關係，如已被拋棄了，它的政治性質與政治機構，就將成為便利新興產業資本家活動的東西。新興產業資本家要求的社會秩序中的法律秩序，以及表現在那些秩序中的法治精神，就將限制着官僚主義，尤其會妨阻從政者假借政權，假借政治力量來成就其私人利益的官僚資本活動。然而這還從消極方面立

論，事實上，如其一個社會的諸般設施，及其一般情勢，都使利於產業活動，產業分明有前途，有利得，他不論是一個從政者，或者是一個事業家，他根本也就無庸利用或依託任何政治權勢。這一來，所謂官僚這一概念，就將有不同的內容，而所謂公營事業或私營事業，也不會轉變為官僚資本。這是每個現代國家所曾經歷過來的史實。不管許多現代國家，如戰前的德意諸國，和今日的美國，它們的政治勢力者與經濟勢力者，又曾或又在如何統一步調的以極相類似的筆法，續寫它們各別歷史的篇章，我們却顯然還留在它們初期的階段。

可是，正因為我們社會自身還一直逗留在過渡的初期階段，而圍繞在我們社會周遭的許多現代國家，已經跨上了或正待跨上歷史的新轉形期。於是，由蘇聯施行的所謂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形態，和由金剛寡頭統治支配的戰前德意及今日英美諸國的所謂國

家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就在在變成了我們學步效顰的有力的「進步」的藉口，以爲「國營」「公營」這一世界潮流，是「應當」而且「已經」成爲中國國民經濟生活中之重要因素了。結局，最醜惡的形態，就給披上一種最靚的外衣。這在我們的認識上固添加了一層困難，即使我們已經把它的原形認清了，那在剷除或改造的實踐上，也會增加不少曲折。然而，我們不能由打倒若干特殊政治人物或大官僚資本家來消除官僚資本，不能由消除官僚資本來改造中國政治機構或社會性質，而必得把這種程序倒過來，却是非常明白的事了。

因此，我雖不妨同旁人一樣，痛憤許多特出的大官僚們的營私誤國，但却認定大官僚資本家們個別的興衰起伏，根本無關於整個官僚資本的存在與發展。這是事實，已經爲我們證明了，並還會繼續爲我們證明的。（完）

文匯叢刊第五輯

新經濟的路道

每冊定價

元

著作者 馬寅初等

發行者 文匯報館

上海圓明園路一四九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初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9337B

550-71
7333